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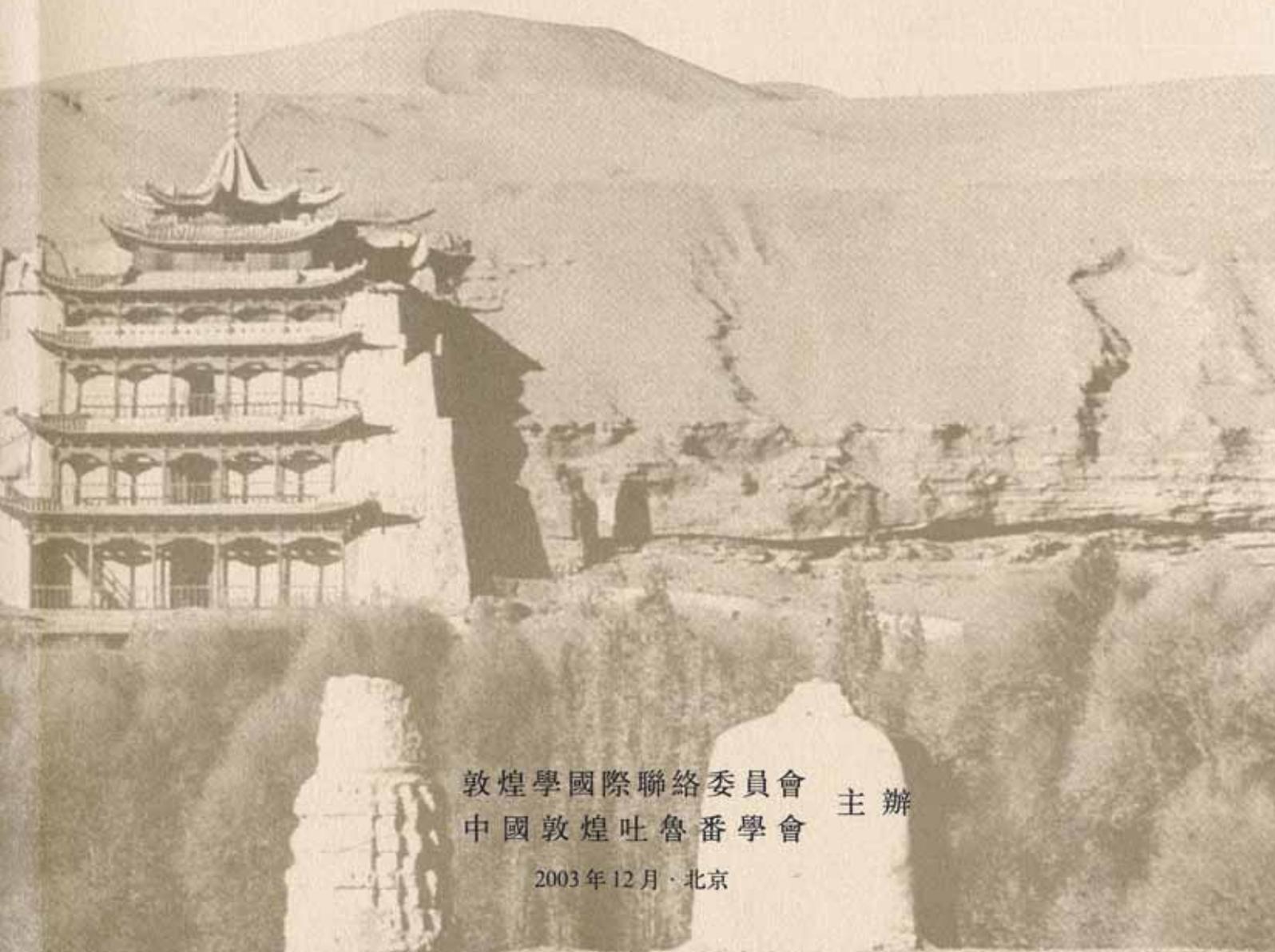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ILCDS)

通 訊

Newsletter of 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for Dunhuang Studies No.1

(創刊號)

策 劃 高田時雄 柴劍虹
主 編 郝春文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 主辦
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

2003年12月·北京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ILCDS）通訊

Newsletter of 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for Dunhuang Studies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主辦

策劃：高田時雄、柴劍虹

主編：郝春文

目錄

- 1、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成立因由記……………柴劍虹(1)
- 2、2002年敦煌學研究概述……………陳麗萍、江海雲(2)
- 3、2002-2003年臺灣地區敦煌學研究綜述……………鄭阿財(22)
- 4、日本における過去一兩年の敦煌研究……………高田時雄(28)
- 5、敦煌淨土寺研究綜述……………陳大爲(30)
- 6、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グ所藏敦煌文獻をめぐる問題と動向……………關尾史郎(34)
- 7、跨越中國邊境的跨文化互動學術研討會……………榮新江(41)
- 8、敦煌寫本相書概述……………鄭炳林、王晶波(46)
- 9、《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1—3卷)介紹……………誠遜(60)
- 10、《敦煌石窟全集》即將全部問世……………張先堂(61)
- 11、《敦煌文獻合集》經部介紹……………張湧泉(62)
- 12、《敦煌藝術品》第6冊介紹……………府憲展(63)
- 13、2002年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陳麗萍、江海雲(65)
- 14、稿約……………(80)

創刊號（總第1期）

2003年12月30日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成立因由記

柴劍虹

辛巳秋末，東瀛京都少長咸集，群賢畢至，追述“草創期之敦煌學”，以紀念先哲王國維、羅振玉東渡扶桑九十周年。余與郝君春文、榮君新江、方君廣錫、趙君和平應邀躬逢盛會。會間，東道主高田時雄教授倡議成立“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以加強敦煌學界同仁聯繫，承擔與協調國際合作項目。高田君乃京都敦煌學會掌門人，治敦煌學之語言通才，於今日學界之影響與日俱增，故與會者紛紛響應。然茲事頗大，沈默思慮者有之，畏難猶豫者亦有之。京都歸來，請示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季羨林老，答曰“稍待時機”。

越明年，盛夏時節，趁敦煌學史國際研討會於北京理工大學召開之機，高田君重提前議，回應之聲漸漲。余與學會副會長郝春文君等商議一二，遂再次請示季老。時季老雖患病體弱，仍關注此事，親自徵詢各方意見，權衡利弊，乃領首許之，囑吾等附和高田君動議，且推敲具體方案，磋商落實首批幹事人選。高田君不辭勞苦，多方奔走，辛勤籌措，終於今歲三月八日在京都大學會館舉行“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成立大會暨首屆議事會議。日方幹事高田時雄主持議程，池田溫幹事與會指導；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首都師大教授郝春文、臺灣嘉義中正大學教授鄭阿財、中華書局編審柴劍虹為中方首批幹事出席。京都、東京、北海道等地敦煌學家亦聞風而動，牧田諦亮、上山大峻、礪波護、岡野誠、關尾史郎、石塚晴通等眾多俊彥攜手蒞臨，致賀賜教。時值仲春，雖乍暖還寒，櫻花未綻，而英才滿堂，高論齊放，實顯我敦煌學事業之繁榮昌盛、蒸蒸日上也。惟惜法國戴仁、英國吳芳思二幹事，因要事纏身，未及與會。俄羅斯等國幹事人選，則尚待商定。

會議席間，委員及來賓紛紛陳辭獻策，計長議短，談鋒甚健，氣氛融洽。一致商定委員會之根本方針，系積極聯絡國際敦煌學界同人，努力開展重大項目合作，協調相關事務，推動學術進步。會間擬定委員會之英文名簡稱，曰 ILCDS，秘書處暫設於京都。又計議創建網頁、出版通訊、建設敦煌學知識庫、編輯敦煌學文獻資料庫與敦煌寫卷收藏地總目、籌辦紀念常書鴻、潘重規二前輩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等諸多事宜，皆切磋細膩，設想周全。議畢，國際佛教學大學院落合俊典教授致閉幕之辭，贊言會期雖短，成果頗豐，敦煌學之國際合作，可望喜開新篇，捷報頻傳也。

數月來，委員會秘書處運行有序。經高田君操持，會後六旬，網頁面世，遂使彈指按鍵之瞬間，信息播于四海。又經春文君親自催督各方，晝編夜集，使此通訊如期印行。效率之高，令人讚歎。此刊付印之前，主事者命余撰短文以敘委員會成立之緣由，遂不揣譎陋，為此因由記以告學界同道。余雖涉足敦煌學二十餘載，至今未能窺其堂奧，實不敢擔此重任。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其我之謂哉！癸未歲暮，記于中華書局漢學室。

2002 年敦煌學研究概述

1 陳麗萍 2 江海雲

(1 首都師範大學 歷史系, 北京 100089

2 蘭州大學 敦煌學研究所, 甘肅 蘭州 730020)

2002 年的敦煌學研究, 保持了進入新世紀以來敦煌學發展的良好態勢, 其專著數量與單篇論文數都略多於去年。據不完全統計, 本年度國內出版的與敦煌學相關的專著與論文集有 50 餘部, 公開發表的論文有 400 餘篇。《敦煌吐魯番研究》、《敦煌研究》、《敦煌學輯刊》三家刊物上發表的論文數佔其總數的約 1/3, 顯示出它們作為敦煌學專業學術刊物的優勢。我們同時看到, 與以往相比, 本年度敦煌學研究的內容更加豐富, 學人的視野角度進一步擴展, 不僅將傳統課題繼續深入研究, 也提出和解決了一些新問題。

現將 2002 年度敦煌學研究的一些主要成果分為: 概說、宗教、歷史地理、少數民族歷史與語言、考古與文物保護、藝術、語言文字、文學、科技、學術動態與紀念文等 10 個方面, 擇要介紹如下。

概說

劉進寶《敦煌學通論》(甘肅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9 月), 全面探討了敦煌學的概念、敦煌的歷史、敦煌石窟藝術的內容及其特點、敦煌遺書的內容及其流散和敦煌學史等有關敦煌學的一般性問題, 此書雖以作者的《敦煌學述論》為基礎, 但增補了不少新材料和近年的學術信息, 是目前所知全面介紹敦煌學一般情況最為詳細的著作。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姜亮夫全集》(2002 年 9 月), 文集共 24 卷, 其中第 9、10、12、13、14 卷, 彙集了作者關於敦煌學研究方法的述論, 以及對敦煌藝術、經卷做介紹與評價的篇章。

本年度回顧敦煌學史的文章多為總結各個領域與各地敦煌學的研究成果, 如陳海濤編譯《法國的敦煌學研究》(《法國研究》1 期)。法國的敦煌學研究, 起於上世紀初期, 大致有經歷了以下階段的發展: 開始於對敦煌文獻的編目工作, 但延續時間太長, 沒有同樣擁有敦煌文獻的中、英兩國所做類似工作的進度快。其次是以伯希和為代表的法國漢學家, 利用敦煌文獻對古代中國以及中亞地區的歷史、地理、交通、宗教、經濟、文化進行的廣泛研究。而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 是法國敦煌學研究組成員的集體成果與戴仁、戴密微等個人成就並舉的時期。陳友冰《臺灣五十年來敦煌學研究歷程及其特徵》(《中國文化研究》春之卷), 指出臺灣的敦煌學研究雖然起步較晚, 但在對敦煌資料的整理與研究上, 卻後起追上, 取得了很多的成果。高千《隴上敦煌學的回顧和思考》(《敦煌研究》1 期), 該文是作者在甘肅敦煌學會 2001 年年會暨敦煌飲食文化研討會上的發言。文章從隊伍狀況、研究狀況、弘揚敦煌文化、人才培養、敦煌文化書籍的出版、敦煌文化的產業化等六個方面, 回顧和總結了隴上敦煌學者在研究領域中做出的貢獻。但也指出甘肅的敦煌學隊伍中還存在着缺少有分量的學術著作、在某一領域內卓有建樹的一流專家還不多、學術研究還不規範等不足之處。並期望在以後敦煌學的發展中, 隴上敦煌學者能在優勢領域內找尋突破口, 在特色領域內培育新的增長點, 在弘揚敦煌優秀文化上下工夫, 則肯定能做出其應有的貢獻。楊富學《20 世紀國內敦煌

吐蕃歷史文化研究述要》(《中國藏學》3 期), 指出敦煌發現的古代文獻與吐蕃關係密切者相當多, 自 1978 年以來, 我國學術界對敦煌歷史文化的研究為 21 世紀敦煌吐蕃歷史文化的深入研究創造了條件。而這些研究則表明: 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創造的文化, 在敦煌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敦煌發現的藏文材料, 對研究敦煌學乃至絲綢之路的歷史有重要的意義; 我國學者對吐蕃歷史的研究已有了長足的發展, 並有良好的發展前景。此外, 還有一篇介紹日本京都東方學院的敦煌學者對初步整理敦煌文獻所做貢獻的英文文章: [美国]Aida-Yuen Wong 《Dunhuangology and the Kyoto School Oriental Studies》(《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

本年度有關敦煌學人研究的專著有: 陸慶夫等合著《中外著名敦煌學家評傳》(甘肅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9 月出版), 此書是對作者 1989 年舊作加以改寫的再版, 書中以中國、日本及歐美的早期敦煌學家為評傳對象, 主要回顧了他們的生平、學術成就與研究方法等。王冀青《高楠順次郎與敦煌佛典——牛津大學藏斯坦因與高楠順次郎往來通信研究》(《敦煌佛教藝術文化論文集》) 與《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藏斯坦因與失吹慶輝往來通信調查報告》(《敦煌學輯刊》2 期), 是作者關於斯坦因與早期敦煌學研究的系列檔案整理成果。

藏經洞文書被封存的原因、年代及其原有價值的判定, 長期沒有形成定論。本年度關於此問題的探討有榮新江《再論敦煌藏經洞的寶藏——三界寺與藏經洞》(《敦煌佛教藝術文化論文集》), 在分析了原有幾種推測的基礎上, 還是認為“避難說”較為妥當。推斷出三界寺原址即位於莫高窟前, 藏經洞的文物應原是三界寺的供養具而非廢品, 此說從整體上把握了藏經洞遺書的前身出處及原有價值。文正義《敦煌藏經洞封閉原因初探》(《戒幢佛學》第 2 卷), 認為避難說和廢棄說都各有難圓其說之處, 藏經洞是佛教對於法物的供養方式, 它們是教團內部決定的結果, 不會受到外來勢力的壓迫; 是一種極為虔敬的宗教行為, 並非為對廢棄物的隨意處置。對藏經洞文書的原有價值, 提出了新看法。上山大俊《敦煌遺書的吐蕃特色與藏經洞封閉之謎》(《戒幢佛學》第 2 卷), 從敦煌文書中為數不少的藏文文獻為着眼點, 認為這批保留了吐蕃統治時期色彩的文獻, 是當時敦煌三界寺與淨土寺對已經“廢棄”東西的再處理, 所以才會將其彙聚在吐蕃時代開鑿的吳家窟。並以為敦煌遺書並不是反映敦煌佛教全貌的資料, 而只是某個特定範圍內的東西。

本年度介紹敦煌文獻流失及目前整理情況的文章有: 鄭惠珍《敦煌古籍流失及其整理的研究》(《茂名學院學報》2 期), 在簡述敦煌古籍流失過程的基礎上, 着重論述了它們的歷史價值及其分佈現狀, 並對近百年來敦煌古籍的收集整理成果作了概括和總結。曾雪梅《甘肅省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的來源及特點》(《檔案》6 期), 首先介紹了甘肅省圖書館藏漢、藏文敦煌寫經。其中漢文寫經 31 件, 大多寫於隋唐時期; 藏文寫經有卷式藏文寫經 32 件, 梵夾式藏文寫經 1128 頁, 寫於公元 781—848 年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其次回顧了當年藏經洞文書的三種流散途徑: 一部分被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國探險家劫掠出國; 一部分被解往京師的京師圖書館; 其他則為民間的散藏及個人收藏, 而甘肅圖書館的藏品主要來自後者。陳國燦《略論吐魯番出土的敦煌文書》(《西域研究》3 期), 概述了吐魯番出土的來自敦煌的官府文案、寫經和唐人文學作品, 從地域傳播的角度, 探討了文書在流傳中對兩地歷史文化交流的意義。並指出未來敦煌學的發展, 需以此進行廣泛聯繫性的研究。鄧明《關於〈甘藏敦煌文獻知多少?〉的一點補充》(《檔案》2 期), 對榮新江《甘藏敦煌文獻知多少?》文中有關周廷元以及《編目贅言》中涉及到某些官紳履歷不甚清楚的地方, 做了補充。

對敦煌文獻的分類整理與刊佈, 探討其來源與收藏, 以及文書的真偽辨別, 依舊是敦煌學界關注的話題。本年度的相關專著有: 王素《敦煌吐魯番文獻》(文物出版社, 2002 年 4 月), 介紹了敦煌吐魯番文獻的發現經過和研究的重要成果, 並對文獻的主要內容與重要價值有所

評價。郝春文編著的《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 1 卷，於上年度出版（科學出版社 2001 年 8 月），與以往其他敦煌文獻的釋文專著相比，其特點是按敦煌文獻收藏地點的流水號次序對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進行整理。對該書的書評有：柴劍虹《〈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一卷出版》（《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3 期），趙和平《郝春文〈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一卷）》（《敦煌吐魯番研究》6 卷），胡同慶《〈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一卷）評介》（《敦煌研究》1 期），孟彥弘《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一卷（簡介）》（《中國史研究動態》5 期），從不同角度評價了該書所做錄文釋讀工作的重要意義。

有關敦煌文書的辨偽問題，余欣《浙敦 065 文書偽卷考——兼論敦煌文獻的辨偽問題》（《敦煌研究》3 期），在與各處藏品勘比之後，作者以為浙敦 065 號《三娘子祭叔文》與《建中三年（782）七月廿三日尼靈飯遺囑》是依據《沙州文錄補》為底本的贗品。這一發現對敦煌遺書的辨偽提出了一項新內容：即以前所疑偽寫卷多為佛經、典籍之類，很少涉及世俗文書，這一發現，證明世俗文書中也有偽卷。而以往對偽卷的製造，頗多猜測之詞，實證不多。該文所揭示的以早期錄文為底本的仿造，對今後敦煌卷子的辨偽工作應有很大啓發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有關敦煌學資料資料庫建設的設想，在實踐摸索中也逐漸有了相應的成果，如趙書城等《敦煌學 Web 資料庫的設計與實現》（《電腦應用研究》1 期），系統地論述了敦煌學 Web 資料庫的意義、特點：該資料庫是具有強烈的民族地域色彩的專題資料庫，是國內第一個較為全面的面向敦煌學研究的專業資料庫。並給出了該資料庫系統的設計結構和實現解決方案與步驟：全文庫在實現中分成三個部分，分別為敦煌學標準詞典的建立、網上机器人和全文檢索。石井公成《敦煌發現之地論宗諸文獻與電腦自動異本處理》（《戒幢佛學》第 2 卷），敦煌本地論宗文獻以斷片為多，這給研究者對文獻的搜集與檢索帶來極大不便。作者介紹了 NGSIM 電腦處理方法，即概率、統計性質的自然語言分析法，利用此法，可將文章以任意長短進行分割，以相對固定的辭彙進行查找，就不僅能對目前的有關成果進行再檢索，對今後的研究發展亦能提供啓示。

宗教

本年度敦煌宗教的研究以佛教研究的成果為多。2001 年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主辦了“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其會議論文集《敦煌佛教藝術文化論文集》，由蘭州大學出版社 2002 年 7 月出版，此書內容分為佛教文獻、佛教歷史、石窟考古與藝術、語言文學及其他等五個方面，其中以敦煌宗教及佛教文獻的研究為主。蘇州戒幢佛學研究所承擔了俄藏敦煌文獻第十一至十七冊佛教文獻的整理工作，該所主辦的《戒幢佛學》第 2 卷（岳麓書社，2002 年 12 月），是“中日敦煌佛教學術會議”的會議論文集，所收論文也以佛教史與佛教文獻的研究為主。其中方廣錫《敦煌寺院所藏大藏經概貌》（《戒幢佛學》第 2 卷），聯繫內地大藏經的情況，以北涼為始，到北宋初期，作者將敦煌地區寺院大藏經的概況分為混沌時期、形成時期、《內典錄》時期、《開元錄》時期等四個階段，分別探討其在各個時期的特色，力圖為我們復原中古時期敦煌寫本大藏經的歷史原貌，勾勒出敦煌古代佛教教團自身整理佛教文獻的大致情形。

有關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路徑，以往以為是從中亞西傳至吐魯番、敦煌，再經河西到中原地區。陳國燦《從敦煌吐魯番所出早期寫經看佛教的東傳西漸》（《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認為上述觀點其實是一種對佛教入華路線的誤解，佛教東傳首先是到達當時的政治中心洛陽、長安等地，而後再逐漸流布到河西、敦煌以至於吐魯番，佛教經典是東傳而又西漸的過程，而非直接東傳入華。敦煌的佛教，在當地民俗風化的浸染下，最後發展成爲一種被

研究者稱作“世俗佛教”的信仰形態，它在當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也均有其特色化的表現形式，如在喪葬禮俗、寺院生活、教義教規、民間信仰等方面，相關研究有：李正宇《唐宋時期的敦煌佛教》（《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認為唐宋時期的敦煌佛教是滲透到社會各階層的“世俗佛教”，它與當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緊密聯繫，是一種入世合俗、真偽一體尊奉的信仰，是別具典型的中國化、民族化、世俗化的佛教。同氏《唐宋時期敦煌佛經性質功能的變化》（《戒幢佛學》第 2 卷），以敦煌佛經為切入點，認為在唐宋之際敦煌佛教性質變化的時期，敦煌佛教典藏的範圍、內容、價值功用及其傳播手段等也發生了一系列“入世合俗”的變化，適應敦煌佛教發展世俗化的潮流。湛如《敦煌佛教喪葬律儀研究——以晚唐五代的七七齋會為中心》（《戒幢佛學》第 2 卷），認為七七齋會是晚唐五代敦煌齋會中的主要內容，印度佛教的中陰思想是其理論依據，敦煌的七七齋會是一種以釋為主，三教相集的喪葬禮俗，此時的七七齋會已經具備了相關的禮儀規制，一些疏帖、追念內容已呈現出固定型態。王蘭平《敦煌寫本 P.3973 歸義軍時期〈大般若經〉抄寫紙曆及其相關問題考釋》（《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由歸義軍時期的官方組織抄經，探討敦煌當地佛經的抄寫與流通過程。陸離《唐五代敦煌寺戶制度源流辨析》（《敦煌吐魯番研究》6 卷），考察了吐蕃王朝的三戶養僧制、寺院屬民制度和七戶養僧制及相關制度。郝春文《〈勘尋永安寺法律願慶與老宿紹建相諍根由狀〉及相關問題考》（《戒幢佛學》第 2 卷），先對 P.3223 號文書做出錄文，初步將文書的時代確定在公元 918 至 937 年間，並就敦煌寺院經濟研究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探討：執倉和寺院的直歲一樣，是一年一輪換。敦煌寺院中擔任執倉者的身份並不低，他們利用掌管寺院倉庫的便利，常以挪用和借高利貸的形式聚斂私財。從設置上說，沙州的各個寺院在“司”是具有隨意性的，並提出沙州寺內諸司與寺院綱管的關係及其與都僧統司、都僧統司下屬諸司的關係，都有待與進一步研究。高啓安《唐五代敦煌僧人飲食戒律初探——以“不食肉戒”為中心》（《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指出唐五代的敦煌僧人在飲食方面雖有與佛教戒律相背的違戒行為，如食“五葷”、公開飲酒，並在一些特殊的場合可以變通“過午不食”的戒律等，飲食戒律不是十分嚴格，但尚能保證不食肉戒。釋覺旻《從“三教大法師”看晚唐五代敦煌社會的三教結合》（《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認為伴隨佛教僧官官銜出現的“三教大法師”這一稱號，是敦煌民間信仰思想中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一種表現。陳麗萍《敦煌女性寫經題記及反映的婦女問題》（《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以女性群體為研究對象，從寫經題記為切入點，來看古代敦煌女性的社會生活、宗教信仰以及社會心理等。樓宇烈《佛經通俗宣講稿本——讀敦煌遺書中“講經文”劄記》（《戒幢佛學》第 2 卷），介紹了現存講經文的概況，並就有關講經文的名稱、講唱的開場儀式、對佛經通序的重視等方面，探討了佛教通俗宣講的問題。公維章《明清時期河西的民間觀音信仰》（《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從明清時期河西地區所見的觀音寺廟、流行的觀音傳說、送子觀音信仰等方面來看，雖然明清之際的河西佛教呈衰微的趨勢，但也有它保持發展的一面。此外，還有馬茜《歸義軍時期敦煌地區庶民佛教的發展》（《甘肅民族研究論叢》，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2 月），考察了歸義軍時期庶民佛教的表現形式、佛事活動和社邑發展對其的影響。鄭炳林、徐曉麗《敦煌寫本 P.3973〈往五臺山行記〉殘卷研究》（《敦煌學輯刊》1 期），認定僅存六行的文書是一篇通往五臺山的行記殘片，通過對行記與《諸山聖迹志》的對比研究以為，行記作者的旅行時間與《諸山聖迹志》的時間接近，很可能為同一作者；殘卷反映了敦煌與中原之間存在着一條北路，此路是咸通二年以前敦煌與中原的主要交通道路。文書記載敦煌僧人巡禮五臺山，從而證明五臺山佛教對晚唐五代敦煌地區佛教具有重大影響。

本年度利用敦煌佛教資料研究禪宗史的成果較多，如宗舜《敦煌寫卷所揭“彌勒禪”之

初探——北京圖書館藏月 091 (7119) 號卷子解讀之一》(《戒幢佛學》第 2 卷)，北圖月 091 (7119) 號《八婆羅夷經》，其中的一段短文裏提到了吐蕃贊普“乞裏捉足”的名字，文中還談及了彌勒禪法的修行方法。作者依此認為，八世紀左右的敦煌受吐蕃的影響，也流行吐蕃地區特有的彌勒禪法。田中良昭《敦煌的禪宗燈史——其出現之意義》(《戒幢佛學》第 2 卷)，認為現知禪宗史的主要文獻，除了《寶林傳》之外，其他均出自敦煌。作者從北宗、南宗、淨衆·保唐宗的燈史與敦煌本《六祖壇經》為主的禪宗重要經典這兩個方面，回顧了禪宗本身的發展史與禪宗研究的學術史，指出敦煌文獻對中國禪宗史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張子開《敦煌寫本〈六祖壇經〉的題名》(《宗教學研究》3 期)，該文在回顧述評國內外學術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從敦煌寫本的出現時間、書寫格式、題名與內容及當時禪風的關係、前題和後題的牽聯、古書的形制或體式等多個方面，提出和論證了自己對於敦煌寫本《六祖壇經》題名的看法。張子開《敦煌寫本〈六祖壇經〉中的修辭》(《綏化師專學報》2 期)，對敦煌寫本《六祖壇經》中出現的修辭現象進行了全面的歸納總結。並認為瞭解修辭不僅有助於從語言學角度弄清禪宗典籍所包含的意蘊，而且可藉以探索禪籍的形成過程。

還有一些對某一類佛典及相關問題的專題研究，如釋永有《敦煌遺書中的〈金剛經〉》(《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對敦煌遺書中所見 2000 余號《金剛經》以及相關題記研究，探討了《金剛經》遺書的製作年代、書寫樣式、書寫者以及供養者，認為《金剛經》是融入中古中國人社會生活中的一部重要佛典。杜斗城《流傳於日本的〈十王生七經〉與〈地藏十王經〉》(《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考證了《佛說十王經》出現的年代，涉及了日本“十王”信仰的流傳問題，並糾正了一些有關《十王經》的錯訛。李際甯《敦煌莫高窟北區 53 窟出土漢文〈華嚴經〉版本考》(《戒幢佛學》第 2 卷)，莫高窟北區出土編號 B53:1-2:1《華嚴經》卷十的版本應為《金藏》原版，這件實物第一次證明了《金藏》確曾流傳到了敦煌，並就《金藏》本流傳到敦煌的時間應在元代還是在金代，介紹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買小英《俄藏本〈十二時普勸四衆依教修行〉校勘和研究》(《蘭州大學學報》1 期)，參照法藏本，首次對俄藏《十二時普勸四衆依教修行》進行了校勘，並就該寫本之書寫年代及所反映之思想等問題做了初步的分析和研究。西本照真《敦煌抄本中的三階教文獻》(《戒幢佛學》第 2 卷)，全面介紹了迄今所發現的敦煌抄本中的三階教抄本，這些文獻對瞭解三階教禪觀思想與教團儀軌、揭示同時代的整個佛教思想的潮流以及佛教界的狀況，都具有重要意義。榮新江《有關敦煌本〈歷代法寶記〉的新資料——積翠軒文庫舊藏“略出本”校錄》(《戒幢佛學》第 2 卷)，先介紹了目前所見分藏於英、法、俄三國的 9 件敦煌《歷代法寶記》寫本，之後對日本石井光雄積翠軒文庫的藏本進行了過錄與研究，認為這件日藏本是從 S.516 等所代表《歷代法寶記》的原本簡化而成的，該卷的一些優點對校勘大有幫助。蕭登福《敦煌寫卷所見受道教避穀食氣思想影響的佛經》(《宗教學研究》2 期)，探討了敦煌出土有關避穀食氣方面的佛典，論述了佛教傳入後攝取了中土辟穀導引之術的事實。

本年度有關敦煌道教研究的專著有：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中華書局，2002 年 11 月)，利用敦煌遺書中所見的道教文獻，梳理晉唐之際道教發展的總體脈絡。同氏的單篇論文《古靈寶經的齋官制度與天師道及佛教的關係》(《敦煌吐魯番研究》6 卷)，認為創設齋官反映了以經典科教為核心的經教道教開始形成，而其道教講經制度的形成是借鑒了儒學與佛教的講經模式。王卡《敦煌本〈老子節解〉殘頁考釋》(《敦煌吐魯番研究》6 卷)，以為 S.6228v 殘片應是《老子節解》的唐代抄本，原書應成於東晉以後，並對佚文進行了輯錄與校釋。王卡《敦煌殘抄本〈陶公傳授儀〉校讀記》(《敦煌學輯刊》1 期)，論述了南朝道士陶弘景編撰《三皇經》或是《五法》傳授科儀，並在此傳世文獻的基礎上，校錄了敦煌本 S.6310、

S.3750+BD.11252+P.2559 四件殘抄本，補正了大淵忍爾《敦煌道經目錄編》的錯誤與脫漏。王卡《敦煌本〈洞玄靈寶九天生神章經書〉考釋》(《敦煌學輯刊》2 期)，考察了 BD.11190+4659《生神經》，以為以上抄本不應寫於唐初，而是 766 或 826 年的抄本，而 P.0268《生神經》殘片，可證《正統道藏》收入的三種古靈寶經疏，可能是南朝道士宋文明所撰《靈寶經義疏》。劉永明《試論曹延祿的醮祭活動——道教與民間宗教相結合的典型》(《敦煌學輯刊》1 期)，以 S.4400 與 P.2649 兩卷曹延祿時期道場奠文為中心，探討了與奠文有關的神靈崇拜、宗教禮儀、執事人員等問題，進而認為這兩次法事活動是道教與敦煌當地民間信仰結合的產物，也是歸義軍時期敦煌道教存在與發展狀況的實例，同時反映出了曹延祿本人並非篤信佛教的個人心理。葉貴良《〈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斯 63 號〈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校正》(《敦煌學輯刊》2 期)與馮利華《兩件敦煌寫本道經補校——以〈洞淵神咒經斬鬼品第七〉和〈太上靈寶洞玄滅度五練生屍經〉》(《西域研究》4 期)，則是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第一卷)釋文的基礎上，對以上三篇道經殘卷進行補校。

歷史地理

榮新江《敦煌學新論》(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和陳國燦《敦煌學史事新證》(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均為作者近年來在中古史與敦煌學方面已研究成果的結集，其內容涉及隋唐五代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族關係、中西交通等方面。郭鋒《唐史與敦煌文獻論稿》(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 10 月)，全書共分五個部分，與敦煌學有關的內容主要集中在唐史與敦煌文獻的研究、唐史與敦煌學人物評傳這兩個部分。本年度有關敦煌考古方面的成果則有：甘肅省博物館《敦煌佛爺廟灣唐代模印磚墓》(《文物》1 期)。而社會生活史、歸義軍史、歷史地理和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則是當年研究較多的課題。

歸義軍史方面，有馮培紅《歲稔民安——歸義軍保唐西境》(《甘肅文史》1 期)，簡單概括了歸義軍政權在晚唐之際安定西北一隅的歷史功績。

法律方面，王斐弘《敦煌寫本〈文明判集殘卷〉研究》(《敦煌研究》3 期)，指出 P.3813 號殘卷中的 19 件案卷為研究唐代法律的結構與特點提供了範例。李錦繡《俄藏 P.3555 號唐〈格式律令事類·祠部〉殘卷試考》(《文史》3 輯)，對僅存 10 行文字的 P.3555 號文書殘卷定名，並對唐前期禮祀的演變，《格式律令事類》的構成及影響等提出了己見。楚永橋《〈燕子賦〉與唐代司法制度》(《文學遺產》4 期)，認為《燕子賦》以寓言的形式描寫了一件民事案件發生、審判、結案的全過程，較多涉及了唐代法律制度的諸多情況和特點。

對古代敦煌區域經濟的研究，歷來以借助藏經洞文書為主，但大量漢代簡帛的整理發表，為這一課題的研究增加了一種全新的原始材料。李炳泉《西漢西域渠犁屯田考論》(《西域研究》1 期)，以敦煌懸泉簡材料和傳世文獻相參證，對西漢西域渠犁的屯田問題進行了研究，提出渠犁屯田性質為軍屯，並就其組織和管理系統作了探討。李寶通《敦煌索勤樓蘭屯田時限探蹟》(《敦煌研究》1 期)，對正史缺載的敦煌人索勤在魏晉之際屯田樓蘭即相關史事進行了考證。張萍《敦煌西魏文書殘卷研究》(《西南民族學院學報》5 期)，概述了敦煌西魏文書殘卷的研究現況，並對文書的名稱、性質及西魏賦稅等方面做了新的探討。陳國燦《莫高窟北 47 窟新出〈唐開元廿四年(736)後丁租牒〉的復原與研究》(《敦煌研究》2 期)，對莫高窟北區出土的殘片，經複合、定名，可知其中反映的新信息，有助於深入和補充瞭解唐代官府征納丁租、租腳及營窖錢的情形。劉進寶《歸義軍土地制度初探》(《西北史研究》第 2 輯)，認為唐朝後期國有土地的縮減，使歸義軍手裏沒有充分的可供分配的土地。作者引敦煌文獻中的材料證明歸義軍時期土地買賣及私有土地迅速的擴大。劉進寶《歸義軍政權稅柴徵收試

探》(《西北史研究》第 2 輯), 根據 S.3758 號文書對徵收稅柴的種類和數量做了概括, 再引了幾件文書論述稅柴的徵納方式, 最後簡要探討了稅柴的徵收機構。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等價物》(《中國史研究》3 期), 認為敦煌晚唐五代的貿易市面上雖用金銀、錢幣、布帛等支付物價, 但因為上述物品的分割困難, 所以對於一般的市面交易, 當時更多使用麥粟等糧食作為等價物。乜小紅《試論唐五代宋初敦煌畜牧區域的分佈》(《敦煌研究》2 期), 考察了敦煌地區下設的四處主要牧區——湖澤畜牧區, 紫亭牧區, 階亭坊—常樂縣苦水下遊牧區和其他零散牧區。

關於人物的研究有顏延亮《有關張球生平及其著作的一件新見文獻——〈佛說摩利支天菩薩陀羅尼經〉序〉校錄及其他》(《敦煌研究》5 期), 對 S.2059 號序文初步加以校錄, 進而探討了張球的著作、郡望以及生平。以為通過這篇序文, 提出對張球與張景球是否為同一人, 還需要再商榷。張球在序文中所自稱的“山陰縣人”, 似應是其出身地而非郡望。而序文實際上彌補了張球在唐咸通五年(846)以前的大致情況。徐曉麗《回鶻天公主與佛教》(《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 由曹議金的回鶻天公主夫人在敦煌的諸種佛事活動, 來透視她作為當時重要政治人物的內心世界及其婚姻實質。徐曉麗《敦煌石窟所見天公主考辯》(《敦煌學輯刊》2 期), 則對敦煌石窟所見的七位天公主的具體身份進行了考辨, 認為她們供養畫像的出現是曹氏歸義軍時期民族關係的產物。

中西交通史與人文地理的研究, 本年度出版的專著有: 孫修身的遺著《敦煌與中西交通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9 月), 該書通過歷史文獻與佛教藝術、絲綢之路的形成, 唐朝與印度、突厥、吐蕃的關係, 唐朝的佛教藝術文化和印度醫學、曆法等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等專題研究, 指出敦煌在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2001 年出版的榮新江的專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 不僅是作者關於中西文化、交通史研究的成果, 也是以全新視野看待和研究中外文明傳承與衝突的成功之作。相關書評有: 陳明《新材料·新問題·新史識——讀榮新江教授新作〈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西域研究》2 期), 李鴻賓《中西學術之間: 榮新江新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4 期), 許全勝《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唐研究》第 8 卷)。馮培紅、姚桂蘭《歸義軍時期敦煌與周邊地區之間的僧使交往》(《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 指出歸義軍時期由僧人作為使節出使各地, 是當時政治交往的重要形式之一, 這反映了歸義軍政權與佛教的密切關係。敦煌文書所見的多民族僧人, 也反映了敦煌是中西佛教文化交流的中心。吳麗娛《再析 P.2945 書儀的年代與曹氏歸義軍通使中原》(《敦煌研究》3 期), P.2945 書儀反映了五代時期曹氏歸義軍遣使中原的史實。因為歸義軍政權與周邊少數民族的複雜關係, 在朝貢路上, 一直受到靈武節度使的幫助以至武力“照拂”。《試論晚唐五代的客將、客司與客省》(《中國史研究》4 期), 唐後期五代, 接待四方來使的禮儀機構和官員在中央為客省和客省使, 在地方則是客司與客將。中央機構和官員主要負責藩鎮派至朝廷的人事往來, 而客司和客將贊導藩鎮禮儀, 接待朝廷及他鎮來使, 其職一同於中央的客省和客省使。敦煌書儀和傳世史料中相關書函的出現, 表明了以上職司在禮儀方面的特殊作用。該文則利用敦煌書儀, 通過對兩者職能的分析比較, 來論證唐後期五代藩鎮體制下中央和地方在禮儀職司方面的對等與互接作用。趙貞《大中二年(848)沙州遣使中原路線蠡測》(《中國邊疆史地研究》3 期), 結合 P.2748 號文書及有關史籍和地理志書, 對大中二年沙州遣使中原的交通路線進行了合理的推測, 進而勾勒出了使節行走的大致路線。李樹輝《Sar■(R 倒写)Uj■(R 倒写)U ur 考源——兼論龜茲回鶻與沙州曹氏歸義軍政權的關係》(《裕固族研究論文續集》上), 探討了張氏與曹氏歸義軍政權與周圍幾個回鶻政權間的征戰與相處。

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歸義軍行政區劃制度研究(之一)、(之二)》(《敦煌研究》2、3期), 分別考察了歸義軍時期所轄地區州、縣兩級行政區劃的情況。華林甫著《中國地名學源流》(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6月), 其書第四章第五節辟為《敦煌文書的地名學意義》, 可見在中國地名學的範疇內, 敦煌地名的研究價值也佔有一席之地。

李並成一直致力於研究西北古代自然地理及環境的變遷。他的《歷史上祁連山區森林的破壞與變遷考》(《西北史研究》第2輯), 首先概述了歷史上祁連山森林的覆蓋狀況, 然後分為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明清三個時段分別敘述。以唐代最重要, 引用了大量關於開窟伐木及歸義軍時期“柴草”稅的敦煌文書, 說明瞭森林的破壞與變遷情況, 提醒人們汲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河西走廊漢唐古綠洲沙漠化的調查研究》(《西北史研究》第2輯), 先列舉了10片漢唐古綠洲沙漠化區域, 再從地理分佈和形態結構上指出其特點, 最後對漢唐古綠洲沙漠化過程的時代和原因進行了簡要分析。《漢唐冥水(籍端水)冥澤及其變遷考》(《西北史研究》第2輯), 列舉了歷史上各種地理志書都認為冥水即疏勒河。冥澤, 一認為即敦煌西北的哈拉池, 一認為玉門縣西北以迄其東的青山湖、布魯湖、花海子一帶, 接着提出自己的看法, 認為上述兩種觀點皆不妥。作者引用大量材料證明冥水是疏勒河的重要支津, 冥澤在唐晉昌縣境內, 是唐主要牧地, 最後分析了冥澤消失的原因。

古籍

本年度關於古代典籍整理的成果不多。許建平《北敦 14681 號〈尚書〉殘卷的抄寫時代及其版本來源——與王煦華先生商榷》(《敦煌學輯刊》2期), 王煦華以為該卷抄成年代在唐高宗時期, 並經過范寧改定。而作者以為其成書年代應推後至高宗朝以後, 玄宗朝之前。而其版本來源應是蕭齊姚方興本, 而非東晉范寧改字本。張娜麗《〈敦煌本〈六字千文〉初探〉析疑(續)——兼述〈千字文〉注本問題》(《敦煌研究》1期)與《敦煌本〈注千字文〉注釋》(《敦煌學輯刊》1期), 前文主要對邵惠莉所錄敦煌本《六字千文》的部分作了補校, 後文以為敦煌本《千字文》非李暹原注, 並探討了《千字文》對後世的影響。鄭炳林、徐小麗《俄藏敦煌文獻〈新集文字九經抄〉寫本綴合與研究》(《蘭州大學學報》1期), 對八個俄藏寫本卷號進行了正名與綴合, 認為這是同一原卷分裂所致, 可以拼接綴合為三塊, 但與英法藏本不能互為淵源底本。同作者《敦煌研究院藏李翰〈蒙求〉試解——與日藏古抄本之比較》(《敦煌研究》5期), 對編號為敦研 95 號的三件抄本殘卷, 與日藏本比照研究, 並將敦研本全文校錄。

社會

社會生活史的研究包羅了中古時期的家族、家庭、婚姻和衣食住行, 社會交往等各方面。宋曉梅《高昌張氏家族的敦煌源流》(《尋根》4期), 將吐魯番與敦煌兩地的張氏進行了族源聯繫: 高昌張氏源出敦煌, 本自於內地。而張氏家族以其特殊的出身地域、家族門第和家世門風對高昌國政權產生了重要影響。鄭顯文《唐代家庭財產繼承制度初探》(《中國文化研究》3期), 充分利用了敦煌文書中諸如遺囑、財產分割的文書, 對唐代家庭財產繼承制度進行了補充式的表述和研究。邢鐵《唐代家產繼承方式述略》(《河北師範大學學報》3期), 發現從敦煌文書中所見唐代家產的繼承方式, 都遵循了家庭利益為上的原則。楊慧玲《敦煌契約文書中的保人、口承人、同便人、同取人》(《敦煌研究》6期), 認為敦煌民間私契中以親屬為主的擔保人, 反映了當時濃厚的家族觀念、宗法思想。而且契約中的見證人, 身份不分貴賤, 男女老幼皆有。張豔雲《從敦煌的婚書程式看唐代許婚制度》(《敦煌研究》6期), 以為敦煌

本的婚書既可看作是唐代婚書的樣文，也可看作是唐代法律規定互報婚書、訂立私約、接納聘財作為衡量婚姻關係是否成立的實施範例。高啓安《唐五代敦煌的“飲食胡風”》(《民族研究》3 期)，依據敦煌文獻和敦煌壁畫的資料，從食物原料、飲食品種、飲食器具、飲食禮儀、“胡姬酒肆”、飲食結構等方面檢討了唐五代敦煌地區飲食中的“胡風”現象，進而討論了敦煌地區“飲食胡風”濃重的原因和特點，以及其在中西飲食文化傳播中的作用。盛會蓮《唐五代百姓房舍的分配及相關問題之試析》(《敦煌研究》6 期)，認為一般百姓獲得宅舍的途徑是隨着土地制度的變遷而變化的，主要的變化是從最初的無償口分授地至晚唐五代政府要向百姓徵收房屋稅。段小強、陳康《從敦煌〈杖前飛〉談唐代馬球運動》(《敦煌研究》6 期)，從敦煌寫本《杖前飛》窺知唐代馬球比賽運動的器具、場地、競技規則等情況。

孟憲實《論唐宋時期敦煌民間結社的組織形態》(《敦煌研究》1 期)，認為敦煌民間結社的自願與平等性是它的組織形式，這也決定了它的強大歷史活力。黃正建《關於〈俄藏敦煌文獻〉第 11 至第 17 冊中占卜文書的綴合與定名等問題》(《敦煌研究》2 期)，作者檢得《俄藏敦煌文獻》11 冊以後的碎片中，沒有定名的占卜文書約有 27，該文對其中 16 件殘片進行了定名與拼接。趙貞的書評《黃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唐研究》第 8 卷)，首先敘述了占卜文書的研究概況，然後對該書逐章做了點評。又從文書的收錄、分類、定名、解題等方面，就《研究》的相關問題作了評價。陳于柱、魏萬斗《唐宋陰陽宅宗初探——以敦煌寫本宅經為考察》(《敦煌學輯刊》2 期)，對敦煌本宅經與傳世本宅經有關陰陽二宅的若干規定進行了對比與組合，探究了陰陽相宅宗的理論內涵與特點。王愛和《摩醯首羅葡性質初步分析》(《敦煌佛教藝術文化論文集》)，以 S.5614vb 號為例，考證出它是南北朝僧人創制的旨在教化的葡書，這反映了外來佛教文化與傳統“易占”文化靠攏、相互調適的心理。

吳麗娛《唐禮摭遺——中古書儀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 11 月)，該書以敦煌所出三大類書儀——朋友書儀、吉凶書儀、表狀箋啓書儀為主要研究對象，對書儀進行分類和系統化研究，勘正某些書儀的史實和年代，探討各類書儀產生的源流、性質、內容結構演變等。結合敦煌文獻和其他傳世史料，討論與書儀本身和中古社會相關的各種禮儀，涉及書信程式、婚喪禮俗制度、朝儀官儀等內容，將禮儀的研究擴展到政治和社會生活的諸多方面，並通過書儀和禮儀研究展現中古禮儀社會的各種細微表現和特點，揭示在古禮與魏晉南北朝禮儀、唐代制度和民風習俗交互影響下，唐五代禮儀的全貌和發展方向。此外，同氏的系列單篇論作，如《再論複書與別紙》(《燕京學報》13 期)，指出複書在唐人改革文體前曾被廣泛使用，並認為吉凶書儀中複書的減少、改革和別紙的不斷增加是書信體裁適應官僚社會發展變化的需要。此外，杜琪《書儀緣起蠡測及敦煌書儀概說》(《社科縱橫》6 期)，從總體上介紹了敦煌遺書中所見的 100 餘件書儀，並依據其具體形制及相關內容將他們劃分為三類：一是儀注型，主要是指其作品彰示的文體格式，着重在於體現一種以《三禮》為思想統制的封建禮儀規範。二是專題型，是指一些在形制上承襲魏晉之際《月儀》而又有某種變易，在事用走向上又相對集中專一的作品。三是實例型，作者以為敦煌遺書中以“別紙”名之的書劄範本即是。

有關文化教育論著有：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2 月)，歸類出了寫本識字類、知識類、德行類等三種敦煌蒙書類，論述了敦煌蒙書的性質與價值。

少數民族歷史與語言

關於西北古代少數民族的研究，一部探究裕固族族源的論文集《裕固族研究論文續集》

(上、下)(以下簡稱上、下),集中了學者們一批相關已經發表過的研究成果,如榮新江《甘州回鶻成立史論》(上),楊富學《沙州回鶻及其政權組織》(上),李正宇《悄然湮沒的王國——沙州回鶻國》(上),楊富學《9—12 世紀的沙州回鶻文化》(下),楊富學、贊丹卓尕《近年國內河西回鶻研究綜述》(上)等,從不同角度勾勒了曾經活動在北方廣闊境域裏回鶻族的演變歷史和研究現況。勞心《從敦煌文獻看 9 世紀後的西州——兼論吐魯番出土回鶻文木柁文書年代和沙州回鶻的興衰》(《敦煌研究》1 期),探討了西州回鶻的建立、擴張與衰落的過程,並以爲沙州回鶻來自於甘州回鶻。胡小鵬《元明敦煌與裕固族的歷史關係》(《西北史研究》第 2 輯),先敘述元代蒙古族在敦煌一帶的活動,認爲蒙古族是裕固族形成過程中的主源,然後論證裕固族東遷起點“西至”、“哈至”是漢語沙州、瓜州譯成阿爾泰語系語音後,再譯回漢語的過程中音變的結果,最後從裕固族民諺“三下頭目都姓安”,說明裕固族東遷前的居地就在敦煌。對吐蕃歷史的研究有:金滢坤《吐蕃瓜州節度使初探》(《敦煌研究》2 期),概述了吐蕃瓜州節度使的隸屬、職權範圍以及它在唐蕃戰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還考證出了歷任的節度使名及任期。徐曉麗、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吐谷渾與吐蕃移民婦女研究》(《敦煌學輯刊》2 期),對當時吐蕃與吐谷渾婦女的居住地、婚姻生活、經濟活動與宗教信仰等進行了考察。錢伯泉《唐代瓜州的墨離軍與河西地區的吐谷渾》(《貴州民族研究》4 期),分析了墨離軍的名稱和駐地,並考察了“墨離”得名的由來,認爲它是設置在瓜州的大軍鎮,其將士多爲吐谷渾人。

對少數民族語言文獻的整理與研究成果集中在回鶻文與古藏文文獻。鄧浩、楊富學《西域敦煌回鶻文獻語言研究》(甘肅文藝出版社,2002 年 6 月),對回鶻的歷史文化及西域敦煌回鶻語言文獻的出土研究情況做了介紹,探討了回鶻文獻語言的語音、辭彙、和語法現象。韓香的書評《回鶻史研究的一部新作——〈回鶻文契約文書初探評介〉》(《西域研究》2 期),從回鶻文書研究史的角度評價了劉戈的專著《回鶻文契約文書初探》:它拋開了傳統的語言學角度,而從史學角度研究利用了這批資料,並力求復原它們在現實社會中的產生和應用意義。劉戈《回鶻文契約中“bil”與漢文契約中的“知”現象考》(《民族研究》5 期)與《回鶻文契約文書中 bitidim 的寫法》(周偉洲主編《西北民族論叢(第一輯)》),探討了回鶻契約文書中的某些單詞的詞意。對非漢文佛教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以回鶻文獻爲多。對回鶻文佛教文獻整理研究的成果回顧及介紹的文章有:楊富學《敦煌回鶻文佛教文獻及其價值》(《戒幢佛學》第 2 卷),敦煌發現的回鶻語文獻,約佔存世回鶻文佛教文獻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其出處有兩處:一爲藏經洞的 50 餘件,時代在 9-11 世紀,但其中的佛經譯本,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翻譯,且碎片過多。二是出自於莫高窟北區 464、465 等元代洞窟的回鶻文佛教文獻,數量較多,篇幅較長,保存也較好,是研究蒙元時期回鶻語文、佛教狀況、哲學思想極具參考價值的歷史文獻。牛汝極《敦煌吐魯番回鶻佛教文獻與回鶻語大藏經》(《西域研究》2 期),先是探討了回鶻佛教的來源,認爲漢地佛教對其影響最大。之後介紹了回鶻佛教文獻的書籍形式、翻譯家,對已經整理刊佈的 90 餘種回鶻佛教文獻進行了分類並給出佛教文獻名稱及對應的梵文或回鶻語形式。此文還探討了回鶻語大藏經存在的客觀性及其命名的科學依據。牛汝極《回鶻藏傳佛教文獻》(《中國藏學》2 期),對 16 件回鶻藏傳佛教文獻作了概括總結,交代了收藏地和編號、整理者及其成果、以及參考文獻等,認爲它們是回鶻與藏族文化交往的歷史證明。牛汝極《莫高窟北區發現的敘利亞文景教——回鶻文佛教雙語寫本再研究》(《敦煌研究》2 期),針對張鐵山、段晴等人研究成果中的欠缺,對該文獻重新進行了轉寫和翻譯,認爲敘利亞文部分是出自中世紀敘利亞基督教堂中使用《禮儀書》中《聖經文選》;回鶻文部分是一首佛教內容的韻文,大概與《般若經》有關。張鐵山《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敦煌本回

鶻文〈雜阿含經〉殘葉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4 期)和《敦煌莫高窟北區 B52 窟出土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實義疏〉殘葉研究》(《敦煌學輯刊》1 期),認為這兩件回鶻文佛經的殘葉都是摘取漢文原文部分詞句而成的節譯本,其抄成年代都應在元代。而後者與大英圖書館藏的 75A-1a 雖在內容與年代上接近,但二者的版本不同,可見不能互相拼接。

對敦煌古藏文文獻的研究有:尕藏加《敦煌吐蕃藏文文獻在藏學研究中的史料價值初探》(《中國藏學》4 期),從歷史學、宗教學、語言文學、醫學曆算等幾個方面,論述了敦煌古藏文文獻在藏學研究領域中的資料價值:它印證了和補充了藏漢文正史,在國際藏學界大大提高了藏族傳世史書的可信程度。但它自身也存在有零亂分散、譯解困難等不足之處,所以在研究中也應注意不能將其視作獨立的資料依據。孫林《盟誓文誥:吐蕃時期一種特殊的歷史文書》(《中國藏學》2 期),對吐蕃王朝的王室檔案——盟誓文誥的產生基礎,吐蕃時代有關文獻學的知識體系以及盟誓文誥的性質、書寫程式和其所具有的史學史意義、價值等方面加以分析與探討,並認為由此可以揭示長期不為人所知的吐蕃史學與文獻學獨有的分類體系以及相應的史學觀念。王堯《從敦煌文獻看吐蕃文化》(《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 10 月),首先概述了吐蕃的發展歷史,而各種性質的敦煌吐蕃文書則真實具體的記錄了隋唐以來吐蕃在河西地區活動的基本情況。沖本克己《敦煌發現的藏文禪宗文獻及所遺課題》(《戒幢佛學》第 2 卷),提出對敦煌發現的藏文禪宗文獻研究,以戴密微《吐蕃僧諍記》為最高成就,但還有許多當時的研究不曾挖掘出的遺留課題有待深入。黃維中《敦煌市檔案局所藏藏文寫經定名》(《敦煌學輯刊》2 期),對該館所藏 12 件古藏文佛經加以定名外,並介紹了藏品的編號和外觀,對寫經題記與佛經首尾行的原文進行了轉錄。羅秉芬《敦煌本吐蕃醫學文獻精要:譯注及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2002 年 12 月),該書收集了敦煌古藏文醫學文獻漢文譯文 6 篇,相關論文 12 篇,摹寫本 6 篇以及對應的詞語注釋等。同氏的單篇長文《敦煌本吐蕃醫學文獻〈長卷〉譯注》,分兩個部分在《中國藏學》(2、3 期)上連載,對該卷中的 57 條醫方和各種動植物和礦物的藥物名稱等進行了藏文摹寫、翻譯及詞語注釋。

考古與文物保護

本年度石窟考古的成果多為對莫高窟及附近遺址的考察與發掘。馬德《莫高窟新發現的窟龕與墓塔遺跡》(《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對大泉河東岸、城城灣的窟龕遺跡,莫高窟附近的塔林遺跡進行了概括介紹,並提出清理設想。還有兩篇考古發掘報告:蔡偉堂等《敦煌莫高窟上寺中寺發掘簡報》(《敦煌研究》1 期),沙武田《敦煌莫高窟第 72——76 窟窟前殿堂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4 期)。沙武田《關於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資料》(《敦煌學輯刊》1 期),對陸續公佈的莫高窟北區石窟考古資料簡要的述評,說明其對敦煌學研究的價值所在。綜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如榮新江從文獻研究的角度提出的“北區類型的文獻材料”這一新概念;陳悅新就北區石窟為“僧房窟”提出的“禪窟等類與生活密切相關的窟室統歸入僧房窟的廣義概念”,認為應將北區石窟的研究納入整個敦煌學研究體系中,否則只就北區洞窟本身的討論有可能會陷入無法前進的地步。陳明、沙武田《莫高窟第 98 窟及其對曹氏歸義軍時期大窟營建之影響》(《敦煌佛教藝術文化論文集》),以 98 窟的窟型、內容、名號與開鑿背景研究為例,希望能對五代末初曹氏歸義軍時期莫高窟的興建作一檢索,即歸義軍時期大窟的營建是建立在曹氏政權內部和外部環境相對穩定的基礎之上的。沙武田《莫高窟盛唐未完工中唐補繪洞窟之初探》(《敦煌研究》3 期),認為莫高窟大約有 20 多個洞窟創建於盛唐時期,但由於吐蕃對沙州的征戰以及戰後的吐蕃統治,使得這些洞窟在創建之後的很長時

間裏才得以完成，這反映出了唐後期敦煌地區的社會動蕩對人們文化生活的重大影響。

石窟保護是隨着年代久遠推移，讓我們所面臨的困難問題之一。如何將古代藝術的寶庫永遠地保護下來，是敦煌學存在與發展所面對的一大現實問題。正如樊錦詩在《開拓進取 再創輝煌》(《人大研究》1 期) 所呼籲：為了使脆弱的稀世珍寶莫高窟免遭破壞和適度利用，使其世代相傳，永續利用，建議甘肅省人大儘快制定出臺《敦煌莫高窟保護管理條例》，以文物法為依據，明確闡明莫高窟的珍貴價值、地位和保護範圍，明確具體地規定管理體制、管理內容、標準責任、執法主體、懲戒等，保障莫高窟的保護和使用納入法制的軌道。2002 年第 4 期《敦煌研究》為石窟考古研究保護專號，彙結了敦煌研究院近年來對石窟保護所做的工作，其中有綜述性的介紹，如樊錦詩《〈敦煌莫高窟保護與管理總體規劃〉的制定與收穫》，William G-Bown、樊錦詩《中美合作研製敦煌數位圖像檔案》。壁畫彩塑製作材料研究的成果有：李最雄《敦煌莫高窟唐代繪畫顏料分析研究》，王進玉、王進聰《敦煌石窟銅綠顏料的應用與來源》，馬贊峰等《偏光顯微鏡在壁畫顏料分析中的應用》。壁畫彩塑修復研究的成果有：李雲鶴、李波《〈石窟彩塑壁畫的搬遷與復原技術探討〉——以敦煌南湖店洞窟搬遷復原為例》，范宇權等《修復加固材料對莫高窟壁畫顏料顏色的影響》。遺址保護研究的成果有：李最雄《絲綢之路石窟的岩石特徵及加固》。遺址環境研究的成果有：汪萬福等《昆蟲對石窟壁畫的危害與防治研究》，秦全勝等《敦煌莫高窟窟區樹木蒸騰耗水量的估算》，郭青林等《安西榆林窟環境特徵》等文。

其他雜誌所見敦煌石窟保護的相關論文有：林博明、羅微《敦煌莫高窟地區風沙移動與磨蝕的控制方法》(《絲綢之路》12 期)，指出風沙移動與磨蝕和其他原因，已對玉門關和靠近敦煌的唐代破城子等上百處西部歷史文化遺迹造成了破壞。對風沙的治理，應以廣植林木為基本措施，輔之以其他有效的科學防護措施。石宜輝等《敦煌石窟彩塑漫遊技術》(《電腦應用研究》6 期)，以莫高窟洞窟漫遊系統為應用背景，介紹了系統中彩塑漫遊部分的相關技術、操作方法，以及實驗結果。張俊等《低端環境下實現虛擬敦煌漫遊即時傳輸與繪製》(《電腦輔助設計與圖形學學報》6 期)，描述一個用於敦煌洞窟三維重建和虛擬漫遊的即時交互系統。魯東明等《敦煌石窟虛擬重現與壁畫修復類比》(《測繪學報》1 期)，指出由於常年的風沙侵襲，敦煌壁畫已經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同時，由於地理條件的限制，也阻礙了敦煌石窟藝術的廣泛傳播。作者研究工作的目標就是利用虛擬現實、圖像處理與人工智慧等技術解決敦煌石窟虛擬重現、脫落壁畫復原與演變類比等問題，最終提高和改善文物保護研究的效率與效果。此外陳平等《反相高效液相色譜測定敦煌壁畫膠結材料中氨基酸》(《分析測試技術與儀器》)，華忠等《敦煌壁畫虛擬復原及演變》(《中國圖像圖形學報》2 期)，都是利用電腦等高科技技術對敦煌石窟保護及修復工作的有益探索。

藝術

本年度有關敦煌石窟藝術研究的專著有：敦煌研究院主編《敦煌石窟全集》，本年度出版的 3 卷為：王惠民編著《敦煌石窟全集·彌勒經畫卷》、鄭汝中、台建群編著《敦煌石窟全集》15《飛天畫卷》、鄭汝中編著《敦煌石窟全集》16《音樂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 年 9 月)。由中國美術分類全集編輯委員會主持編寫的《中國美術分類全集》系列叢書《中國壁畫全集——敦煌編》，本年度出版 2 卷，分別是張元林編著《西魏卷》和關友惠編著《晚唐卷》(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 年 11 月)。由盧秀文編著《中國石窟圖文志》(敦煌文藝出版社，2002 年 9 月)，是一部有關石窟研究的工具書，全書分為上、中、下三編。上編為《圖錄編》，內容包括全國重點石窟寺以及分佈在各省(市)、自治區的石窟、摩崖造像、壁畫等；中編為

《石窟志編》，內容包括石窟、摩崖造像的年代，地理位置，現存窟數，洞窟分期，窟內形制，內容題材，藝術特徵，宗教流派等方面；下編《論著目錄編》，共收錄 1802 年至 2000 年間中國大陸、港、澳和臺灣發展的有關著述上萬餘部（篇）。史葦湘的遺著《敦煌歷史與莫高窟藝術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該文集全面反映了史先生“敦煌本土文化論”與“石窟諸史論”的學術觀點。黃征主編《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論文集，也由南京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 10 月）出版，全書以對飛天藝術的研究為主。

本年度有關敦煌石窟藝術研究總述性的文章有：陳方平《有序的形式與自由的時空——敦煌壁畫構圖的裝飾性分析》（《西北美術》4 期），指出敦煌壁畫的裝飾性特點，突出地表現在畫面事物安排的有序性和自由性上。敦煌壁畫作為宗教藝術，目的是要傳達出一種宗教情緒。壁畫自由地運用美的規律，對畫面元素進行合理組合，統一安排，表現出秩序美。這種構圖的有序性，表現在畫面採用了均衡、對稱、中心式構圖形式。張應生、吳少明《敦煌壁畫形式構成初探》（《天水師範學院學報》3 期），認為敦煌壁畫在空間結構上與建築、雕塑的緊密結合，在平面形式結構上隨石窟總體藝術佈局和表現內容的不同而呈多樣化的特點，體現出敦煌壁畫優美的藝術形式和無窮的藝術魅力。

本年度就不同石窟群之間藝術風格的傳承與相互影響探討得比較多。《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收錄張先堂《南京棲霞山飛天與敦煌飛天圖像比較研究》，謝成水《從棲霞山石窟看南方文化對敦煌藝術的影響》，馬德《棲霞石窟與敦煌石窟的歷史淵源試探——兼論新發現的棲霞飛天的時代》，徐憶農《論南京敦煌兩地佛教藝術之關係》，劉曼春《六朝佛教藝術與敦煌佛教藝術對比研究》，楊雄《南朝風範 南國風情——棲霞飛天初探》，都以飛天壁畫、石雕、磁雕、磚雕為代表的南朝棲霞山石窟藝術與莫高窟藝術間的傳承聯繫進行了探討。霍旭初《敦煌佛教藝術的西傳——從新發現的新疆阿艾石窟談起》（《敦煌研究》1 期），就洞窟形制、壁畫題材內容、藝術風格、繪畫技法等方面的比較之後，發現阿艾石窟與敦煌石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對敦煌佛教藝術西傳有了時空方面的新認識。葉玉梅《敦煌文化對西藏佛教文化藝術之影響——敦煌壁畫與西藏壁畫比較》（《西藏藝術研究》2 期），從敦煌出土資料與敦煌壁畫兩個方面探討了其對西藏佛教與壁畫研究的意義。袁德領《試論莫高窟第 272 窟的內容》（《敦煌研究》5 期），指出開鑿於北涼時期的 272 窟，其內容是依據《法華經》的佛教思想而安排的，窟頂巨大的蓮花代表着佛法組成的一個世界。這種以蓮花喻佛法的傳統，一直延續到其後的雲岡、龍門石窟體系。張亞莎《印度·衛藏·敦煌的波羅——中亞藝術風格論》（《敦煌研究》3 期），認為波羅——中亞藝術風格的醞釀合成是由西北吐蕃完成的，之後又通過“下路弘法”而進入衛藏。楊雄《敦煌變文與壁畫內容之比較》（《西北史研究》第 2 輯），先概括了變文和壁畫的對應範圍，指出二者都應包括宗教類和世俗類，壁畫還包括裝飾類。接着列舉了變文與壁畫相同的內容，和明顯的不同的內容。

對敦煌石窟壁畫中所展現的各類佛教題材的研究有：王惠民《婆藪仙與鹿頭梵志》（《敦煌研究》2 期），將莫高窟北朝至初唐的 29 組婆藪仙與鹿頭梵志圖像劃分為三個階段，並考證了其經典依據和他們所體現佛教對外道的征服涵義。張元林《莫高窟北朝窟中的婆藪仙和鹿頭梵志形象再識》（《敦煌研究》2 期），對莫高窟 254、249 等 9 個北朝洞窟中所見的 8 對婆藪仙和鹿頭梵志形象所依據的經典和它們的作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不能把它們作為斷定窟內主尊為釋迦佛的依據。殷光明《敦煌盧舍那佛法界圖像研究》（《敦煌佛教藝術文化論文集》），對敦煌第 428 窟為代表的十餘幅盧舍那佛法界圖像作了研究，認為這一圖像在敦煌的興衰，與一定時期的佛教思潮以及歷史背景息息相關。[美國]Tianshu Zhu《中國佛教藝術裏的須彌山圖像》（《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通過對比對須彌山形象在印度、中亞、中原、

敦煌等地石窟系統中的表現，認為須彌山作為佛教三界輪回宇宙觀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其藝術形式在中國的唐前期，是很被重視並比較流行的。在唐以後的大乘佛教文化裏，須彌山的概念變得非常淡化，相應地其圖像也極為罕見，之後只見於密宗佛教裏。林瑩《談莫高窟壁畫中的佛教“本生故事”畫》（《蘭州教育學院學報》3 期），探討了佛教美術所宣傳的思想與中國當時不安的特定歷史環境之間的關係，揭示了佛教美術興起的原因。劉永增《阿彌陀經的光明信仰與藥師經的審判思想》（《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考察了經常出現在唐代敦煌石窟南北兩壁的阿彌陀經變與藥師經變，探討了這兩種信仰與波斯祆教的關係。袁德領《莫高窟第 196 窟前室北壁上部內容考辯》（《敦煌學輯刊》2 期），認為該窟北壁畫內容當為“祖師像”，題記內容是《付法藏傳》的略抄，此像的繪製與當時禪宗在敦煌的流行有關。公維章《莫高窟第 220 窟南壁無量壽經變劄記》（《敦煌研究》5 期），考證 220 窟南壁畫應是無量壽經變，而非早期認定的阿彌陀經變。並提出了莫高窟存在與以上佛經相結合的西方淨土變。趙聲良《雙飛天源流初探》（《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認為飛天起源於印度佛教藝術，傳入中國後，北魏晚期又受到南方繪畫風格的影響。最後還列出了《敦煌壁畫中雙飛天調查表》。謝生保《敦煌飛天形態姿態的來源》（《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指出敦煌飛天藝術是在印度、西域原有藝術形式的基礎上，融合了中國本土百戲雜技、樂伎舞蹈、武術體育姿態的精華，以及飛禽猛獸的形體姿態，克服了早期飛天蹲距形和“U”字形的弱點，才使敦煌飛天的形象形體多變而風采各異。

還有對敦煌石窟壁畫中佛教以外的題材與造型的研究，如對壁畫中的植物研究有：楊雄、楊春暉《敦煌壁畫中的竹畫》（《敦煌研究》5 期），從敦煌壁畫中搜尋出北朝、隋、唐、宋、回鶻、西夏直至元所畫的竹，並從畫史上找出了晉人畫竹的記載，將竹畫史提前了幾百年。杜元《早期山水畫與敦煌壁畫中的樹木描寫》（《敦煌學輯刊》2 期），認為中國繪畫藝術自唐代以後以山水為核心，而山水的精神恰好體現在對樹木的描繪上。敦煌壁畫中將樹木與人物貫穿一體，增加了壁畫的表現力度。對壁畫中的體育造型研究有：李重申等《敦煌莫高窟與角抵》（《體育文化導刊》1 期），王超《敦煌壁畫中的古代武術》（《中學歷史教學參考》4 期）。對壁畫中的裝飾圖案研究有：劉珂豔《淺析敦煌莫高窟背光圖案中火焰紋的演變》（《裝飾》4 期），認為背光與敦煌莫高窟藝術的發展脈絡一樣，也經歷了十六國、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時期。該文即考察了各個時期不同形式的背光，進而提出瞭解它的特點和演變規律。孫曉麗《敦煌莫高窟隋代藻井圖案類型分析》（《裝飾》4 期），認為藻井圖案是敦煌莫高窟裝飾藝術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歷時千餘年，形成完整的發展脈絡：早期（北朝）各窟窟頂為幾層方井套疊的建築結構，因此藻井圖案也以方井套疊為骨架，裏面裝飾忍冬、蓮花、火焰、幾何等紋樣，有的綴以飛天，總體風格較簡練；到隋代，藻井圖案的結構形式、裝飾內容、繪製手法開始變得豐富多彩；到唐代則更為華麗，達到鼎盛時期；五代、宋以後趨向簡單和呆板。壁畫中的樂器研究有：鄭汝中的專著《敦煌壁畫樂舞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書中主要分為敦煌樂舞壁畫的形成分期和圖式、敦煌壁畫樂器研究、敦煌樂器的分類考略，敦煌曲譜研究等內容。莊壯《敦煌壁畫上的打擊樂器》（《西安音樂學院學報》4 期），敦煌壁畫上的打擊樂器有如：腰鼓、擔鼓、齊鼓、箭射鼓、拍板、金剛鈴等，共計 34 種 2000 餘件，其中包括中原打擊樂器、西域打擊樂器和本地區本民族的民間打擊樂器。這些為研究中國古代傳統樂器，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圖像資料。此外，還有謝生保《敦煌故事畫中的刑罰》（《敦煌研究》6 期），對五百強盜成佛因緣、微妙比丘尼受難因緣、端正王巧斷失牛案等敦煌故事畫中所涉及的古代刑罰作了初步探討。車佐賢《轆轤與敦煌壁畫中的四輪車》（《敦煌研究》1 期），敦煌壁畫中的四輪寶幢車，對理解《孫子·謀攻》中所記的“轆轤”

有一定的借鑒意義。高啓安《莫高窟第 61 窟“五臺山靈口之店推磨圖”之我見》(《敦煌學輯刊》1 期), 以為 61 窟“靈口之店”圖並非“推磨圖”, 而應是“杠子壓面圖”。孫繼民《莫高窟第 61 窟五臺山“永昌之縣”小議》(《敦煌研究》5 期), 依據《太平寰宇記》和各種《行唐縣志》的記載, 考訂出該窟五臺山圖中“永昌之縣”即今河北省行唐縣。這有助於該窟建成年代、“河北道山門東南路”線路等問題的解決。牛汝極《敦煌榆林千佛洞第 12 窟回鶻文題記》(《新疆大學學報》1 期), 對敦煌榆林窟第 12 窟所存 10 餘則提寫於元代的回鶻文題記和第 19、28 和 36 窟各 1 則回鶻文題記進行了標音、轉寫、考證和譯釋。並認為這些題記有利於對榆林窟的斷代、族屬、藝術風格、佛教信仰和文化背景等作出系統完整的考查和把握。

對敦煌藏經洞及北區石窟出土藝術品的研究有: 謝生保《敦煌莫高窟發現的剪紙藝術品——兼論中國民間剪紙的淵源和發展》(《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 指出目前所見出敦煌的剪紙為分為出土於藏經洞和莫高窟北區的兩類。前者屬於功德剪紙, 用來敬供佛神; 後者是冥器剪紙, 用作祭奠亡者。它們的出土, 填補了中國唐、五代民間剪紙實物的空白, 解決了剪紙史上許多疑點, 是證明中國民間剪紙藝術與民俗緊密聯繫的例證。田中公明著, 劉永增譯《敦煌寂靜四十二尊茶羅》(《敦煌研究》5 期), 將莫高窟出土的 EO.1148 密教繪畫作品判定為寂靜四十二尊, 並對圖像內容進行了解析。李靜傑《五代前後降魔圖像的新發展——以巴黎集美美術館所藏敦煌出土絹畫為例》(《故宮博物館院刊》6 期), 認為集美美術館藏降魔圖, 應誕生於曹氏歸義軍時期的五代, 圖像中的釋迦佛表現出若干新時代造型特徵: 密教明王的出現增加了佛的威懾力; 釋迦佛神通變化以及轉輪王七寶被吸收進去, 強化了釋迦超人的性格; 圖像中還可見到來自印度帕拉朝美術的因素等。最後還推測此圖像出現與當時流行俗講的社會背景有關。

關於敦煌文獻書法藝術的研究有: 李春遠《關於敦煌遺書的書法化趨向》(《敦煌學輯刊》1 期), 從敦煌當地佛經的抄寫及抄經生題記為依據, 以為敦煌遺書的書寫者無疑形成了一種自成一體的書法模式, 與方孝坤《敦煌書法藝術述論》(《阜陽師範學院學報》1 期) 持同樣觀點。王志銘《論敦煌書法的藝術價值》(《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 首先認為敦煌寫經本身就是成熟而又深具獨特風格的傑出書法藝術品。再以敦研 019 號《大般涅槃經如來性品》以及其他書手的作品為例, 認為這些看似不合法度的作品, 卻蘊涵着豐富的書法新構型要素。黃征、江吟主編《敦煌書法精品(一)》(西泠印社, 2002 年 1 月), 這一冊以敦煌本《佛說生經》殘卷為鑒賞對象, 並擬將其他敦煌遺書中的書法極品, 一一展現在讀者面前, 以供鑒賞。

音樂和舞譜方面的研究有: 鄭祖襄《也談唐代的急、慢曲子》(《上海音樂學院學報》3 期), 結合《唐會要》及其他有關文獻, 認為敦煌樂譜中的急、慢曲子分別是以急慢為特點的兩種樂曲。以“急”為首字的曲子是同名曲子的一種變體。唐代的急慢曲子和傳統琵琶的文武曲有着歷史淵源關係。應有勤《中日對古譜涵義和解譯的比較研究》(《上海音樂學院學報》1 期), 論文着重對林謙三、葉棟、陳應時、席臻貫等四位學者對敦煌樂譜的研究理論和實際譯譜進行了兩個方面的比較: 一是同一首曲子中的四組相同旋律片斷的比較; 二是敦煌樂譜中三首不同曲子中相同的“間奏”旋律進行比較, 分析了四位學者譯譜的差異。並提出: 對古譜的解讀過程中, 對音高和節奏的處理必須符合它固有的內在規律, 才能夠使原有不同詞曲中隱含的相同旋律顯現出來。陳應時《中日琵琶古譜中的“、”號——琵琶古譜節奏解譯的分歧點》(《上海音樂學院學報》1 期), 由於諸家在解釋琵琶古譜中的“、”號時所持的論據尚嫌不足, 對於為何譜字旁的“、”號就是所謂琵琶演奏的“返撥”、“板眼”的“眼”、古詩調中的“短頓”或是“掣拍”中的“掣”, 大家都沒給以充分的論證。為此, 作者自 1988 年據宋代文獻記載提出用“掣拍”來解釋《敦煌琵琶譜》之後, 又繼續從樂譜自身的旋律形

態中尋求解釋“、”號的論據。應有勤《敦煌琵琶譜譯解——“擊拍說”與反撥研究的殊途同歸》(《音樂研究》1 期),旨在通過對唐代琵琶譜研究成果的分析,在古譜符號涵義的理解方面尋求較科學的研究方法。趙玉卿、鄭蓮《關於敦煌樂譜的定弦法研究》(《西安音樂學院學報》2 期),定弦法與節奏的考證研究,是敦煌樂譜研究的中心問題,也是最有爭論的問題。作者回顧了近年來的研究成果,認為敦煌樂譜研究雖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與其原貌還是有差距的。

語言文字

黃征《敦煌語言文字學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2 月),主要探討了敦煌語言文字學的性質、範圍、研究方法等,重點以敦煌俗字、俗音、俗詞的考證為重心,從文字學的角度對敦煌文獻作了校錄考辨。本年度相關研究的綜述性文章有:陳明娥《二十世紀的敦煌變文語言研究》(《敦煌學輯刊》1 期),從語料、辭彙、語音和語法四個方面對上世紀敦煌變文語言研究作了總結和展望,並指出了其中不足。

對敦煌文獻中的辭彙研究有:陳秀蘭《敦煌變文辭彙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 年 9 月),該書主要論述了敦煌變文中的新詞新義、新詞的產生、詞語新義的演變途徑,敦煌變文中的構詞、構形、語素等問題。楊秀英《敦煌願文社會交際稱謂詞研究》(《廣西社會科學》6 期),考察願文中的社會交際稱謂詞,總結其發展變化的規律,找出其在願文中發展演變的痕跡,並簡要分析稱謂詞與傳統文化的關係。陳明娥《從雙音新詞的存亡看敦煌變文在漢語史上的地位》(《中南民族大學學報》5 期),統計敦煌變文出現的 1879 個雙音新詞中,在近代漢語中完全保留下來的有 1050 個,約佔總數的 55.88%。還有一部分新詞在與變文同期的唐五代文獻中仍見用例,但宋以後逐漸走向了消亡。進而考察了敦煌變文新詞在近代和現代漢語中的存亡情況,分析它們消亡的原因及變文語言在整個漢語史上的地位。董志翹《敦煌社會經濟文獻詞語略考》(《語文研究》3 期),認為近年來關於敦煌文獻詞語考釋的論著層出不窮,然最多的還是圍繞敦煌變文的詞語研究。他則對《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迹釋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敦煌文獻語言詞典》中有關經濟文獻的詞語,參照有關傳世文獻及方言材料,進行了考釋。葉貴良《〈敦煌文獻字義通釋〉釋義商榷舉例》(《敦煌研究》3 期),對《敦煌文獻字義通釋》一書中所見的“空”、“接括”、“簡”三詞的釋義提出商榷。指出“空”應為待批、待複義,“接括”即接話,“簡”為察看清楚、心裏明白之意。曾述忠《敦煌文獻詞語考釋一則》(《古漢語研究》期),認為 S.4705《某寺諸色物破曆》中出現的“查”,應該是用一個個木椿打在水流中,象個木柵,再編織一些枝條在其中,阻遏流水,擡高水位,諸如水堰之類的攔阻物。陳秀蘭《敦煌變文詞語校釋》(《古漢語研究》2 期),以傳世文獻為佐證,校釋了敦煌變文中的“弊”、“映”、“不逆”、“正格”、“忽”、“贊舉”、“小妻”等詞語,尤其重要的是指出了“小妻恩厚,難為與替死之門”句中的“小妻”當為妾,而不應改為“少妻”。張生漢《敦煌願文校讀劄記》(《河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4 期),對黃征、吳偉輯校《敦煌願文集》中所見的“抽減、嚴瑩、嚴麗”三個詞的意義及書寫形式等提出了己見,認為用於疾病方面的“抽減”實當作“瘳減”,“嚴瑩”的“瑩”其本字為“鑿”,“嚴麗”用作動詞表示裝飾、修飾的意思。鄧鷗英《敦煌變文俗語詞劄記》(《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對《敦煌變文校注》中所見的莫越、辭退、荒虛、緣等十組辭彙進行了字意考訂。楊秀英《敦煌願文詞義試解》(《山東教育學院學報》3 期),對敦煌願文中的“即體”、“節兒”、“至孝”、“法律”四個詞語加以解釋。竺家甯《敦煌卷子 P.4663 辭彙研究》(《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以竺法護所譯《正法華經》所見反映當時口語

習慣的複合詞進行了考釋。葉貴良《“州”字考》(《淮南師範學院學報》1 期)，依據敦煌寫本，確證辭書中“州”字當為“刑”字。楊秀英《從願文複數表示法看複數詞尾“們”的產生》(《殷都學刊》2 期)，考察了敦煌願文中的複數表示法，試將其與宋代“們”的早期用例作一比較，並同元代白話碑中的用例相參證，考察複數詞尾“們”發展演變的軌迹。陳秀蘭《“五輪投地”來源考》(《西南民族學院學報》4 期)，考證出“五輪投地”一詞的語源，應是梵文 *panca -mandala -pranama* 的意譯，並從漢文佛典中找到對應的例子。鄧鷗英《說“中間”、“之間”、“間”》(《語言研究》3 期)，“中間”在敦煌變文及《遊仙窟》等唐代俗文學中，有用來複指其前表短暫時間的名詞的用法，相當於“(過了)……的工夫(或時間)”，這種用法當是受“之間”的同類用法影響而來，而“之間”的此種用法又源於“間”的表“頃刻，一會兒”之義。黑維強《敦煌文獻詞語陝北方言證》(《敦煌研究》1 期)，則試圖對敦煌文獻的注釋提供一些現代方言的資料。

徐朝東《英藏敦煌韻書 S.11383A、B、C、試釋》(《古漢語研究》3 期)，對三個韻書殘片進行考釋，定其歸屬。從韻目次序、體例與被釋字的訓釋等方面比較，A、C 兩片屬於陸法言《切韻》或長孫訥言增字加訓的箋注本一系的韻書，B 片因過殘而難下結論。徐真真《敦煌本〈文選音〉殘卷校證》(《敦煌研究》3 期)，作者認為 P.2833 及 S.8521《文選音》殘卷應為一個寫卷的兩個部分，但內容並不相連。將兩件殘卷與李善注《文選》及《六臣注文選》對校，並以《唐鈔文選集注彙存》、《史記》、《漢書》及類書中所引相關文字與有關內容，對殘卷的文字部分進行了校釋。

文學

敦煌文學研究則比較關注敦煌俗文學作品。張鴻勳《敦煌俗文學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回顧了中國海峽兩岸的學者近 20 年來在敦煌俗文學研究方面的成果，並彙集和評說了各家的專著與文集。白化文《對敦煌俗文學中講唱文學作品中的一些思考》(《國學研究》第 9 卷)，全文分六個部分：一是總括性的說明；二是將 20 世紀中國敦煌俗文學中講唱文學作品的研究分為四個階段，並述及其各個階段的貢獻；三是對“轉變”與“變文”：對變文的講唱進行分析，據以排除其他非變文作品；四是區分“俗講”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各種文體：講經文、因緣、壓座文、解座文等；五是介紹敦煌講唱文學中的其他文體：話本、詞文，一些難定文體歸屬的寫卷；六是提出了有待進一步探討的問題。該文比較全面的回顧了敦煌俗文學作品研究的歷史與成果，提出的一些問題，如研究過程中的分類不嚴格，對敦煌俗文學作品與後世文學作品之間關係的隨意附會等問題，確實值得我們思考。王繼如《敦煌變文研究尚有可為》(《戒幢佛學》第 2 卷)，從敦煌變文的搜尋尚未完全結束、變文俗字的釋讀尚有極大的難度、變文白字通讀的研究尚未充分開展、變文習語的解說尚待繼續、變文所用佛典尚待稽考、《敦煌變文校注》本個別地方不及前人等六個方面看，認為目前敦煌變文的研究，只能說是有一些成績的彙結，但研究仍需繼續深入下去。黃征《〈降魔變文〉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學報》4 期)，《降魔變文》是敦煌變文的代表作，作者在完成《敦煌變文校注》後，又陸續獲得原卷真迹、變文榜題等多種重要資料，因而對該篇變文的研究作了新的補充，包括研究述要、原卷真迹查證、文字補校三項內容。李小榮《敦煌變文作品校錄二種》(《敦煌學輯刊》2 期)，隨着敦煌文書的大量被刊佈，未被校錄的變文作品也隨之出現，作者即對 S.8167《維摩詰經講經文》與 BD.180v《押作文》進行了校錄。袁書會《敦煌藏卷中的早期白話小說與佛教的關係》(《西藏民族學院學報》3 期)，提出敦煌藏卷中的一些篇章早已被學界認定為中國白話小說發展的早期階段，而佛教與中國早期白話小說關係甚密。通過對

《董永變文》和《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兩個白話小說的細緻分析指出：佛教所帶來的異域風情、佛教文學所帶來的新的文體等，均對中國早期白話小說以深刻的影響。胡立華、楊國學《敦煌文獻中的俗賦研究》（《社會科學戰線》5 期），認為敦煌遺書內保存二十七篇賦類作品，對後世小說、講唱文學的發展有很大影響。作者認為敦煌俗賦在語言風格及結構方式和取材等三個方面對《西遊記》的創作風格有一定影響，敦煌俗賦調侃詼諧的特色及個性鮮明的形象描寫，為《西遊記》提供了形象母體。伏俊璉《敦煌俗賦的文學史意義》（《史學月刊》1 期），指出敦煌俗賦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意義就是：使我們知道在“深覆典雅”的文人大賦之外，社會下層還流傳着一種或講故事、或調笑取樂的通俗賦體作品，使我們對漢魏六朝以來一些帶有故事性、詼諧性和大體押韻的作品及其文體歸屬有了明確的認識。失傳已久的秦漢“雜賦”，也可借助敦煌俗賦而瞭解其大概。

對敦煌文獻中的詩歌、歌辭及相關問題的研究有：徐俊《敦煌寫本詩歌續考》（《敦煌研究》5 期），對《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部分詩歌寫本及詩作續考的缺漏失校之處進行了考訂。王卡《唐代道教女冠詩歌的瑰寶——讀敦煌本〈瑤池新詠集〉校讀記》（《中國道教》4 期），作者於《俄藏敦煌文獻》第 11、13、15 冊中發現，編號為 D.χ.6654+6722 v+3861, D.χ.3874+3927 A+3872, D.χ.3861, D.χ.11050, D.χ.11050 v 等中彙集了兩位唐代女冠李冶、元淳的詩集抄本《瑤池新詠集》。詩集中所錄的二人詩作，大多見於《全唐詩》卷 805。敦煌本是迄今已知唐代女冠詩集的最早抄本，可校補《全唐詩》文本的部分缺誤，與敦煌本《李翺涉道詩》，堪稱唐代敦煌道教文學的雙璧。文章最後還對抄本所錄詩作進行了校錄。張子開《初唐後 50 年間的禪宗白話詩》（《五臺山研究》3 期），指出在唐代文學初步形成的 50 年中，中國禪宗的白話詩創作也取得了最初的輝煌。敦煌本《壇經》中的不少詩篇，其實都應被視作佛教文學作品，並舉數首詩作為例證。徐俊《俄藏 D.χ.11414+ D.χ.02947 前秦擬古詩殘本研究——兼論背面文書的地域和時代》（《敦煌吐魯番研究》6 卷），將寫本的時代推定在前秦建元年間，寫本內容則反映了當時文人的集體創作風氣。王勳成《敦煌寫本〈高興歌〉作者考》（《敦煌學輯刊》2 期），認為《高興歌》的作者即為唐代才子劉長卿。鄭阿財《敦煌寫本〈九想觀〉詩歌新探》（《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認為《九想觀歌》是具有強烈佛教生死勸化意義的佛教歌辭。郭淑雲《敦煌〈百鳥名〉〈全相鶯哥行孝義傳〉與〈鸚哥寶卷〉的互文本性初探》（《敦煌研究》5 期），探討了中國說唱文學作品中的交叉與層疊式的互文本性關係。王毅《由隱到顯：從〈雲謠集〉到〈桂枝兒〉兩性關係的嬗變》（《樂山師範學院學報》5 期），由敦煌曲子詞集《雲謠集》與明代馮夢龍輯評的民歌集《桂枝兒》的對比中能看出，從唐到明男女兩性關係由封閉到開放，由含蓄到直露的嬗變。王毅《怨怒總歸緣——啼笑任真情——〈雲謠集〉與〈桂枝兒〉中閨怨題材之異同》（《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認為就閨怨題材的描寫，《桂枝兒》是以笑寫淚，《雲謠集》是以淚寫淚，二者藝術表現的風格不同，但是殊途同歸，它們都是廣大人民真實感情的體現。李小榮《〈狸貓換太子〉的來歷》（《河北學刊》2 期），指出清代小說《狸貓換太子》的形成曾受過諸如敦煌佚經《佛說孝順子修行成佛經》及《大阿育王經》等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情節的借用上。

湯君《敦煌曲子詞與中原文化》（《中州學刊》6 期），認為敦煌曲子詞自發現以來，學術界多注意它與西北地域文化的關係，而且從方音、方言的角度去證實它為西北本土作品，較為忽略其中保存的中原作品，也忽略了它與中原文化的複雜關係。敦煌本《雲謠集雜曲子三十首》所反映的內容、描述的情境和刻畫的形象都可說明它們是中原文人的詞作，還有敦煌曲子詞所用詞調多為中原教坊習用的曲名等，這些事實更有力地說明了曲子詞絕非敦煌的特產。只能說敦煌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機緣，使中原的新體文學形式即詞調在此與河西本土、

西域、中亞、印度音樂文化的結合，創造了新的文化因數。此種文化現象表明敦煌曲子詞所代表的河西地區燕樂文化與中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

科技

本年度對敦煌科技文獻的研究以醫藥和天文曆法兩類文獻為主。馬繼興《當前世界各地收藏的中國出土卷子本古醫藥文獻備考》(《敦煌吐魯番研究》6 卷)，對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日本、中國等收藏地所見的敦煌、西域出土的多種語言所寫的醫藥文獻，進行了介紹。趙平安《談談敦煌醫學寫本的釋字問題》(《敦煌吐魯番研究》6 卷)，結合《敦煌醫藥文獻輯校》、《敦煌石窟秘藏醫方——曾經散失海外的中醫古方》兩書中的若干典型事例，對敦煌醫學寫本中的楷體字、草體字、古體字、俗體字、通假字、特殊字型等，做了相應的釋讀。叢春雨《敦煌遺書〈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五臟病症治療方藥解析》(《敦煌研究》3 期)，張永文《以敦煌遺書〈法要〉探討張仲景經方之源》(《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3 期)，王淑民《敦煌本〈湯液經法〉佚文研究——兼論經方對中醫方劑學發展的深遠影響》(《敦煌吐魯番研究》6 卷)，則是以上兩種敦煌古醫方為研究對象，並貫穿古今，追求淵源，探討古代醫學知識的現代應用價值。劉樂賢《敦煌寫本中媚道文獻及相關問題》(《敦煌吐魯番研究》6 卷)，對 P.2610v《攘女子婦人述秘法》做了文字校錄與介紹，並強調應從數術的角度認識媚道文獻。

天文曆法文書研究的專著有：鄧文寬《敦煌吐魯番天文曆法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年 9 月)，是作者有關天文曆法方面論文的結集。對敦煌吐魯番出土的天文曆法文獻的研究，是該書作者二十多年來的主要研究課題，成就斐然，這本論文集記錄了作者在這一領域耕耘的足跡。劉永明《散見敦煌曆朔閏輯考》(《敦煌研究》6 期)，運用散見各處的敦煌曆日的材料，彙集並考證了吐蕃佔領敦煌時期和歸義軍時期的敦煌曆朔閏 64 條，所涉年份 44 個，並對敦煌曆產生的時間進行了推考。以往學術界認為敦煌曆日產生於吐蕃佔領敦煌之後，是在吐蕃採用十二地支和屬相紀年法、漢人深感不便的情況下自編的地方性曆日。劉永明《敦煌曆日探源》(《甘肅社會科學》3 期)，通過對有關材料的梳理和考辨，認為早在 8 世紀初敦煌地區已經出現了與朝廷頒定的曆日略有不同的私編曆日。這種私編曆日是敦煌曆的源頭，同時也是已知的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私編曆日。晏昌貴《敦煌具注曆日中的“往亡”》(《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19 輯)， “往亡”是中國最古老的出行忌日，作者將敦煌文書中所見的“往亡”，歸納為四種類型，並對各個類型的根源進行了追溯。

法藏 P.2667 號殘卷，曾被稱為流落域外的我國現存寫本算書最古者。李儼先生曾多次介紹和研究《甲種敦煌算書》，將其斷為唐代作品而詳加釋補。郭正忠《甲種敦煌算書的考校和釋補》(《自然科學史研究》1 期)，認為該寫本殘卷當屬於北朝敦煌算書，並在充分肯定和全面評價前人釋讀和研究的基礎上，就原卷各題內容、運算細節和字體風格等方面加以辨析，重新校釋，力求使這部一千四五百年前的珍貴文獻展現原貌。

學術動態與紀念文

對 2001 年度敦煌學研究狀況介紹的文章有：楊寶玉《2001 年敦煌史學研究述要》(《中國史研究動態》11 期)和陳麗萍、馮培紅《2001 年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索引》(《敦煌學輯刊》2 期)。

對上年度敦煌學學術會議作介紹的文章有：劉進寶《新時期敦煌學的第一次盛會——21 世紀敦煌學學術研討會綜述》(《敦煌研究》1 期)，榮新江《21 世紀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中國史研究動態》3 期)，徐曉麗《二十一世紀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敦煌

學輯刊》1 期)，都是對 2001 年 11 月間臺灣中正大學等學術機構與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合辦“慶祝潘重規教授九五嵩壽暨從事敦煌學研究一甲子”學術討論會的介紹。

對本年度一些重要敦煌學學術會議的介紹有：綏圓《中日敦煌佛教學術會議召開》(《中國禪學》1 卷)，方廣錫《中日敦煌佛教學術會議召開》(《世界宗教研究》2 期)，是對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與敦煌學研究中心、日本駒澤大學禪研究所、日本花園大學國際禪學研究所共同主辦的“中日敦煌佛教學術會議”的介紹。對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主辦的“草創期的敦煌學”會議介紹的文章有：郝春文《中日學者“草創期的敦煌學”學術研討會綜述》(《華林》第 2 卷)，柴劍虹《盛衰與共，切磋增誼》(《敦煌吐魯番研究》6 卷)等文。此外，張啓安《第二屆敦煌歷史檔案與徽州歷史檔案開發利用研討會綜述》(《檔案》6 期)，是對“第二屆敦煌歷史檔案與徽州歷史檔案開發利用研討會”的介紹。孫曉峰、項一峰《麥積山石窟與絲綢之路佛教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敦煌研究》5 期)，是對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與麥積山石窟藝術研究所聯合舉辦“麥積山石窟與絲綢之路佛教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介紹。閻廷亮、魏文斌《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綜述》(《敦煌研究》5 期)，是對甘肅敦煌學會、炳靈寺文物保護所聯合召開的“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的介紹。

緬懷周一良先生的紀念文章有：榮新江《周一良先生與書》(《讀書》6 期)，還有學界同仁與先生弟子的紀念文章多集中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上，有季羨林《悼念周一良》、饒宗頤《木蘭花令》、白化文《從圓珍述及講俗的兩段文字談起一紀念周太初(一良)先生》、趙和平《周一良先生學術簡歷及著述年表》等，全面回顧了周先生的學術生涯與學術貢獻。在上世紀中國敦煌學的研究發展進程中，王重民對敦煌典籍的尋訪、輯軼和研究整理、書目編制等工作為我國敦煌學的發展，提供了全面而系統的史料，尤其在敦煌文獻整理與具體學科相結合方面，他的諸多研究方法至今仍具有啓示性價值。王桂蘭《論王重民對敦煌文獻整理研究的貢獻》(《深圳大學學報》3 期)，党燕妮、李長迅《王重民先生對目錄學、敦煌學的貢獻》(《圖書與情報》1 期)，兩文就從不同角度回顧了先生的生平及他在目錄學、敦煌學研究領域的貢獻。馬德《敦煌學史上的豐碑——史葦湘〈敦煌歷史與莫高窟藝術〉編校手記》(《敦煌學輯刊》2 期)，滿懷深情地回顧了史先生獻身敦煌藝術，成就卓然的一生，並簡單介紹了先生《敦煌歷史與莫高窟藝術》一書的主要內容與編寫體例。顧炳樞《敦煌最早的“保護神”——長卷大師李丁隴與他的敦煌夢》(《文史春秋》11 期)，揭示了李丁隴早於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的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該文以詳實的資料敘述了李氏歷經辛苦，三次赴敦煌臨摹壁畫，並四處呼籲保護敦煌石窟的傳奇經歷。陳晉肅《敦煌文化：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精彩華章——著名敦煌學家、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段文傑先生訪談錄》(《探索與爭鳴》9 期)，就敦煌文化在文化全球化的潮流中，如何使其在不斷的交流 and 融彙中，體現出多元化、差異性和豐富性的話題，進行了對話的形式探討。李玉君《孟列夫與漢學研究》(《敦煌學輯刊》2 期)，介紹了俄國漢學家孟列夫在漢學研究和敦煌文獻整理方面的成就。周紹良《得〈佛說大藏經目錄〉因緣記——為啓元白先生 90 華誕作》和柴劍虹《求真求實會於心——學習啓功先生鑒賞與研究敦煌寫本體會》(《北京師範大學學報》3 期)，高度評價了啓功先生從敦煌文獻搜藏到摹寫等對敦煌學研究所做的貢獻。

2002-2003 年臺灣地區敦煌學研究綜述

鄭阿財 (台灣中正大學)

本文針對 2002 年 1 月至 2003 年 11 月止，有關臺灣地區敦煌學研究的期刊、論文、專著、學術會議及研究計畫等有關敦煌學之研究動態進行綜合論述。由於兩岸學術交流頻仍，其中有關大陸學者的論文著作漸多，亦有助於臺灣地區敦煌學之發展，但為求區分，特將大陸學者在台發表之篇章附錄於後以供參考。

在目錄方面：有朱鳳玉《俄藏敦煌文獻 11-17 冊中之文學文獻敘錄》（《冉雲華先生八秩華誕壽慶論文集》，台北：法光出版社，2003.07，57-117）。

在文字方面：蔡忠霖《敦煌漢文寫卷俗字及其現象》（台北：文津，2002.5），是博士論文的出版，主要根據敦煌漢文寫卷中所呈現的俗字，探討唐五代雕版印刷尚未普及前俗字發展演化與構形類型等相關問題，並對俗文字發展史與整理史進行統整的闡析。蔡忠霖〈敦煌俗字散論〉（《敦煌學》23，2002.03，131-142），則論述俗字定義、範圍及敦煌俗字判定原則與研究價值。

語法方面：洪藝芳〈吐魯番文書在中古漢語量詞研究上的價值〉（《敦煌學》23，2002.03，143-147），全面過濾吐魯番文書中的量詞，考察其使用情形，並加以溯源追流，揭示文書中的量詞現象和規律，在中古漢語量詞研究上的價值。

敦煌文學研究方面：主要以變文等講唱文學為主。計有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訂補〉（《敦煌學》23，2002.03，1-20），本篇為《敦煌文集新書》卷七及卷八的訂補。鄭阿財《孟蘭盆經疏與孟蘭盆經講經文》（《冉雲華先生八秩華誕壽慶論文集》，台北：法光出版社，2003.07，431-448）據俄藏敦煌卷子以論述孟蘭盆經疏與孟蘭盆經講經文的關係。劉惠萍〈敦煌寫本「舜子變」與舜神話〉（《中國古典文學研究》7，2002.6，115-132），以為敦煌寫本〈舜子變〉中若干與典籍所載舜神話傳說呈現差異的故事情節，實是一種原始社會中氏族政治的生態反映，是民間文學作品保留原始神話真實意涵的重要參考材料。劉惠萍〈敦煌寫本「茶酒論」與唐代三教融合思想〉（《中國古典文學研究》5，2001.06，77-95），以敦煌寫本《茶酒論》中茶、酒的針鋒相對、相互攻訐，來探討長久以來存在於唐代社會中的儒釋道爭勝與期待三教融合的思想。劉淑娟〈尹灣漢簡《神烏賦》與敦煌《燕子賦》甲篇之比較研究〉（《中國學術年刊》23，2002，303-326），從內容、主題思想、佈局架構、韻律節奏、遣詞造句與預言表現手法等方面，分析尹灣漢簡《神烏賦》與敦煌《燕子賦》甲篇的差異。此外有陳登武《從敦煌變文看唐代訴訟制度—以「燕子賦」為中心》（《興大人文學報》33，2003.06，699-752），透過變文中燕子告官、鳳凰審訊等過程，探討唐代訴訟制度。此外還有王妙純〈從《秋胡變文》看唐代婦女的新形象〉（《中正大學碩士專班論文專刊》1，2002.06，247-272），卓翠鸞〈《王昭君變文》之敘事藝術初探〉（《中正大學碩士專班論文專刊》1,2002.6,21-38）、沈麗香〈本是同根生—論曹植《鶻雀賦》與敦煌《燕子賦》甲本的相似處〉（《中正大學碩士專班論文專刊》1，2002.06，303-310）

學位論文則有卓翠鸞《敦煌史傳變文之敘事藝術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12），蕭夙雯《敦煌話本探微》（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

佛教故事方面：王祥穎〈敦煌入冥故事文學特色與宗教功能之考察〉(《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研究生論文集刊》4, 2002.12, 1-19)，嘗試以八篇敦煌入冥故事作為研究對象，藉由入冥、冥中、出冥等三階段寫作筆法之分析，考察入冥故事在文學與宗教發展之意涵。

敦煌詩歌研究方面：謝慧暹〈敦煌漢文文書題記中之學郎詩研究〉(《光武學報》25, 2002.3, 313-323)，對敦煌地區學郎詩的類型、特色作了簡易的介紹。鄭阿財〈敦煌寫本「九想觀」詩歌新探〉(《普門學報》12, 2002.11, 87-120)，搜羅敦煌本及日本流傳之《九想觀詩》，探討其流行之時代與地域，考究其佛典之源流與變異，試論其流行原因。林仁昱〈論敦煌佛教歌曲特質與「弘法」的關係〉(《敦煌學》23, 2002.03, 55-86)，透過抄寫的樣貌、歌辭內容、形式、曲調與唱法，論述敦煌佛教歌曲的特質與弘法的關係。鄭阿財〈唐代佛教文學與俗曲--以敦煌寫本〈五更轉〉、〈十二時〉為中心〉(《佛教研究的傳承與創新學術研討會論集》，臺北，現代佛教學會，2002.3.2-3, 419-442)，以為唐代禪宗與淨土宗選擇運用〈五更轉〉、〈十二時〉等俗曲來宣傳教義，呈現修道心境，當有一定意義，同時也催化了佛教通俗文學的發展。

有關敦煌文獻中經子典籍的研究方面：姬秀珠〈敦煌寫本「論語·鄭氏注」卷二殘卷校考〉(《問學》4, 2002.3, 1-23)，持P.2510《論語鄭注》殘卷與阮刻《論語注疏》進行比勘。歐純純〈《太公家教》與後代童蒙教材的關係〉(《東方人文》1:1, 2002.3, 21-38)，據《太公家教》內容持與明代《小兒語》、清《增廣賢文》等進行比較，以突顯《太公家教》之蒙書特色。

敦煌歷史的研究：有金榮華〈新德里印度博物館藏敦煌殘冊張延鏐題記跋〉(《華岡文科學報》2002.3, 21-28)，就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第四子張延鏐之各項官銜及職務所在地，探討歸義軍與唐朝中央之互動方式。羅彤華〈歸義軍敦煌寺院的迎送支出〉(《漢學研究》21:1, 2003.06, 193-224)利用敦煌寺院文書中的破用曆，探討歸義軍時期寺院送往迎來的具體情形，以了解寺院送往迎來在政教關係的意義。

敦煌宗教研究：有關經典傳播與內容研究的有梁麗玲〈「賢愚經」在敦煌的流傳與發展〉(《中華佛學研究》5, 2001.3, 123-162)對成書過程、性質及年代進行考察，藉以探討《賢愚經》在敦煌流傳的情形及其在俗講的功能與作用。

有關禪宗典籍的研究有陳盛港〈從「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論荷澤神會之教法〉(《普門學報》12, 2002.11, 141-185)，透過《南陽和上頓教解脫禪門直了性壇語》內容的辨析，探討神會倡導三學一體、強調善知識之重要、對「知」之詮釋與頓教法之基本精神等代表性議題，並藉此以了解神會的「曹溪家風」。陳盛港〈再論獨孤沛之「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佛學研究中心學報》7, 2002.07, 115+117-146)作者以獨孤沛所修訂之〈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為參考資料，深入探討了神會於滑臺會中，對於北宗的控訴及其對「知見」的定義，及神會姓氏和滑臺會的時間、地點、人數與衝擊等相關問題。金榮華〈敦煌本《壇經》所述五祖六祖事蹟考辨〉(《楊家駱教授九十冥誕紀念論文集》台北：萬卷樓，2001.05, 217-232)，根據敦煌本《壇經》神秀與慧能的偈語考辨五祖六祖之事蹟。鄭阿財〈敦煌寫本《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研究〉(《敦煌學》23, 2002.03, 21-48)，搜羅敦煌寫本、西夏本、遼代寫本、房山石經及明泥金寫本等各有關《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

進行傳本敘錄、校錄，並析論內容性質、成書年代，探究其形成與流傳等問題。陳萬成〈滬藏「觀音證驗賦」殘卷考辨〉(《漢學研究》20:1=40, 2002.06, 85-99)以滬藏敦煌卷子 81255 號〈觀音證驗賦〉殘卷進行考辨，考訂出該賦實為五代釋延壽所撰，此「賦」的體式則為晚唐以來流行一時之新體。劉滌凡〈敦煌寫卷中土造經的救贖思想—以「大正藏」第 85 冊為例〉(《中華佛學學報》14, 2001.09, 231-266)以《大正藏》第 85 冊中所收的敦煌寫卷為例，觀察這些中土造經所呈現的「救贖」思想，以及中土造經和原始佛教、道教、基督教救贖思想的異同。釋長梵〈敦煌寫本《佛說現報當受經》初探〉(《正觀雜誌》19, 2001.12.25, 53-94)一文，透過對敦煌寫本《佛說現報當受經》的分析及歷代經錄記載與可疑之處的探究，對此經作了一深入的討論，同時並透過此經與其他相似經典之間的比對分析，辨識經的疑偽問題。汪娟〈跋《上生禮》相關寫卷二篇〉(《敦煌學》23, 2002.03, 49-54)檢出 D X 0144 及 S.8656《上生禮》兩篇，陳述其梗概。謝慧暹〈敦煌莫高窟佛經寫卷供養人探析〉(《光武學報》2003.03, 133-151)，從「官府」、「個人」及「集體」探討造經供養的情形與目的。鄭志明〈敦煌寫卷「患文」的宗教醫療觀〉(《普門學報》15, 2003.05, 63-94)，從宗教醫療的角度，利用《敦煌願文集》中的「患文」，討論佛教的醫療觀。

在敦煌民俗方面，蔡秀敏《唐代敦煌飲食文化研究》(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3.01)，主要根據敦煌文獻與壁畫，結合唐五代的文獻載籍，針對唐代敦煌地區的飲食文化展開研究，綜合敦煌文獻材料歸納出唐代敦煌地區飲食生活中最顯著的食材特色，並以「肉類、乳製品」、「餅、麵」、「酒、茶」及其他以探究其飲食文化，並論述「歲時節慶與飲食」、「佛教信仰」、「食制與宴飲風尚」所呈現的文化內涵。王三慶《敦煌寫卷中有關的「滿月禮」儀式及其源流探討》(《冉雲華先生八秩華誕壽慶論文集》，台北：法光出版社，2003.07, 1-20)。

敦煌藝術方面，董夢梅〈對敦煌彩塑藝術的省思〉(《工筆畫》2002-1=25, 2002.06.1, 16-20)細述由北涼時期彌勒造像的開展到敦煌開窟的過程，以及敦煌彩塑形制的演變與精華，藉此以探索敦煌彩塑之美與價值。張儷瓊〈敦煌石窟壁畫樂隊型制與組織探略〉(《藝術學報》67, 2001.2, 47-62)一文，則透過敦煌石窟的壁畫藝術材料來研究古代敦煌樂隊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並歸納分析各種樂隊編制、配置，以及樂隊背後所隱含的古代音樂訊息與文化涵義。徐燕玲〈北涼至五代敦煌莫高窟供養人及其服飾試析〉(《中國文化月刊》253, 2001.4, 107-125)，略舉莫高窟中供養人及其服飾數十例，分為北朝、隋代、唐以前及唐後期至五代等四階段，以探究其所表現的時代轉動與風貌，歸納其演變過程。梁麗玲〈「賢愚經」與石窟藝術〉(《中華佛學研究》6, 2002.03, 41-88)針對與《賢愚經》有關的故事畫做了全面性的整理與探討，作者更將新疆與敦煌石窟中的《賢愚經》故事畫與經文內容相互考訂，用以考察《賢愚經》在西域及敦煌流傳的情況，並藉此以探討各時代在題材的選擇及表現形式上，所呈現的思想特色、時代風貌與藝術風格的轉變。梁麗玲〈新疆與敦煌石窟中《賢愚經》故事之比較〉(《敦煌學》23, 2002.03, 87-110)，針對新疆石窟與敦煌石窟中的《賢愚經》故事畫，展開比較。宋子穠〈無限的想像空間——「維摩經變相」之創作探討〉(《工筆畫》2002-1=25, 2002.06.1, 40-55)主要探討敦煌石窟中「維摩經變相」的源起及其所體現的文學之美與智慧，並將莫高窟中有關「維摩經變」的創作加以比較，分析各變相之內容與表現特色。孫家勤〈中國繪畫中「線」的研究——兼論敦煌藝術〉(《工筆畫》2002-1=25,

2002.06.1, 21-24) 探討中國繪畫中對線條的運用及其演變情形；並兼及敦煌藝術中的線條藝術表現之美。陳娟珠〈現代經變圖的時代意義—以臺灣「清涼藝展」法華、涅槃經變為例〉(《華梵學報》7, 2001.08, 100-115)，以「清涼藝展」的「法華涅槃經變」為中心，探討「現代經變圖」在佛法教化的意義與價值。

關於敦煌壁畫臨摹大家的研究，有關張大千的，有巴東〈張大千敦煌壁畫摹本之創作發展論析—職業畫家精麗雄渾之畫風範疇(上)〉(《典藏古美術》112, 2002.1, 34-47)、〈張大千敦煌壁畫摹本之創作發展論析—職業畫家精麗雄渾之畫風範疇(中)〉(《典藏古美術》113, 2002.2, 48-57)、〈張大千敦煌壁畫摹本之創作發展論析—職業畫家精麗雄渾之畫風範疇(下)〉(《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科學類》114, 2002.3, 90-101)等篇，則是將張大千的敦煌之行，以及邁入盛年精麗雄渾的藝術創作歷程，作一綜合性、系統性的整理與說明。巴東〈集中國古典畫學傳統大成的張大千—敦煌佛教藝術對張大千的影響意義〉(《藝術家》54:1=320, 2002.1, 284-293)、孫家勤〈敦煌壁畫對大千居士畫風之影響〉(《藝術家》54:1=320, 2002.1, 278-283)二文，論述了敦煌壁畫對張大千畫風的影響意義。

吳文彬〈與敦煌最早結緣的百齡學者：石璋如教授〉(《工筆畫》2002-1=25, 2002.06.1, 56-58)，介紹與敦煌最早結緣的百齡學者——石璋如教授，於民國三十一年與西北史地考察團遠赴敦煌千佛洞，進行田野調查，親手測量並拍攝大量圖片的大略經過，及其對敦煌第一手資料建立的功勞。

有關敦煌藝術的學位論文，則有林微萱《璀璨古今—從敦煌藝術探討佛相繪畫之美》(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根據敦煌壁畫中佛祖、觀音、菩薩等圖，以現代水墨技法處理，配以山水、圖案等背景，現代時空、城市相互交錯，異時同圖，呈現各種轉換，為佛像化賦予新生命。另外還有袁光明《敦煌壁畫中飛天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洪蕊《五代敦煌莫高窟歸義軍供養人圖像研究》(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

在書法研究方面：有歐慧敏《敦煌書法述論》(玄奘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從索靖等書法家及書手，印本、臨本、拓本、寫本及敦煌簡以探究敦煌的書法藝術及其在書法史的意義。

有關敦煌醫藥研究的，有施拓全、林珍瑩〈敦煌唐寫本「食療本草」「殘卷」綜論〉(《高雄餐旅學報》5, 2002.12, 175-184)以敦煌寫本《食療本草》殘卷的保存，反映出《食療本草》一書在當時的流行，並以書中的「宜忌觀念」來探討其與「陰陽五行」之關聯，以及該書與李時珍《本草綱目》的異同之處。

天文曆法的研究則有鄭慈宏〈敦煌文獻中的民曆〉(《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6, 2001.3, 147-167)，針對敦煌文獻中的民曆，嘗試還原編曆的用數及算法。〈敦煌文獻中的識星作品—「玄象詩」〉(《中國文化大學中文學報》7, 2002.3, 107-140)，根據敦煌本《玄象詩》推測可能為吳太史令陳卓之作。《玄象詩》非民間通俗識星作品，而是僅供專業之用。並以《玄象詩》是目前所見最早建立三垣，二十八宿的識星作品，在天文學史有其一定的價值。

有關會議有：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暨研究所、中國唐代學會主辦的『第六屆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會中發表有關敦煌學的論文計有：陳國燦《近年來敦煌吐魯番學的新發現與新進展》、洪藝芳《敦煌變文中的重疊詞探析》、鄭阿財《敦煌禪宗歌詩「行路難」綜論》、朱

鳳玉《敦煌曲子詞研究述評與研究方法之考察》。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暨研究所、中國古典文學會主辦的『六朝隋唐文學學術研討會』，會中發表有關敦煌學的論文計有：林聰明《唐代敦煌契約文書及其文學性質》、謝海平、朱文光《近百年來敦煌講史變為研究之回顧》、鄭阿財《唐代入冥故事中的衙役書寫》。

臺灣科學研究委員會補助計畫有關敦煌學部分，2002.08.01~2003.07.31 主要有：王三慶『敦煌文獻題記編年及其分析研究 1/3』、朱鳳玉『百年來敦煌文學研究之述評與研究方法之考察研究 1/3』、謝海平『1908-1997 敦煌變文研究述評—講史性變文除外』、林聰明『敦煌社會文化研究』、李玉(王民)『北魏佛教藝術研究(II)』。

附：

臺灣期刊論文專集中之大陸學者論著

徐朝東〈S.2055 校記〉#(《書目季刊》35:4, 2002.3, 35-40)

陸永峰《敦煌變文研究》#(《法藏文庫》¹53, 2002.03, 1-305)

何劍平《敦煌維摩詰文學研究》#(《法藏文庫》53, 2002.03, 307-573)

李小榮《變文講唱與華梵宗教藝術》#(《法藏文庫》58, 2002.03, 1-320)

張弓〈公元九、十世紀敦煌的寺學教育及其儒經讀本〉#(《第十二屆國際佛教教育文化研討會專輯》，2002, 14-25)

乜小紅〈唐宋敦煌紡織業述略〉#(《敦煌學》23, 2002.03, 111-130)

乜小紅《唐五代宋初敦煌畜牧業研究》#(台北：新文豐，2002.03)

陳國燦《吐魯番出土唐代文獻編年》(台北：新文豐，2002.12)

劉雯《敦煌索氏家族研究》#(《法藏文庫》43, 2001.8, 頁 305-3580)

安忠義《吐蕃對河隴的統治及其對敦煌文化的影響》#(《法藏文庫》49, 2001.8, 313-380)

李小榮〈論隋唐五代至宋初的藥師信仰—以敦煌文獻為中心〉#(《普門學報》11, 2002.9, 113-155)

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佛教轉向人間化的特點〉#(《普門學報》1, 2001.1, 96-119)，高啓安〈晚唐五代敦煌僧人飲食戒律初探—以「不食肉戒為中心」〉#(《普門學報》9, 2002.05, 151-165)

楊富學〈敦煌本「歷代法寶記·弘忍傳」考論〉#(《佛學研究中心學報》6, 2001.7, 139+141-149)

陳國燦〈從敦煌吐魯番所出早期寫經看佛教的東傳西漸〉#(《普門學報》7, 2002.01, 57-68)

張勇〈唐五代禪宗的修習典範—以敦煌寫本《六祖壇經》為考察範圍〉#(《普門學報》10, 2002.07, 71-87)

張子開〈略析敦煌文獻中所見的念佛法門〉#(《禪學學報》2, 2001.12, 93+195-211)

鄭炳林、徐曉麗〈俄藏義淨《西方記》殘卷研究〉#(《普門學報》10, 2002.07, 89-120)

湛如《敦煌佛教律儀研究》#(《法藏文庫》51, 2002.03, 1-395)

郝春文《隋—宋初私社與寺院的關係》#(《法藏文庫》43, 2001.8, 251-304)

郝春文《唐末五代宋初僧尼的社會生活》#(《法藏文庫》44, 2001, 1-447)

劉惠琴《歸義軍時期的河西佛教》#(《法藏文庫》50, 2001.8, 175-272)

陳海濤《吐番時期的河西佛教》#(《法藏文庫》50, 2001.8, 273-393)

續華《悟真事跡初探》#(《法藏文庫》50, 2002.3, 397-440)

馬世長《中國佛教石窟考古文集》#(新竹:覺風佛教藝術文化基金, 2001.12)。沙武田〈有容乃大:佛教思想一瞥—以敦煌石窟佛教藝術為中心〉#(《普門學報》8, 2002.03, 281-290)

胡永炎〈香奈兒女神--敦煌唐代彩塑菩薩〉#(《藝術家》52:6=313, 2001.6, 247-249)、〈香

奈兒女神—敦煌唐代彩塑菩薩 (二)〉#(《藝術家》53:1=314, 2001.7, 182-184)〈時尚美

學雲裳風華—敦煌唐代彩塑菩薩 (三)〉#(《藝術家》53:2=315, 2001.8, 178-179)、〈東洋

文化圈菩薩形象指標—敦煌唐代彩塑菩薩 (四)〉#(《藝術家》53:3=316, 2001.9, 186-187)、

〈東方美人典範—敦煌唐代彩塑菩薩 (五)〉#(《藝術家》53:5=318, 2001.11, 224-226)、

〈敦煌法華經變壁畫—解讀神奇的視像動畫空間〉#(《藝術家》52:1=308, 2001.1, 214-217)、

〈敦煌法華經變壁畫—解讀神奇的視像動畫空間〉#(《藝術家》52:4=311, 2001.4, 202-205)。

段文杰〈飛天——乾闥婆與緊那羅〉#(《工筆畫》2002-1=25, 2002.06.1, 2-14)歐陽琳〈論

敦煌石窟圖案——兼談新疆克孜爾石窟及陝西乾陵的圖案〉#(《工筆畫》2002-1=25,

2002.06.1, 30-39)

段文杰〈段文杰自傳(1)—情結敦煌〉#(《藝術家》55:1=326, 2002.7, 458-465)、〈段文杰

自傳(2)—在臨摹中研究·研究中臨摹〉#(《藝術家》55:2=327, 2002.8, 292-301)、〈段文

杰自傳(3)—艱苦的歲月〉#(《藝術家》55:3=328, 2002.9, 382-387)、〈段文杰自傳(4)—

敦煌石窟藝術的研究重任〉#(《藝術家》55:4=329, 2002.10, 268-277)、〈段文杰自傳(5)—

敦煌的春天〉#(《藝術家》55:5=330, 2002.11, 268-277)、〈段文杰自傳(6)—敦煌石窟

保護研究的發展〉#(《藝術家》55:6=331, 2002.12, 460-469)、〈段文杰自傳(7)—透過

交流促進敦煌藝術研究〉#(《藝術家》55:7=332, 2003.01, 452-461)、〈段文杰自傳(8)—

敦煌在心中〉#(《藝術家》55:8=333, 2003.02, 294-301)。

(日)小島岱山《六祖壇經與華嚴思想--敦煌本壇經的無相戒與妄盡還源觀》(《普門學報》

14, 2003.03, 27-54)

(韓)鄭茂煥《敦煌本六祖壇經與心地法門》(《普門學報》13, 2003.01, 41-76)。

¹ 佛光出版社,《法藏文庫》出版兩岸有關中國佛教學術的博碩士論文,每輯十冊,目前已出版第一輯至第八輯,為大陸地區的論文,即將出版的第九輯至第十輯為臺灣地區的論文學位論文。

日本における過去一兩年の敦煌研究

高田時雄 (日本京都大學)

日本の敦煌學は明治末年にまず京都で誕生し、羅振玉・王國維の東渡という刺激も加わり國際的規模の隆盛を見た。やがて東京でも學者が輩出し、日本における敦煌研究の一方の中心となった。東京・京都以外にも個別の學者の活動が見られたが、組織的な活動は望むべくもなく、近い過去に至るまで、大勢としては東京・京都の二地において發展してきたとあって差し支えない。

しかしながら、過去二、三〇年の間に、世界各地の敦煌寫本がマイクロフィルムや圖録のかたちで陸續として公刊されるようになり、何處にいても研究が行える條件が整備されてきたために、日本の敦煌學の分布にも大きな變動が生じ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ている。必ずしも東京・京都というこれまでの中心にこだわらない活動が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新しい動向と言えよう。

以下、日本國內におけるここ一兩年の動向を簡單に見ておきたいと思うが、これらは管見に入ったものを摘記したに止まり、決して網羅的でないことはあらかじめお断りしておきたい。また今後この『通訊』を通じて、一層詳しく且つ速報性のある情報が提供されることを期待するものである。

まず東京では、東洋文庫の敦煌文獻班があり、近年『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史文獻・補編』(英文、*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Supplement*, Tokyo, The Toyo Bunko, 2001) を出版した。これには編者として山本達郎、池田温、土肥義和、氣賀澤保規、岡野誠、石田勇作、妹尾達彦の各氏が名を連ねている。東洋文庫の敦煌文獻班と密接に連携して活動しているものに「内陸アジア出土古文獻研究會」(世話人：妹尾達彦)があり、定期的な研究會を行っている。しばらく休止状態にあったが、近く活動を再開する豫定と聞く。またやや舊聞に屬するが、東洋文庫に設置されていたユネスコ東アジア文化研究センター(2003年3月末日を以て活動を終了)からは、武内紹人編『大英圖書館所藏東トルキスタン出土古代チベット寫本』(*Old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East Turkestan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f the British Library*, compiled by Tsuguhito Takeuchi, Centre for East Asian Cultural Studies for Unesco, The Toyo Bunko, 1997-98)の大冊が出ている。チベット文獻に關連して言えば、フランス國立圖書館所藏チベット寫本『選編』第四卷として、P126、P239+P733、P1039、P1040、P1042、P1060、P1068、P1134、P1136、P1194、P1285、P1289のコンコードダンスが東京外國語大學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から出版されている(*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Tome IV, Corpus syllabique, par Yoshiro IMAEDA, Tsuguhito TAKEUCHI, Izumi HOSHI, Yoshimichi OHARA, Iwao ISHIKAWA, ILCAA, Université des Langues Étrangères de Tokyo, 2001)。音節ごとのコンコードダンスとしては1990年に出た第三巻を引き繼ぐもので、十年ぶりの刊行である。所收テキストはネット上で公開されているから、オンラインで検索が可能である¹。

京都には敦煌學研究會(京都)が存在し、定期的な活動を行っている²。牧田諦亮、竺沙雅章、上山大峻、礪波護の四氏が顧問で、高田時雄、落合俊典、辻正博、赤尾榮慶、梶浦晉が幹事を擔當している。この會では2001年11月27日~29日に羅・王兩先生の東渡九十周年を記念して日中共同ワークショップ「草創期の敦煌學」を開催し、その成果は高

田編『草創期の敦煌學』（2002年、東京、知泉書館）として既に刊行された。また2003年3月8日に開催された敦煌學國際連絡委員會第一回會合も、この研究會の努力によって實現の運びに至ったものである。現在、研究會では十數名の若い研究者の参加を得て、月一回程度のペースで俄藏敦煌文獻の輪讀會を行っている。幹事の一人である赤尾氏は科學研究費の報告書「敦煌寫本の書誌に関する調査研究」を2003年3月に刊行した。これには三井文庫所藏敦煌寫本の目録が收められ、一部寫本の圖版も附載されている。

關西にはまた大阪大學を中心とする「中央アジア學フォーラム」があり、佛教時代の中央アジアの歴史・言語・宗教などを対象とした活動を行っている³。森安孝夫・荒川正晴（歴史學）、武内紹人・吉田豊（言語學）、榎本文雄・松田和信（佛教學）の諸氏が幹事となっている。荒川正晴氏を代表者とする科學研究費報告書「トゥルファン出土文書および關連伴出資料の調査」が2003年3月に刊行されている。

關尾史郎氏の努力により、新潟に敦煌學の一據點が形成されつつある。「新潟大學敦煌檢討班」のホームページでは⁴、「吐魯番出土文物研究情報集録」のバックナンバーがすべてPDFで閲覧できるばかりでなく、「敦煌文獻關係論著」の速報、『俄藏敦煌文獻』収載文獻データベースなどもあり、きわめて内容豊富である。このグループの成果として、關尾史郎氏を代表者とする新潟大學プロジェクト推進經費研究成果報告書「敦煌文獻とその出土地域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 敦煌文獻の総合的・學際的研究 II」（2002年3月）があり、また關尾史郎・玄幸子『敦煌への道』（新潟日報事業社発行、2002年3月）もある。

最近刊行された雑誌『佛教藝術』271號（2003年11月刊）では「敦煌學の百年」という特集を組んでいる。所收論文は、百橋明穂「美術史學における敦煌學百年の軌跡」、高田時雄「敦煌寫本を求めて 日本人學者のヨーロッパ訪書行」、赤尾榮慶「書誌學的觀點から見た敦煌寫本と偽寫本をめぐる問題」、ロデリック・ウィットフィールド「大英博物館所藏の敦煌繪畫斷片について」、秋山光和「ポール・ペリオと「藏經洞」壁畫をめぐる」、ジャン・ピエール・ドレージュ「敦煌の二流作品 ペリオコレクションの紙繪」、樊錦詩「敦煌石窟研究の百年の回顧と展望」、馬世長「敦煌莫高窟と石窟寺院における考古學的研究 往時回想」である。

最近、日本國內で開催された國際シンポジウムとしては『佛の來た道』（The Way of Buddha）がある。これは大谷探検隊100周年及び西域文化研究會50周年を記念して、2003年9月8日～13日に、同大學の大宮學舎及び瀨田學舎において行われたもので、百濟康義氏をはじめとする龍谷大學の熱心な盡力の賜物であった。ペーター・ツィーメ（Peter Zieme）、井ノ口泰淳兩教授の記念講演にはじまった會議は「西域北道の佛教社會」「クチャの佛教美術」「西域南道とニヤ遺跡」「出土文物の分析と保存」といったセッションを日毎に立て報告及び討論が行われたが、英・獨・佛・中・米など外國からも多數の發表者を得て盛況のうちに閉幕した。また會議にあわせシルクロード文物展「書と表現の跡」が開かれ、鮮明な寫眞を収録した圖録も出版されている。

【注】

¹ http://www.aa.tufs.ac.jp/~hoshi/TSP_OTDO/OTDO_texts.htm

² <http://www.zinbun.kyoto-u.ac.jp/~takata/Kyoto/index.html>

³ <http://www.let.osaka-u.ac.jp/toyosi/caf/caf-j.html>

⁴ <http://h0402.human.niigata-u.ac.jp/~dunhuang/>

敦煌淨土寺研究綜述

陳大為 (首都師範大學)

中古時代的敦煌是一座傳統的佛教名城，寺院林立。對於研究佛教社會史的學者來說，寺院一直是他們所關注的焦點。在寺院經濟、僧官制度、僧尼生活等諸多方面佳作迭出。他們的研究視角都是將敦煌寺院看作一個整體，這樣的研究固然對於瞭解中古敦煌佛教教團的全貌是有好處的。但就敦煌某個寺院作個案研究對於佛教史的深入也是不無裨益的，然而遺憾的是目前史學界對這方面的研究關注不夠。比較而言，敦煌文獻中為我們留下了相對較多的淨土寺的材料，筆者擬以淨土寺為突破口，試圖通過對其研究史的回顧，以期達到對敦煌諸寺個案研究進行鋪墊的目的。

—

對於敦煌淨土寺，雖然史學界尚未有人專門進行研究，但在一些學者的論著和論文中都涉及到了這個問題。早在 1935 年，許國霖先生的《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1935 年第 9 卷第 6 號）一文，搜集了淨土寺在內的敦煌各寺僧、沙彌、學郎、學使（士）郎的材料。後在《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微妙聲》1936—1937 年第 1—4 期）和《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補遺》（《微妙聲》1937 年第 6 期）中作了補充。又於《敦煌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北京：商務印書館 1937 年）中再次收錄。此外，從目前所出的敦煌遺書一系列索引的“按”、“題記”和“說明”中，我們可以搜集到許多有關淨土寺的資料，包括淨土寺藏經、淨土寺學郎、淨土寺僧和沙彌的史料。如《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和《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北京：中華書局 2000 年）。

但真正意義上對淨土寺的考察應始於董作賓先生。1943 年，董作賓先生在《敦煌紀年》（《說文月刊》1943 年第 3 卷第 10 期）一文中依據寫經題記初步考察了敦煌部分寺觀之名，指出淨土寺名來源於佛經名。1947 年，史岩先生在《敦煌石室畫像題識》“自序”（黃永武主編《敦煌叢刊初集》（5），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5 年，1—54 頁）中利用敦煌文獻結合莫高窟供養人題記，考出了 18 所寺院的名稱，並對這些寺院的寺址與興建存廢等情況進行了初步探索。此外還依據敦煌文獻考訂了包括淨土寺在內的 11 所寺名未見於窟壁題記的寺院的情形。由於受材料的限制，作者誤認為淨土寺的存在年限為自中唐至後唐年間（766—935 年）。土肥義和先生的《莫高窟千佛洞と大寺と蘭若と》（池田溫主編《講座敦煌 3 敦煌の社會》，東京：大東出版社 1980 年，347—370 頁）一文對吐蕃和歸義軍時期敦煌寺院的發展變化情況作了探討，指出淨土寺為十七大寺之一。最早從整體上介紹淨土寺情況的學者當屬姜亮夫先生，他曾對敦煌經卷壁畫中所見寺觀進行過介紹（姜亮夫《敦煌學論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1073—1086 頁。又陶秋英纂輯、姜亮夫校讀《敦煌碎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2 年，113—115 頁），其中就包括淨土寺。作者簡略介紹了淨土寺的僧人、有關人名、有關寺院、寺址、時代及藏經等問題，由於年代較早，其間不免出現了一些錯誤，但其所做的開創性的工作是功不可沒的。毫無疑問，對敦煌諸寺研究所做工作最多的學者當屬李正宇先生，他在 1988 年發表的《敦煌地區古代祠廟寺觀簡志》（《敦煌學輯刊》1988 年第 1、2 期，70—85 頁）一文是研究古代敦煌祠廟寺觀的學者必讀的文章，很具有前瞻性。就淨土寺來說，作者概括性的介紹了該寺的寺址、年代、寺院經濟、寺學及寺僧等諸多方面的問題，為後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後來收入他的《敦煌史地新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6 年，53—100 頁）一書，內容略有增補。

總的來說，以上學者所做的工作，以材料整理及史實的介紹居多，真正探求性的研究並不多見。

二

以下學者的論著和論文中對淨土寺的會計文書、寺學、寺院藏經、寺僧有所涉及，並進行了相應的研究工作。

(一) 對淨土寺會計文書進行整理及利用淨土寺會計文書進行研究

對敦煌寺院會計文書的整理貢獻最大的非唐耕耦先生莫屬，他和陸宏基先生編纂的《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錄》第 2、3 輯（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1990 年），上圖下文，收錄了敦煌諸寺的便物曆、什物曆、諸色入曆、諸色破曆和諸色入破曆等寺院文書，是迄今為止敦煌研究中收錄寺院會計文書資料最全的一部錄文集，當然此書在錄校上還存在不少錯誤，分類上也比較混亂。但對淨土寺進行個案研究，此書仍然具有很大的參考價值。此後唐先生出版的《敦煌寺院會計文書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7 年）及其發表的一系列論文對敦煌寺院的會計文書進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討。

另外，也有不少學者利用淨土寺的會計文書對寺院經濟進行了研究。北原薰先生《晚唐五代の敦煌寺院經濟——收支決算報告を中心に》（池田溫主編《講座敦煌 3 敦煌の社會》，東京：大東出版社 1980 年，371—456 頁）一文對同光三年（925）、長興二年（931）、甲辰年（944）等淨土寺入破曆進行了研究，認為淨土寺財政收入最大部分來源於高利貸，其次才是廚田地稅等其它收入。姜伯勤先生《唐五代敦煌寺戶制度》（北京：中華書局 1987 年，185—194 頁；217—221 頁；231—239 頁；298—309 頁；311—328 頁）一書研究了在敦煌的各種社會關係中占舉足輕重地位的佛教寺院組織，對敦煌寺院的依附人口及其身份地位的變化作了總結性的研究，書中多處利用淨土寺帳目進行研究，如通過對淨土寺帳目的分析，得出其地產規模很小的結論；揭開了“恩子”之迷；研究了“磴課”一詞的不同含義；探討了淨土寺的酒類支出；論述了高利貸收入占寺院收入構成中的比例等一系列問題。謝和耐先生在《中國五～十世紀的寺院經濟》（臺北：商鼎文化出版社 1994 年，208—209 頁）一書中通過對淨土寺、安國寺、報恩寺和三界寺四個寺院年終結算帳的研究，論證了敦煌諸寺之間財富的不平等性，指出淨土寺是非常富有的。但作者忽略了寺院入破曆的殘缺性問題，由於材料的不完整可能會導致結論的不準確。謝重光先生《吐蕃時期和歸義軍時期的沙州寺院經濟的幾個問題》（《漢唐佛教社會史論》，臺北：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0 年，204—254 頁）一文依據淨土寺同光三年（925）和長興二年（931）收支帳目做粗略估計，淨土寺借貸利潤的收入竟占到全寺總收入的三分之一至一半左右。但相比較而言，姜伯勤和北原薰兩位先生的研究更為深入、準確。2001 年，羅彤華先生在“21 世紀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交的《歸義軍期敦煌寺院的迎送支出》一文，利用寺院帳目研究了寺院與社會各類型人物間的人情往來，認為寺院的這種迎送支出是一種社交性質，從而揭示了寺院的世俗性，其中利用的寺院帳目很大一部分是出自敦煌淨土寺的。

(二) 淨土寺寺學

1942 年，那波利貞先生《唐鈔本雜抄考——唐代庶民教育史研究の一資料——》（《唐代社會文化史研究》“第二編”，東京：創文社 1977 年，197—268 頁）一文，用庶民教育的觀點分析了“雜抄”的價值，對從事抄寫工作的學生、學郎、學仕郎作了初步研究，其間也涉及了淨土寺寺學的情況。1973 年，日本學者小川貫弑先生發表了《敦煌の學士郎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 21 卷第 2 號，1973 年，163—184 頁）和《敦煌佛寺の學士郎》（《龍谷大學論集》第 400、401 合併號，1973 年，488—506 頁）兩篇文章對敦煌地區和敦煌寺院的學士郎進行了專門研究，對童子和學生的區別及學士郎的性質作了分析，文中當然也涉及了淨土寺的學士郎。1986 年，高明士先生《唐代敦煌的教育》（臺灣：《漢學研

究》第 4 卷第 2 期,《敦煌學國際研討會論文專號》1986 年 12 月)一文對唐代敦煌地區教育情況進行了考察,介紹了淨土寺等 8 所僧寺的寺學情況。1986 年和 1987 年李正宇先生先後發表了《唐宋時代的敦煌學校》(《敦煌研究》1986 年第 1 期,39—47 頁)和《敦煌學郎題記輯注》(《敦煌學輯刊》1987 年第 1 期,26—40 頁)兩篇論文,全面搜集了敦煌學郎題記的材料,列出其所知 10 所寺學的名稱、存在時間及所據敦煌遺書卷號,雖所引卷號間有不確,但對寺學的鈎稽及看法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其間談到淨土寺寺學且對學郎題記有進一步的整理研究。1992 年,姜伯勤先生《敦煌社會文書導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2 年,87—89 頁)一書對題記中淨土寺寺學的資料進行了歸納整理。1996 年,林聰明《敦煌文書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6 年,173 頁)一書在論述文書的抄寫者時提到了淨土寺的學郎薛安俊、張保達。1998 年,顧大勇的碩士論文《歸義軍時期敦煌的學校和教育》(蘭州大學碩士論文,1998 年)一文也涉及到了淨土寺的寺學。1999 年,楊秀清發表的《淺論唐、宋時期敦煌地區的學生生活——以學郎詩和學郎題記為中心》(《敦煌研究》1999 年第 4 期,137—146 頁)一文通過對敦煌文獻中學郎詩和學郎題記的分析,探討了唐宋時期敦煌地區的學生生活情況,體現了作者以學生為主體的思想,其間不乏利用了淨土寺學郎的資料。2001 年,劉惠琴《歸義軍時期的河西佛教》(《中國佛教學術論典》(50),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出版 2001 年,230—240 頁)一文通過對淨土寺等敦煌諸寺寺學的分析,探討了這一時期佛教的社會功能化問題,指出這一時期敦煌佛教更加社會化、世俗化。

(三) 淨土寺藏經、藏書及其管理

筆者所見的對敦煌寺院藏經和管理的情況進行論述的文章有兩篇,一為 1970 年,梅應運的《唐代敦煌寺院藏經之情形及其管理》(《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 12 號,1970 年 9 月,145—187 頁)一文最早探討了敦煌寺院藏經和管理的情況。另一篇為 2001 年,鄭炳林先生在“21 世紀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交的《晚唐五代敦煌諸寺藏經與管理》(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 2003 年,338—357 頁)一文,進一步考訂了淨土、龍興、靈圖、三界等十四寺的藏經及其管理情形。著作有方廣錫先生的《敦煌佛教經錄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7 年),對我們研究敦煌寺院的藏經與管理是很有幫助的。另外,史學界對寺院印信關注較多,均涉及“淨土寺藏經印”,鈐有“淨土寺藏經印”的經卷收藏地點應為淨土寺。1960 年,陳祚龍先生的《敦煌所獲漢文寫本中的印章目錄》(《高等中國研究所文集》第 2 集(巴黎)1960 年,5—14 頁)一文中刊載了所公佈的斯坦因和其他人收集品中有印章文書的著作目錄,其中包含“淨土寺藏經印”。後在他的《古代敦煌及其他地區流行之公私印章圖記文字錄》(《敦煌學要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2 年,319—347 頁)中又有所增補。1995 年,榮新江先生在《日本天理圖書館藏敦煌文獻考察紀略》(《敦煌研究》1995 年第 4 期,132 頁)一文中指出《大方等大集經》卷第三四蓋有“淨土寺藏經印”。1996 年,林聰明先生在《敦煌文書學》(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6 年,124—127 頁)一書中對敦煌文書中的寺院印信進行了整理,其中就包括 24 個鈐有“淨土寺藏經印”的經卷。1999 年,丘古耶夫斯基於《俄藏敦煌漢文寫卷中的官府及寺院印章》(《敦煌學輯刊》1999 年第 1 期,142—148 頁)一文中介紹了聖彼得堡分所收藏的兩份文書蓋有“淨土寺藏經印”。此外,方廣錫先生和許培玲合寫的《敦煌經帙》(《敦煌學輯刊》1995 年第 1 期,1—8 頁)一文中考證了淨土寺收藏的《大般若經》第四十三帙和第五十九帙所用的帙皮。方先生和徐憶農合寫的《南京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目錄》(《敦煌研究》1998 年第 4 期,138 頁)一文中通過對“南圖 016 大般若經第五十八帙護首”的分析考訂了其為淨土寺所藏經典。1995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中收錄的 J.4《維摩詰經》卷下尾題後鈐有“淨土寺藏經”印,劉屹先生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3 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年,378—380 頁)關於此書的書評中,對此件文書作了介紹及有益的探索,

考訂其得自敦煌淨土寺。韓昇先生解釋說聖德太子得到來自中國的《維摩詰經》善本後，親自抄寫，後來作為文化交流之一環，又由日本使者帶入中國印證請益，輾轉藏于敦煌淨土寺。（《南北朝隋唐時代東亞的“佛教外交”》，《佛學研究》，北京：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 1999 年，300—305 頁）後在《北京圖書館藏敦煌本聖德太子寫經與東亞的“佛教外交”》（中國敦煌研究院、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編《2000 年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提要集》“宗教·文化”，2000 年，145 頁）一文中作了進一步修訂補充。

涉及淨土寺藏書情況的文章有黃權才先生的《中國圖書館史上的獨特的敦煌藏書》（《圖書館界》1994 年第 2 期，38—41 頁）一文，作者對敦煌寺院藏書作了探索性的研究，探討了淨土寺的藏書情況，指出淨土寺藏書也許不如三界寺，但影響卻比三界寺大。他在注釋中標明參閱的是王重民先生的《敦煌遺書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 1984 年，288—308 頁）中的“記敦煌寫本佛經”，但筆者認為王先生只說了“張氏、曹氏統治時期，敦煌的佛教寺院圖書館以三界寺為最大”，並沒有提到淨土寺的影響比三界寺大。

（四）淨土寺僧

由於淨土寺位於偏遠的西北敦煌地區，加之其寺僧又非高僧大德，所以在贊寧的《宋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 1987 年）中是沒有記載的。今人杜斗城先生在《隴右高僧錄》（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 1993 年）中收錄元代以前在甘肅的佛教 70 余位高僧的小傳和經甘肅進行佛事活動的近 30 位高僧的行狀，對淨土寺僧沒有收錄也在情理之中。1959 年，藤枝晃先生的大作《敦煌の僧尼籍》（《東方學報》（京都）第 29 冊（1959 年），285—337 頁）一文首先對敦煌文獻中“僧尼籍”進行了研究，可謂全面研究敦煌僧尼的開山之作。後菊池英夫《唐代敦煌社會の外貌》（池田溫主編《講座敦煌 3 敦煌の社會》，東京：大東出版社 1980 年，104—107 頁）一文對敦煌佛教寺院進行了研究，列出了 S.2614 背中十三所大寺的僧尼人數，其中淨土寺僧及沙彌 23 人。1990 年，唐耕耦、陸宏基兩位先生的《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錄》第四輯（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1990 年，233—234，246 頁）中對包括淨土寺在內的敦煌諸寺的僧尼籍進行了釋錄，為後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礎。目前史學界對於淨土寺僧研究最多的是法心，1992 年，梅林《吐蕃和歸義軍時期敦煌禪僧寺籍考辨》（《敦煌研究》1992 年第 3 期，99—101 頁）一文考訂了 P.4640《住三窟禪師伯沙門法心贊》中的“法心”為淨土寺僧。1996 年，馬德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史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 1996 年）一書中，對“法心”介紹頗多，使得我們對其有了基本的認識。1998 年，袁德領先生於《法心與敦煌莫高窟第 119 窟》（《敦煌研究》1998 年第 4 期，29—35 頁）一文中探討了法心與莫高窟的關係。此外，鄭炳林、梁志勝兩位先生的《〈梁幸德邈真贊〉與梁願清〈莫高窟功德記〉》一文（《敦煌研究》1992 年第 2 期，62—70 頁）考證了淨土寺梁願清的史事。公維章、文瀾兩位先生的《敦煌寺院中的會計——直歲》（《敦煌學輯刊》1997 年第 2 期，118—120 頁）一文對我們研究淨土寺中的幾名直歲僧有一定幫助。值得一提的是陳海濤先生發表的《敦煌文獻中的佛教人物資料庫系統簡介》（《敦煌學輯刊》1997 年第 2 期，135—137 頁）和《電腦管理檔案資料的探索——敦煌文獻中的佛教人物資料庫系統簡介》（《檔案》1998 年第 1 期，30—31 頁）兩篇文章，旨在為敦煌文獻中的佛教人物建立資料庫系統。有朝一日他的設想成真，不僅對於敦煌淨土寺僧的研究，而且對於敦煌文獻中所有佛教人物的研究都提供了方便。

坦率的說，史學界對敦煌淨土寺的研究相對滯後，基本上都是在論述其他問題時對其所涉及，尚未有人專門進行深入研究，但這並不意味着沒有問題可以研究。其實，不僅是淨土寺，敦煌其他寺院亦是如此，我們要做的事情還有許多。

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グ所藏敦煌文獻をめぐる問題と動向 關尾 史郎 (日本新潟大學)

はじめに

私が所屬している新潟大學では、2000 年度からプロジェクト推進経費が新設された。これによって 2000 年度と 2001 年度の 2 年間にわたり、學内の関係者とともにも敦煌プロジェクト (敦煌研討班) を組織して活動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その成果の一端は、『敦煌文獻の総合的・學際的研究』(2000 年度) と『敦煌文獻とその出土地域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敦煌文獻の総合的・學際的研究 II—』(2001 年度) という 2 冊の報告書によって既に公にされている。續く 2002 年度には、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を母體として、「中國國內所藏敦煌・吐魯番文獻の歴史學的・文獻學的研究」という科學研究費補助金によるプロジェクト (略稱: 敦煌科研) を發足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た。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は現在も活動中で、メンバーは玄幸子 (中國口語史), 鶴田一雄 (中國書道史), 柴田幹夫 (探檢史・中日交流史), 岩本篤志 (中國文化史), そして代表である關尾 (中國古代史) の 5 名からなる。

またこれとは別個に、學内の複数のプロジェクトを再編して、「ペテルブルグの文書館史料を用いた、ユーラシア諸民族の多元的宗教生活の歴史的研究」という科學研究費補助金によるプロジェクト (略稱: サンクト科研) も新たに發足した。代表は鈴木佳秀 (舊約聖書學) で、敦煌プロジェクトからは、中西啓子 (中國思想史), 白石典之 (モンゴル考古學), そして關尾の 3 名が加わっており、ロシア・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グに赴いて各種文字資料の閲覽や調査を実施している。

このうち前者の敦煌科研については、いずれ報告の機会があると思うので、ここでは後者のサンクト科研の成果の一端について簡単に紹介し、あわせて近年の研究動向に関して若干の私見を述べてみたい(1)。

I 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グ所藏敦煌文獻をめぐる問題

サンクト科研のメンバーとして私は、2002 年 9 月、2003 年 2 月、そして 2003 年 9 月の 3 回にわたり、ロシア科學アカデミー東洋學研究所の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グ支所を訪問し、所藏されている ナンバーの敦煌文獻を閲覽することができた。同支所には 1999 年 7~8 月にも、財團法人東洋文庫のプロジェクト「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グ所藏内陸アジア出土文書の総合的研究」により派遣されたことがあったが、その時には、一覽表の作成という目的があったため、ナンバーのものも含めてできるだけ多くの敦煌文獻に接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かった。そこで今回はその成果をふまえ、特定の文獻に限定して閲覽することにした。

周知のように、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グ所藏の敦煌文獻については、長い間その一部が紹介されるにとどまっていた。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から 10 年がかりで『俄藏敦煌文獻』が刊行されるに至って、ようやくその全貌が明らかになったものである。ここに収録されている漢文文獻は、 ナンバーのもの 368 點、 ナンバーのもの 19,092 點、およびその他 (「補」とする) 1 點の、計 19,461 點に達する。また『俄藏敦煌文獻』の刊行にともない、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グ所藏の敦煌文獻に対する理解が深まり、その研究が急展開していることも周知のとおりである(2)。

ところで、早くから指摘されていたことだが、このコレクションには、實は敦煌から出土したもののみならず、内蒙古の黒城や、新疆の吐魯番、和田などから出土したものも含まれている。これは榮新江が説くように【榮 1996:114-119】、このコレクションの成立事情に由来するのだが、コレクションのなかから、どのようにしてこれら敦煌以外の地區から出土した文獻を辨別するのか、が大きな問題として新たに浮上してこよう。もともとこのうち黒城出土のものは、書寫年代が西夏から元時代にかけてと遅いため、文獻と

しての形態・様式・および内容などの諸点から総合的に検討の上で辨別を行うことが比較的容易であると言える・同所に黒城出土文獻のコレクションがあり、加えてこれについても『俄藏黒水城文獻』が上海古籍出版社から刊行されたことは、辨別作業の遂行に大きな利点となっている・じじつ、1980～1990年代に同所を訪れた呉其昱【呉 1986】、榮新江【榮 1996A】など外国人學者も、その抽出を試みている(3)・また帝政ロシア時代の黒水城に関する調査記録もふまえつつ、『俄藏敦煌文獻』によりながら、黒城出土の文獻を辨別して釋文を提示した金滢坤の最新の成果【金 2003】は、評価されるべきであろう・いっぽうごく最近、孫繼民によって黒城出土の漢文文獻自體の分析にも手がつけられた【孫 2002A】・【孫 2002B】・敦煌出土文獻のコレクションに黒城出土文獻が混在しているのとは反対に、黒城出土文獻のコレクションには敦煌出土文獻が混在しているのだから(4)、『俄藏黒水城文獻』に依據したこのような試みは、上のような辨別作業を側面から補完する役割を演じるであろう・

さて吐魯番や和田から出土したものは、書寫年代が敦煌文獻と重複することもあって、辨別作業は少しく困難がともなう・しかしようやく和田出土の文獻については、ごく最近張廣達・榮新江の力作【張・榮 2002】が(5)、また吐魯番出土の文獻についても、やはり最近續けて呉震、徐俊、および陳明らの論稿【呉 2001】・【徐 2002】・【陳 2002】が、それぞれ公表された・いずれも『俄藏敦煌文獻』にもとづく成果と評することができよう・私もかつて『俄藏敦煌文獻』によりながら、吐魯番出土の文獻の辨別を試みたことがある【關尾 2001】・またサンクト科研によって閲覽した成果として、戸籍、帳簿、および契約文書などに限ってだが、吐魯番出土のものを辨別して紹介することができた【關尾 2002B】・【關尾 2003】・【關尾 2004】(6)・これらのなかには、紙に書かれた古代中國の戸籍としては、最古の例に屬する 5 世紀前半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高昌縣戸籍の斷片(08519)や、類例がほとんどない 5 世紀後半の諸氏高昌國時代の帳簿(02683v + 11074v, 02887v)なども含まれている・

しかしながら、このような辨別作業は始まったばかりである・とくにコレクションの過半を占める佛典を出土地によって辨別する基準は確立しているとは言いがたい・通常、辨別の基準となるのは第一に内容だが、佛典に関してはこの内容(經名)を基準とするのは困難である・したがってそれ以外の諸点、すなわち文字の大きさや形(書体や書風)、異體字・別字の使用状況、さらには書寫材料である紙自體の検討などが必要にならうが(7)、これは、内容から大よその出土地や作成年代が判明する各種の文獻にも當てはまる・今後、文獻を實見しながら、辨別のための効果的な基準を設定していくことが、何よりも求められているのである・

II 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グ所藏敦煌文獻をめぐる動向

吐魯番をはじめ各地から出土した文獻が混在しているにせよ、このコレクションの中心を敦煌出土の文獻が占めていることは言うまでもない・『俄藏敦煌文獻』が完結した今世紀に入ってから、とくにこれら敦煌出土文獻に関する研究が活況を呈しているように見えるが、このような傾向を牽引しているのは主として中國の學者たちである・『敦煌研究』、『敦煌學輯刊』、および『敦煌吐魯番研究』など、中國の敦煌學關係の雑誌には、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グ所藏の敦煌文獻に關係する論稿が頻りに掲載されている・しかし日本でも遅ればせながら、10698 がペリオコレクション中の P.2549 などと一連の『尙書』殘卷であることを突き止めた中村威也(中國西南地域史)の成果【中村 2004】や、書道史の觀點から良品に解説を加えた西林昭一(中國書道史)の成果【西林 2001】などがようやく現われ始めたところである・

上の中村の成果もそうだが、最近では特定の文獻の單なる分析にとどまらず、スタインコレクションやペリオコレクション中の文獻と、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グのコレクショ

ン中のそれとが接合することを証明するといった、より多角的で精緻な成果が生まれており、これが一つの先端的研究と言えるかもしれない。實例を示せば、02264 などが P.4974 と一連の不動産をめぐる訴訟に関わる 10 世紀初頭の案卷であることを明らかにした陸離の成果【陸 2000】や、01454 などが 10 世紀中頃の具注曆である S.681v の下部にあたることを突き止めた王愛和の成果【王 2003】などがこれに該当しよう(8)。

このように他のコレクション中に含まれる文獻との接合の可能性を探ることは、とりもなおさず、帝政ロシア時代に行われた探検や調査による敦煌文獻の蒐集過程の解明や、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グのコレクションの學術的な意義の判定などに直結する營爲である。したがって今後、更なる成果が期待されるのだが、このような視點は夙にチュグイエフスキーが範を示したものであった。コレクション中の主要な社會經濟文書 73 點を紹介・分析した【1983】(【王(訳)2000】)は、そのうちの 1 點 01382 が、僧尼籍である S.2614 の表題部分に相當することを見事に明らかにしているからである(9)。

ところで、『俄藏敦煌文獻』の公刊は、かつてチュグイエフスキーにより紹介された社會經濟文書が、コレクション中の社會經濟文書のなかでは主要なものではあっても、そのごく一部にすぎなかったことも教えてくれた。ようするにいまだ本格的な分析が行われていない社會經濟文書が少なくないことが再確認されたのである。もっとも戸籍、契約文書、さらには社文書(轉帖を含む)といった比較的ポピュラーなものは、『俄藏敦煌文獻』の公刊前後からいち早く關心を集めてきたようだが(10)、佛教寺院の各種帳簿、あるいは官府と民戸の間で交わされる領収書(付領文書)など、全くと言ってよいほど新しい成果に恵まれない文書群もある。たしかに佛教寺院の帳簿も官民間の領収書も、ともに一點だけではほとんど史料的な価値を有さないもので、分析のためには、同じような性格の文書を對象とした集積作業が不可欠である。しかしこのような文書群こそ、前世紀の後半に新たに共有財産となった新出吐魯番文獻中に類例が求められるものであり、私はこのことをもっと重視すべきであると考えているのである。

従来、敦煌文獻と吐魯番文獻に共通する社會經濟文書と言えば、戸籍や契約文書、そして若干の法律文書であった。しかるに新出の吐魯番文獻には、夥しい數に上る領収書(條記文書、領抄文書、および付領文書など)(11)や、若干點の佛教寺院の帳簿類が含まれていたのである(12)。したがって同じ中國世界の西北地域にあった二つの地區における文書行政システムの一端や佛教寺院の存立基盤などが、比較史的な視點のもとに解明される可能性が拓けてきたのである。

もちろん言うまでもなく、敦煌文獻と吐魯番文獻の雙方を視野に入れた研究は、それらが發見された前世紀初頭以來、ほぼ一貫して絶えることなく續けられ、現在に至っている。敦煌吐魯番學なる稱呼自體がその事實を象徴していると評してもよいだろう。俗文書の場合、戸籍や契約文書に関しては比較史的な視點から豐饒な成果が提出されて相當な時間も経過している(13)。しかし同じ西北地域から出土したという事實を便宜的に解釋し、敦煌文獻と吐魯番文獻とを、出土した兩地區の歴史的な背景、出土狀況(遺存狀況)、および文獻の作成・書寫時期などの相違を無視して、一括して同等の価値を有する史料として扱うことはなかつたらうか。繰り返すが、私が提唱したいのは、兩文獻に對する比較史的な視點なのである。そして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グ所藏の敦煌文獻、とくにそのなかの社會經濟文書こそは、その材料として恰好の存在なのである。かかる視點による分析を通じて、敦煌文獻と吐魯番文獻それぞれの意義が、そしてなによりも敦煌吐魯番文獻の意義が一層明確になる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グのコレクションはもとより、中國國家圖書館や甘肅・浙江兩省など中國國內のコレクションへの關心が(14)、このような成果に結實することが私の希望であり、結實させることが私の課題である。

おわりに

以上、本稿では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グ所藏敦煌文獻の問題と動向について初歩的な言及を行った。『俄藏敦煌文獻』の完結が、敦煌文獻研究にいかにか大きな貢献を果たしたのか、また果たしう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であり、このことは誰よりも私自身が平生痛感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る。ただしいかなる成果も完璧ではありえないように、『俄藏敦煌文獻』にも残念ながら瑕疵が認められるのであって、最後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が、このことを指摘しておかなければなるまい。

第一は、文獻の性格や内容の理解には直接関わらない瑕疵である。

所藏機關では、文獻の整理番號の付替えを行っていらしく、『俄藏敦煌文獻』中の番號と実際の番號とが一致しないことがある。例えば、『俄藏敦煌文獻』が 02947 とするのがそれで、寫眞では「五胡」時代の五言詩、別面 (02947v) は契約文書となっている。しかし実際の 02947 は未詳佛典であり、別面に文字はない。『俄藏敦煌文獻』では館藏缺となっている 02948 こそ、五言詩と契約が両面に書寫された當該の文獻であることを閲覽の結果、確認した。また閲覽したところ、鉛筆で書き込まれた整理番號が、02947 の「7」字が上から「8」字に書き改められていることもわかった。このような番號の付替えが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を念頭においておく必要がある。

また両面に文字が書寫されているはずなのに、『俄藏敦煌文獻』には、一面しか寫眞が収録されていないものもある。10838 がそれで、東洋文庫に將來されたマイクロフィルムによって補うことが辛うじて可能だが(15)、これは明らかに編集擔當者の失敗である。

第二は、文獻の性格や内容に直接關連する瑕疵である。

先の 02947v 正しくは 02948 に私が關心を抱いたのは、それが「五胡」時代の契約文書だったからだが、『俄藏敦煌文獻』はこれに「開元十四(726)年七月八日買田契」なる表題を付している。つまり唐中期のものという理解である。しかし徐俊が述べているように【徐 2002】、また私も詳述したように【關尾 2001】・【關尾 2002A】・【關尾 2004】、正しい紀年は「五胡」時代、前秦の建元 14 年すなわち 378 年である。『俄藏敦煌文獻』は、冒頭の元號「□元」を「開元」と讀み誤ったのであろう。「建元」とする釋讀は、形態、様式および内容からの総合的な判斷の結果である。

また 01328 は、吐魯番將來の「建中三(782)年三月西州授百姓部田春苗歷」(16)であるが、これは別面にも文字が書寫されている。『俄藏敦煌文獻』はこちらに、「二年十一月王嘉玉馬契」という表題を附與しているが、やや不鮮明な寫眞からでも契約文書と決するのは困難であることがわかる。実際に閲覽したところ、馬坊に關連する官文書であることが判明した。

以上、兩種の瑕疵について、私の氣附いた範圍で指摘した。全 17 冊に及ぶ膨大な分量を想起すれば、『俄藏敦煌文獻』のかかる瑕疵は、許容される程度かもしれない。それよりもむしろ、その恩恵を日々享受している私たち利用者が、協力して是正していくべきであろう。最後にこのような姿勢とそれを實踐することを提言して擱筆したい。

【註】

(1) なお本稿では、近年の研究動向に限定してしまったため、結果的にロシア人學者による成果についてはほとんど言及できなかった。しかし =メンシコフや =チュグイエフスキーなどのロシア人學者による先驅的成果なくして、今日の盛況はありえなかったことは言うまでもない。私自身のささやかな成果でさえ、このお二人をはじめとするロシア人學者の成果に多くを負っていることを、冒頭に確認しておきたい。

(2) ただし、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グ所藏敦煌文獻の總數を 21,311 點とする高國藩のような無理解もまだ残っているようである【高 2003:89】。

(3) このほか、『俄藏敦煌文獻』の編集に従事した上海古籍出版社の府憲展や劉景雲などにも、コレクションに含まれる黒城出土文獻への言及がある【府 1996】・【劉 1999】・

また【榮 1996A】の指摘は、【榮 1996B(榮 1999)】における論證結果に負っている・

(4) この點について近年最初に注意を喚起したのは、榮新江や施萍淳らである【榮 1996A:125】・【施 1997:330】・なお宗舜も、孫繼民とは異なった視點から、『俄藏黒水城文獻』所収の文獻に注目している【宗 2001】・

(5) もっとも榮新江は、以前からコレクションに和田出土文獻が含まれることを説いていた【榮 1996A:122】・

(6) このうち、【關尾 2002B】に提示した 02887v の釋文は修正する必要がある・別の機會に詳述したい・

(7) 【關尾 2001】では、このうち異體字に着目して、吐魯番出土の佛典の辨別を試みた・

(8) このほか、チュグイエフスキーが紹介・分析した 03160 ほか 2 點の均田制關係の帳簿が、土肥義和が紹介・分析した【土肥 1983】・【土肥 1984】S.8347+S.9487 と一連の文書であることを論證した池田温の成果【池田 1985】もある・

(9) 最近接した【鄭・徐 2003】は、『俄藏敦煌文獻』第 12 冊に収録された非佛教文獻 7 點について検討を加えたものだが、やはりスタインコレクションやペリオコレクション中の文獻との接合が試みられている・

(10) 例えば轉帖については、【陸・鄭 1996】がある・

(11) このうち條記文書の概要については、さしあたり【關尾 1998】を参照されたい・

(12) 帳簿に限らず、吐魯番の佛教寺院に關係する新舊の文書についてのまとまった成果としては、町田隆吉のそれがある【町田 2002】・なお新出吐魯番文獻には、1 點だけだが轉帖もあった・67TAM74:1 (部分) だが、これについては、專論として【郭 1991】がある・

(13) 例えば戸籍に關しては、池田温の成果【池田 1979】をその代表的な成果として上げることができよう・なお均田制關係の帳簿についても、註(8)に掲げたように、敦煌と吐魯番とに共通する文書としての認識が獲得されている・

(14) 『俄藏敦煌文獻』には、04906 や 05982 など若干の付領文書が収録されているが、同様の文書は浙江省博物館にも所藏されているようで、『浙藏敦煌文獻』に、浙敦 155、同 156 として 2 點が収録されている・

(15) 本稿における 10838 に關する理解は、全面的に【中村 2004】に負っている・

(16) 表題は、【池田 1979:501】に従った・

【參考文獻一覽】

〔日文・中文〕(畫數順)

土肥義和

1983 「唐天寶年代敦煌縣受田簿斷簡考—田土の還受問題に關連して—」, 國學院大學文學部史學科(編)『坂本太郎博士頌壽記念日本史學論集』上卷: 301-341, 東京: 吉川弘文館・

1984 「唐代均田制下における敦煌地方の田土給授について—大英圖書館所藏「天寶載間敦煌縣受田簿」を中心に—」, 唐代史研究會(編)『唐代史研究會報告第 V 集 中國律令制の展開とその國家・社會との關係—周辺諸地域の場合を含めて—』: 123-136, 東京: 刀水書房・

中村威也

2004 「10698「尙書費誓」と 10698v「史書」について—特に P.3871 隸古定尙書・勵忠節抄との同卷關係をめぐって—」, 『西北出土文獻研究』創刊號(待刊)・

王克孝

2000 (訳) / 丘古耶夫斯基(チュグイエフスキー)(著)『敦煌漢文文書』,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愛和

- 2003 「英藏 S.681v 與俄藏 01454, 02418v 的綴與研究」, 『敦煌學輯刊』2003 年第 1 期: 12-17 ·
- 池田 温
1979 『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概觀·録文—』, 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
- 1985 「唐代敦煌均田制の一考察—天寶後期敦煌縣田簿をめぐって—」, 『東洋學報』第 66 卷第 1-4 合併號: 1-31 ·
- 西林昭一
2001 「ロシアへ渡った敦煌文書—新発見の書(28)—」, 『書聲』第 535 號: 28-31 ·
- 吳其昱
1986 「列寧格勒所藏敦煌寫本概況」, 『漢學研究』第 4 卷第 2 期: 73-82 ·
- 吳 震
2001 「俄藏“揖王入高昌城事”文書所系史事考」, 『吐魯番學研究』2001 年第 2 期: 1-8 ·
- 町田隆吉
2002 (編) 『吐魯番出土佛教寺院經濟關係漢語文書の整理と研究』(平成 12~平成 13 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 C2)研究成果報告書), 町田: 櫻美林大學 ·
- 宗 舜
2001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佛教文獻擬題考辨」, 『敦煌研究』2001 年第 1 期: 82-92 ·
- 府憲展
1996 「敦煌文獻辨疑録」, 『敦煌研究』1996 年第 2 期: 84-95 ·
- 金滢坤
2003 「《俄藏敦煌文獻》中的黑城文書考證及相關問題的討論」, 『敦煌學』第 24 輯: 61-82 ·
- 施萍淳
1997 「俄藏敦煌文獻經眼録」(二), 『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2 卷: 313-330 ·
- 孫繼民
2002A 「黑水城所出宋趙德家狀試釋」, 『敦煌學輯刊』2002 年第 2 期: 56-63 ·
- 2003B 「關於黑水城所出一件宋代軍事文書的考釋」, 王善軍(主編)『漆?先生紀念文集』: 492-498, 保定: 河北大學出版社 ·
- 徐 俊
2002 「俄藏 Dx.11414+Dx.02947 前秦擬古詩殘本研究—兼論背面券契文書的地域和時代—」, 『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 205-220 ·
- 高國藩
2003 『敦煌學百年述要』, 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 ·
- 張廣達·榮新江
2002 「聖彼得堡藏和田出土漢文文書考釋」, 『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 221-241 ·
- 郭 鋒
1991 「吐魯番文書《唐衆阿婆作齋社約》與唐代西州的民間結社活動」, 『西域研究』1991 年第 3 期: 74-78 ·
- 陳 明
2002 「俄藏敦煌文書中的一組吐魯番醫學殘卷」, 『敦煌研究』2002 年第 3 期: 100-108 ·
- 陸慶夫·鄭炳林
1996 「俄藏敦煌寫本中九件轉帖初探」, 『敦煌學輯刊』1996 年第 1 期: 3-13 ·
- 陸 離
2000 「俄, 法所藏敦煌文獻中一件歸義軍時期土地糾紛案卷殘卷淺識—對 02264, 08786 與 P.4974 號文書的綴合研究—」, 『敦煌學輯刊』2000 年第 2 期: 54-65 ·
- 榮新江
1996 A 『海外敦煌吐魯番文獻知見録』,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東方文化叢書 ·

1996B 「俄藏《景德傳燈錄》非敦煌寫本辨」，敦煌研究院(編)『段文傑敦煌研究五十年紀念文集』：250-253，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1999 『鳴沙集—敦煌學學術史和方法論的探討—』，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敦煌叢刊二集·劉景雲

1999 「俄藏敦煌文獻概覽」，『敦煌研究』1999年第3期：139-141·鄭炳林·徐曉麗

2003 「讀《俄藏敦煌文獻》第12冊幾件非佛經文獻札記」，『敦煌研究』2003年第4期：81-89·關尾史郎

1998 『西域文書からみた中國史』，東京：山川出版社·世界史リブレット·

2001 「ロシア，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グ所藏敦煌文獻中のトゥルフアン文獻について」，關尾(編)『敦煌文獻の總合的·學際的研究』(平成12年度新潟大學プロジェクト推進經費(學際的研究プロジェクト)研究成果報告書)：40-49，新潟：新潟大學人文學部·

2002A 「02947vの紀年をめぐる」，關尾(編)『出土史料を用いた漢魏交替期の社會變動に關する基礎的研究』(平成12~平成13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2)研究成果報告書)：44-47，新潟：新潟大學人文學部·

2002B 「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グ藏，02683v+ 11074 初探—トゥルフアン盆地の水利に關する一史料—」，『中國水利史研究』第30號：14-26·

2003 「サンクトペテルブルグ藏，戶籍様文書簡介」，『法史學研究會會報』第8號：74-80·

2004 「トゥルフアン將來「五胡」時代契約文書簡介」，『西北出土文獻研究』創刊號(待刊)·〔歐文〕

= =

1983 “ ”， .

(2003年11月18日稿了)

跨越中國邊境的跨文化互動學術研討會 榮新江 (北京大學)

2003 年 12 月 5-7 日，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召開了為紀念梅維恒教授而舉辦的“跨越中國邊境的跨文化互動學術研討會” (CROSSING THE BORDERS OF CHINA: A CONFERENCE ON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HONOR OF PROFESSOR VICTOR H. MAIR)，會議參加者有梅先生的學生、朋友和一些專家，發表文章的內容涉及梅先生研究的敦煌學、中外關係史等許多方面，這些論文將結集出版。現把會議日程和論文列出，供讀者參考。後附筆者所編《梅維恒教授敦煌研究論著目錄》，作為對他六十華誕的祝賀。

December 5, 12:00 PM-12:45

Opening Remarks

Changing the Rules of Scholarship to follow Victor Mair's Lead

Valerie Hansen, Yale University

December 5, 1:00-4:00

PANEL 1: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Chair: Hugh R. Clark

1. *Canonizing and Civilizing: The Problem of Text on China's Borders*
Sara Davis, Columbia University
2. *Sabao and Sabo: A New Analysis of the Community Leaders of the Sogdians in the Norther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Rong Xinjiang, Peking University
3. *Realism and Idealism in Yuanshi Chapters on Foreign Relations*
Michael C. Brose, University of Wyoming
4. *China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Laura Hostetle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December 5, 4:30-6:45

PANEL 2: DUNHUANG AT CROSSROADS

Chair: Yang Jidong

1. *The Han Dynasty and Silk Road: New Evidence from the Xuanquan Site near Dunhuang*
Yang Jidong,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 *The Beginnings of Buddhism at Dunhuang*
Daniel Boucher, Cornell University

3. *Narrative Legitimation of Space at Dunhuang*

Neil Schmid,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December 6, 9:00-12:00

PANEL 3: BUDDHIST EXCHANGES

Chair: Tansen Sen

1. *Masquerading as Translation: Examples of the Chinese Lectures by Indian Scholar-Monks in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Funayama Toru, Kyoto University

2. *Mahakasyapa and Kukuttapadagiri: From Magadha to Yunnan*

Wang Bangwei, Peking University

3. *New Look at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Tripitaka: Analysis of Shi Daoan Lu and Chu Sanzang Jiji*

Tanya Storch, University of Pacific

December 6, 1:00-3:15

PANEL 4: COMMERCIAL AND DIPLOMATIC ENCOUNTERS

Chair: Michael C. Brose

1. *A Note on the Tibetan Inscription at Lijiang, Yunnan*

Takata Tokio, Kyoto University

2. *China's Overseas Trade and the Religious Culture in the Minnan Region of Southern Fujian through the Middle Period (800 - 1450)*

Hugh R. Clark, Ursinus College

3. *Cross-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 Failed Diplomacy and Military Conflict between the Liao, Song, Xi Xia, and Jin Dynasties*

Peter Lorge, Vanderbilt University

4. *The Yuan Khanate and India: Cross-cultural Diplomacy during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Tansen Sen, Baruch College

December 6, 3:30-5:00

PANEL 5: THE EVOLUTION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Chair: Daniel Boucher

1. *A Lost Page in the History of State-Church Relationship at the Turn of the Eighth Century (700-713) : A Study of Huifan (d. 713), an "Evil" Indian Monk in China*

Jinhua Che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Asian" Cognitive Style*

William Hannas, Independent Scholar

December 7, 9:00-12:00

PANEL 6: ARTISTIC LEGACIES

Chair: Neil Schmid

1. *Shishi (Stone Rooms)*

Nancy S. Steinhard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 *Manipulating the Divine: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Empire on East Asian Temple Architecture*

Tracy G. Miller, Vanderbilt University

3. *Exotic Novelties from the West*

E.R. (Kezia) Knau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4. *Of Tools and Access: Intercultural Transmission of Art and Technology along the Silk Road*

Angela Sheng, Independent Scholar

附：梅維恒教授敦煌研究論著目錄

Popular narratives from Tun-huang, Ph.D. Disserta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1976. 敦煌通俗敘事文學作品

"Lay students and the making of written vernacular narrative: An inventory of Tun-huang manuscripts", *Chinoperl Papers*, 10, 1981, 5-96. 學仕郎與俗語敘述故事的抄寫：敦煌寫本目錄

"The narrative revolut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ontological presuppositions",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5.1-2, 1983, 1-27. 中國文學上的敘事革命：本體論的先決條件

"A newly identified fragment of the *Transformation on Wang Ling*", *Chinoperl Papers*, 12, 1983, 130-142. 一件新比定的《王陵變》殘卷

Tun-huang popular narrativ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敦煌通俗敘事文學作品

"What is *pien-we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4.2, 1984, 493-514. 什麼是變文

"Tun-huang wen-hsüeh [Literature]" (with Marsha Wagner), Nienhauser, et al., ed.,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I,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 Press, 1986, 829-832. 敦煌文學

"Oral and written aspects of Chinese sutra lectures (*chiang-ching-wen*)", *Chinese Studies 漢學研究*, 4.2, 1986, 311-334. 講經文的口頭傳承與抄寫流傳

"The origins of an iconographical form of the pilgrim Hsuan-tsang", *T'ang Studies*, 4, 1986, 29-41 + 7 pls. 旅行僧玄奘圖像的起源

"Records of transformation tableaux (*pian-hsiang*)", *T'oung Pao*, 72, 1986, 3-43. 有關變相的記

錄

- "Notes on the Maudgalyāyana legend in East Asia", *Monument Serica*, 37, 1986-87, 83-93. 東亞的目蓮傳說雜考
- "A partial bibliography for the study of Indian influence on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Sino-Platonic Papers*, 3, 1987, iv+214. 關於印度對中國通俗文學影響問題的部分研究文獻目錄
- "Tun-huang popular narratives", *Asian Folklore Studies*, 46.2. 1987, 273-286. 敦煌通俗敘事文學作品
- "A brief conspectus of studies on Tun-huang transformation Texts",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Institute (Baroda)*, 37.1-2, 1987, 47-43. 敦煌變文研究概觀
- "Parallels between some Tun-huang manuscripts and the seventeenth chapter of the Kōzanji Journey to the West", *Cahiers d'Extreme-Asie* (Special issue on Dunhuang Studies in honor of Fujieda Akira), 3, 1987, 41-53. 一些敦煌寫本與日本高山寺存西遊記第十七章的對應文字
- "The Buddhist tradition of prosimetric Oral Narrative in Chinese Literature", *Oral Tradition*, 3.1-2, 1988, 106-121. 中國文學中散韻相間的口頭敘事文學作品的佛教傳統
- Painting and performance: 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8. 繪畫與表演: 中國的看圖講故事及其印度起源
- 我與敦煌變文研究,《文史知識》1988 年第 8 期, 9-10 頁。
- "The contributions of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transformation texts (*pien-wen*) to later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Sino-Platonic Papers*, 12, 1989, 71 唐五代變文對晚期中國通俗文學的貢獻
- "India and China: Observations on Cultural Borrowing." *Journal Asiatic Society*, 31.3-4, Calcutta, 1989, 61-94. 印度與中國: 對文化借用的考察
- 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 A study of the Buddhist contribution to the rise of vernacular fiction and drama in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9. 唐代變文: 佛教對中國俗講和戲劇產生的貢獻之研究
- "Dunhuang as a Funnel for Central Asian Nomads into China", *Ecology and Empire : Nomads in the Cultural Evolution of the Old World*, ed. Gary Seaman (Ethnographics/USC, Monograph 1), Los Angeles, 1989, 143-163. 中亞游牧民族進入中國的門戶: 敦煌
- "Three Brief Essays Concerning Chinese Tocharistan (a. The Significance of Dunhuang and Turfan Studies; b. Early Iranian Influences on Buddhism in Central Asia; c. History of Chinese Turkistan in the Pre-Islamic Period)", *Sino-Platonic Papers* 16, 1990. 有關中國吐火羅斯坦的三篇劄記: 1. 敦煌吐魯番研究的重要性; 2. 早期重要佛教的伊朗文化影響; 3. 先伊斯蘭時代西域史
- "Tufan and Tulufan. The Origins of the Old Chinese Names for Tibet and Turfan", *Central &*

- Inner Asian Studies*, 4, 1990, 26 吐蕃與吐魯番: 中國古代對西藏及吐魯番稱呼的起源
-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ndard mandarin place-name 'Dunhuang'—with an added note on the identity of the modern Uighur place-name 'Turpan'", 《季羨林教授八十華誕紀念論文集》下, 南昌, 1991, 901-954. 我對現代標準官話地名“敦煌”來源的見解
-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from Tun-huang: the state of the field (1980-1990)", *Turfan and Tun-huang. The texts*, ed., A.Cadonna, Firenze 1992, 171-240. 敦煌漢文通俗文學研究領域的現狀 (1980-1990 年)
- "The Linguistic and Textual Antecedents of *The Sutra of the Wise and the Foolish*", *Sino-Platonic Papers*, 38, April 1993, 1-95. 《賢愚經》語文和文本研究的前提
- "Buddhism and the Rise of the Written Vernacular in East Asia: the Making of National Languages", *Journal Asian Studies*, 53.3, 1994, 707-751. 佛教與東亞書面俗語的興起: 論國家語言的創造
- "Śāriputra defeats the Six Heterodox Masters: Oral-visual aspects of an illustrated transformation scroll (P4524)",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8.2, 1995, 1-52+3 pls. 舍利弗與外道六師鬥法: 一件變文圖卷的口頭與視覺側面
- 釋“變文”的底蘊, 《學術集林》卷三, 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5年, 173-196頁。
- "The Khotanese antecedents of *The Sutra of the Wise and the Foolish (Xianyu jing)*", *Collection of Essays 1993: Buddhism Across Boundaries—Chinese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ed. Erik Zürcher et al., Sanchung, Twaiwan, 1999, 361-420. 《賢愚經》的於闐語前提
- "On 'transformationists' (*bianjia*) and 'jumbled transformations' (*laza bian*): Two new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transformation texts' (*bianwen*), with an appendix on the phonotactics of the Sinographic script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old Sinitic", *India, Tibet, China: Genesis and Aspects of Traditional Narrative*, ed. Alfredo Cadonna, Florence 1999, 3-70. 關於“變家”與“拉雜變”: “變文”研究的兩條新史料
- 《唐代變文》(上、下), 楊繼東、陳引馳譯, 香港中國佛教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 1999年12月。
- 《繪畫與表演——中國的看圖講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 王邦維、榮新江、錢文忠譯,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年6月。

敦煌寫本相書概述

鄭炳林 王晶波

(蘭州大學)

相術是世界古老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源於古代人民瞭解人生奧秘，把握命運的夢想與實踐。中國相術的起源很早，據史書記載，早在春秋時期，通過觀察人的身體形貌、聲音氣色來判定未來命運的方法已經在社會上層流行，人們稱這種方法為“相人”。《左傳》中記載了魯國大夫公孫敖聽說周內史叔服精通相人之術，就趁他來參加魯君葬禮的機會，請他為自己的兩個兒子看相的事蹟。戰國時期，荀子針對這種現象的流行，曾專門寫有一篇《非相》來批判它。到了漢代，相人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王充在《論衡》一書中提出“稟氣說”，奠定了相人術的理論體系。這時，已有了專門記載這種方法與經驗的書籍，這就是相書。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漢代的相書稱《相人》，有 24 卷。漢代的相士許負為許多著名人物看相，留下了不少傳說，據傳他也著有相書。後代相士仰其名望，著書也多假託他的名字，以便流行。《隋書·經籍志》著錄的相書有兩種，連同已佚的在內，共有七種。兩《唐書》中，僅《新唐書·藝文志》著錄了袁天綱《相書》7 卷、《要訣》3 卷，計兩種。《宋史·藝文志》著錄的相書很多，將近六十種。當然，這還不是這一時期相書的全部，有許多流行民間的相書沒有被史志所著錄。以上這些相書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幾乎全部散佚了，保存下來的，僅有成於宋代的極少數的幾種，如《玉管照神局》、《月波洞中記》等，而唐代及唐以前的相書無一流傳至今。材料的空缺，為我們認識瞭解唐代及唐前相術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所幸的是，在敦煌文獻中，我們發現了十多種唐代及唐前相書的寫本殘卷，為我們提供了瞭解唐宋以前中國古代相書原貌的唯一資料根據，尤其顯得珍貴。

從目前公佈的情況看，敦煌文獻中共保存有 12 個卷號的相書寫本，分別收藏於法國巴黎圖書館、英國國家圖書館等處。這些相書的卷號分別為：P.2572、P.2797、P.2829、P.3390、P.3492V、P.3589V、CH00209、CH87 (IOL TIB J511)、S.3395、S.5969、S.6976、S.9987B1V 等。

對這些敦煌寫本相書殘卷，從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先後有中、日、法等國學者分別予以關注和研究，王重民、松本榮一、陳祚龍、侯錦郎 (Hou Ching-Lang)、菅原信海、黃正建、高國藩、陳興仁等先生，都對之作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論述和釋錄刊佈。這些研究或個別，或全面地探討了敦煌寫本相書的內容、意義及與當時社會文化歷史的關係，使人們瞭解了敦煌相書的基本情況與內容意義，尤其是黃正建對敦煌相書的整體研究，使人們對這些文獻有了全面的認識，代表了目前敦煌學界關於敦煌寫本相書的最高研究水平，對全面整理和研究敦煌寫本相書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是，這些研究在今天看來還存在很多不足，錄文刊佈甚少，錯誤較多，研究還處於較淺的初級階段，對相書基本內容的認識仍不清晰，對其中所蘊涵的複雜內容及相關文化因素缺少深入、全面的剖析，對其意義的認識也還不足，至今仍然沒有一部關於敦煌寫本相書整理研究的專著，等等。我們近年來對敦煌雜占類文獻整理研究時，也對敦煌寫本相書作了全面的搜集、整理，現根據我們對敦煌寫本相書的整理心得，分別對敦煌寫本相書的研究狀況、敦煌寫本相書的分類及年代判定、敦煌寫本相書對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和敦煌民俗的價值作了一些探討。由於我們初次研究敦煌寫本相書，錯誤

與不足在所難免，祈請學界有關專家批評指正。

一、敦煌寫本相書研究和刊佈的現狀及其所存在的問題

敦煌寫本相書研究起步甚早，首次對敦煌寫本相書進行研究的是王重民先生，他于 1936 年在《敦煌古籍敘錄》子部對敦煌寫本相書 P.3589V、P.2572、P.2797 作了詳細的考察，分別就三卷相書之間內容的異同、性質、影響作了精闢的論述，並考察了古代相書的淵源：“按隋唐志著錄相書甚多，書名卷數，均與此相應。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三，有《黃帝樊薛許氏相圖》，所舉撰人，有不同。錢曾《讀書敏求記》卷三，有許負《相法》一卷，僅十六篇，內容亦不相符。此蓋均為相近之書，自古傳行民間，久失撰人姓氏（或出於眾人之手，原無撰人姓氏），尊許負者便題許負相法，尊袁天綱者或謂為袁天綱相書；更多託古人，以炫其名貴，如此敦煌本之東方朔、管公明，張彥遠著錄之黃帝、樊薛等是也。故余僅考知其見重於世，不原斤斤於撰者主名也。”“據敦煌遺書內傳本之多，可推知唐代流行之廣。唯其纂自民間，故為唐以前通俗相之總匯。再證以群書，而有以其淵源之古，而學者引用之多也。”首次向學術界介紹了敦煌寫本相書的基本情況，開敦煌寫本相書研究之先河。

緊接王重民之後，對敦煌相書相圖有所研究的是日本學者松本榮一，他於 1937 年、1956 年先後撰文對敦煌所存相圖 CH00209、P.3390 進行了介紹研究，對這兩幅相圖的內容、性質、用途及相關情況都有精闢的論述。可惜流傳不廣，未引起中國大陸學者的足夠注意。

旅法學者陳祚龍於 1973 年在《四川文獻》第 137 期撰文《相學國手袁天綱》一文，論及的敦煌相書資料除 P.3589V、P.2572、P.2797 號三卷之外，尚有 P.3390、P.3492、P.3395、S.5969 號等卷，並于文末釋錄了 P.3390 號，對於學術界瞭解敦煌寫本相書的整體情況特別是對 P.3390 號的認識起了很大作用。

法國著名漢學家侯錦郎 (Hou Ching-Lang) 於 1979 年在日內瓦出版的《敦煌學論文集》第一卷發表了他關於敦煌寫本相書的研究成果《敦煌寫本中的唐代相書》(Physiognomie d'après Le teint sous La dynastie des Tang) 一文，分別對相的歷史和敦煌寫本相書的內容，以及 P.3390 號相書的年代、相圖、文書作了多方研究，特別是對各種面色預兆吉凶的根源和依據歷史作了深入的探討，通過對 P.3390 號寫本正面背面抄寫文書的分析，認為“該文書可以被斷代為 10 世紀上半葉，完全相當於同一世紀紙張的特徵，紙漿不均，粗大的網紋具有不同程度的規則性。此外，其行體字的漫不經心的風格也是 10 世紀時代所特有的。”是“一種為了由平民日常參閱的簡單和具體的相面手冊。”相圖是“由同一個人用粗大和強有力的線條描繪成，保持了一圓面龐為特徵的盛唐時代的繪畫風格，在同一幅圖中配有某些解說，或者是與用朱砂線條勾勒的相圖有的某些解釋。”並對相圖面部部位名稱、面部發色預兆吉凶淵源作了探討。好色包括黃色和桃花色，惡色有赤色、白色、黑色、黑青色、幹脯色、陷水花色和死馬肝色。文中結合五行說對面部所發各種客色預兆吉凶說法的思想根源作了多方研究。侯錦郎關於 P.3390 的深入的研究，對於推動這方面的研究功績甚大，然國內學術界很少瞭解這一研究成果。直到 1993 年 3 月才由耿升先生翻譯為中文由中華書局出版。

黃正建於 1988 年在《敦煌學輯刊》發表了他關於敦煌寫本相書的研究成果《敦煌文書中的相書殘卷與唐代的相面》，通過對 P.2572 號、P.2797 號、P.3589V 號相書異同的比較，

考察了它們的成書時代，又介紹了 S.3395 號、P.3390 號、P.3492 號、S.5976 號等四卷《相書》的基本情況。對王重民先生認為 P.3589V《相書》是託名許負編集，實乃古代傳行民間的諸種相書之一的觀點作了補充，同時論述了相面在唐代社會裏的作用。2001 年，他又出版了《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一書，書中用一節的篇幅，分類介紹了十二個卷號的敦煌寫本相書，這是迄今對敦煌相書的最全面介紹。他將十二件相書分作三個系統：許負相書系統（2 類 4 種 7 件）、鬘子圖（3 種 4 件）、面色圖（1 件），對每一類相書的特徵、內容都有簡略的說明，還考察了隋唐及宋代正史藝文志所著錄的相書，比較了它們與敦煌寫本相書的異同。黃正建的研究從總體上將敦煌寫本相書的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高國藩在 1989 年底出版的《敦煌民俗學》、《敦煌古俗與民俗流變》和 1993 出版的《敦煌民俗資料導讀》等書中，分別用了整章的篇幅來講述敦煌寫本相書與相面風俗，介紹了敦煌寫本相書的九個卷號，分別是：P.2829 號、S.3396 號、S.5969 號、S.5976 號、P.3390 號、P.2575 號、P.2797 號、P.3492 號、P.3589V 號等。另外分別對敦煌民間相書之簡述、看相風俗的由來、敦煌民間相色之奧秘、相色奧秘之探討、敦煌民間相額紋與手足紋等方面作了多角度的論述。高國藩先生對相色奧秘的探討是可貴的，但是有些看法和研究性結論，在目前看來，確有進一步探討的餘地。他的書中附了部分相書釋文，對於瞭解相書內容作用甚大。

日本學者菅原信海於 1992 年在池田溫編《敦煌漢文文獻》中撰寫了《占筮書》一章，其中第十部分專門介紹了敦煌寫本相書。並對敦煌寫本中的六個卷號作了介紹，分別是 P.3589V、S.3395、P.2572、P.2797、S.5976、P.3492 號等。

陳興仁於 1993 年出版了《神秘的相書》一書，僅於《群書攬要》部分對敦煌寫本相書作了點滴的介紹。主要引用《續修四庫全書提要》中對許負相書的介紹，沒有進一步的探討與論述。

雖然前人在敦煌寫本相書研究、整理、詮釋、刊佈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成果甚多，但是這些研究從整體看，仍然不盡人意，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許多問題。

第一、介紹缺漏太多，沒有一個完整的輯錄校注本。

王重民先生僅介紹了敦煌寫本相書中的三個卷號：P.3589V、P.2572、P.2797 號，遺漏甚多。而《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認為敦煌遺書共有三個卷號的《相書》殘卷，乃受王重民先生的影響。陳祚龍於三卷之外又介紹了五卷，即 S.3395、S.5969、S.3492、P.3390 號，認為敦煌寫本相書共有八個卷號，在其論文中僅對 P.3390 號《相色發麵看吉凶厄法》作了釋錄刊佈。侯錦郎在其論文中認為“其中一部叫做《相書》的著作的 6 卷寫本現分別收藏于巴黎國立圖書館（伯希和特藏 P.2572、2797 和 3589 號）、倫敦大英博物館（斯坦因特藏 S.3395、5969 號）和印度事務部圖書館（藏文寫本第 511 號）。這部著作被歸於許負和其他 12 位著名相士。根據黑子相面的一部著作的 3 種寫本保存在同一批特藏中（P.2829、3492 背 1 和 S.5976 號）。我們作為本論文基礎的根據客色進行相面的一部相書的寫本，同樣也出現在伯希和特藏中（P.3390）。”這樣來看，侯錦郎所掌握的敦煌寫本相書共有三個種類 10 個卷號。菅原信海文中雖然參考了王重民、侯錦郎的研究成果，但在行文僅指出了六個卷號。高國藩先生認為“敦煌民間《相書》主要有 9 個卷號：（1）伯二八二九背面。（2）斯三三九六。（3）斯五九六九。（4）斯五九七六。（5）伯三三九〇。（6）伯二五七二。（7）伯二七九七。（8）伯三四九二。（9）伯三五八九。”行文中僅對 P.3390 號內容和 P.2797《相書》相手掌紋、

相足紋、相額紋等部分內容釋錄引用。陳興仁書中所提及僅 P.3492 號一個卷號。由是得知，敦煌寫本相書在各種研究著作、論文中介紹多寡不一，雖經學者不斷搜求，但仍不全面。只有黃正建的書中介紹最為全面，共有十二個卷號，但還未有更深的探討。特別是這些論著所列卷號前有後缺、互相抵牾，使讀者難以適從，無法瞭解敦煌寫本相書的整體情況。整理刊佈尤其顯得不足。大部分刊佈研究都集中於 P.3390 號一個卷號，同敦煌寫本相書總量相比，刊佈量只占總數的十分之一，而且存在許多錯誤。黃永武先生編《敦煌古籍敘錄新編》影印了 P.3589V、P.2572、P.2797 號三個卷號，又收錄有 P.3390 號校錄本，但是把 P.2661 號作為相書影印於其中顯然是錯誤的。遲到目前，全面校錄的敦煌寫本相書只有 P.3390 號一個卷號。這種狀況對於學術界瞭解敦煌寫本相書全貌並對之進行研究非常不利，影響了這方面研究的發展。故對敦煌寫本相書進行全面輯校，整理出一個收錄完整齊全，校勘精良的校錄本供學術界使用乃當務之急。

第二、敦煌寫本相書缺乏系統研究

從敦煌寫本相書總體寫卷數量來說，敦煌寫本相書與敦煌寫本解夢書差不多。但是對於敦煌寫本相書的研究遠不及敦煌寫本解夢書那樣多。敦煌寫本解夢書的研究刊佈，先有戴仁 (Jean-Pierre Drege) 的研究及對 P.3908 的刊佈，後有劉文英先生的全面輯校，鄭炳林等又於 1995 年又出版全校本，加上其他零散研究，研究的廣度覆蓋了敦煌寫本解夢書的方方面面。敦煌寫本相書的研究整理就遠不及解夢書了。首先缺乏系統的輯校，敦煌文書的特點之一就是書寫潦草，錯字、誤字、俗字及奪字、脫文比比皆是，若不對這些錯誤校正，就無法利用文書進行研究。相書殘卷也是一樣，加上影印模糊，釋讀更為困難，須細加整理後，方能利用。整理中最艱難的工作是釋讀和校勘，敦煌寫本相書俗字、借字無一定變化規律可尋，全憑長期琢磨和多看文書的經驗，而校勘多以他校為主，資料來源複雜，因此查閱資料是一項艱辛的工作，相書的相辭字句的校正對於研究本身意義重大，到目前為止，學術界仍無人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其次敦煌寫本相書定名、年代判定及各個寫卷的關係上，缺乏系統的探討，這主要是因為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沒有或者因為條件限制未能對敦煌寫本相書作全面的瞭解。從僅有幾家研究來看，相對集中於幾個卷號上，缺乏全面的研究。侯錦郎的研究主要圍繞 P.3390 號進行，對該相書抄寫年代的判定和內容淵源的探討，有很大貢獻，而對其餘相書殘卷僅在文前提及而已。高國藩先生的研究除了對 P.3390 號作了較深入的探討，還從敦煌相書來推測唐代相法的一般狀況、紋的相法作了一定論述，有些提法過於大膽，顯得有些偏激，不為一般學者所接受，對於開拓思路多方面多角度考慮問題卻很有用。王重民先生關於敦煌寫本許負《相書》的看法是精闢的，但是王重民先生所根據的僅三個殘卷，對其他殘卷及其它類相書隻字未提。《續修四庫全書提要》對敦煌寫本相書亦缺乏全面的論述。

二、敦煌寫本相書的分類及其有關問題

敦煌寫本相書根據我們目前掌握的情況約有 12 個卷號，分別收藏在法國巴黎圖書館、英國圖書館等處，從內容、形式等方面的特點看，可分為五個系統：

第一、許負相書系統。這一系統的相書所擁有的共同特徵是，書名題作《相書一部》或《相書一卷》，作者題“漢朝許負等一十三人撰”或“漢朝許負等一十三人集”，按三十六

篇的目次分篇，依次記述人體形貌、聲音氣色、步態及“身面諸文鑿”等特徵及所代表的命運貴賤吉凶。各篇所存長短不一，排比拼合之後，全部可得三十五篇。

這一系統的相書抄本共有 5 件，CH87、P.3589V、S.5969、P.2572、P.2797。這 5 件相書寫本基本上都具有上面所說的幾個特徵，但仔細比較其內容、篇目，其中又有一些小的差異，根據這些差異，又可將它們細分為三小類，即 CH87、P.3589V、S.5969 為一類，P.2572 (A) 為一類，P.2797 為另一類。

(1) CH87 號原藏於英國印度事務部圖書館，後併入英國圖書館。此卷首全尾殘，存 93 行。書名作《相書一部》，下題“漢朝許負等一十三人撰”，後列出許負、李陵、東方朔、管公明、陶侃、耿恭、朱雲、黔婁先生、張良、鹿先生、神農、李固、張禹等一十三人之名。並云：“許負相書及身面諸文鑿合卅六篇，許負撰，並序。序曰：夫積善餘慶，則眾相自然，積惡顯揚，表其深現。凡相官府部，難得骨肉相。夫陽光潤澤，細以有殊，眉峻黑，眼目鮮明，陽中開闊，陰中太平，龍精鳳目，闕上毫生，面如滿月，方斷天亭，鼻筒懸膽，溝瀆深零，口上四字，斷(口𠵼)峰貞，齒白如玉，舌似花生，言語清朗，折挫龍鳴，耳博腦輪廓環，奶闊尺二，宿幽清，手足紫色，甲像紅櫻，指尖無節，(口孫)血文成，五策入掌，龍虎鳳行。”所存篇目，包括序文在內，共計二十八篇。依次為：序、軀貌、五官、六府、面、發、額、眉、眼、鼻、耳頰、鼻人中、唇、口、齒、舌、聲、頤頷、項玉枕、背、心脅、奶臍、玉莖大起、膝、踝腳、行步、臂手、〔額〕〔文〕。此卷相書在敦煌寫本相書中抄寫最為工整清晰，文字內容較為準確，對我們識讀和校正其他抄本中的訛誤有很大的幫助。

(2) P.3589V 號相書，抄于法藏敦煌寫卷 3589 號的背面，首全尾殘，存 75 行，以及三幅面部圖、兩幅全身圖、三幅手部圖。書前題《相書一卷》，下有小字雲：“漢朝許負等一十三人集”，並列許負等一十二人姓名，經與 CH87 對照，缺者為李固，大約為抄寫遺漏所致。所存篇目，從序至《耳頰第十一》，《心脅第廿一》至《腳掌文第卅》，共 21 篇，缺鼻人中至項玉枕部的 8 篇，以及額文部 1 篇，共計 9 篇。所存篇目沒有完全依照目次順序排列，而顯得有些雜亂，並有錯訛。如列為八、九、十的眉、眼、鼻三篇排在五(面)、六(發)兩篇之間，《背第廿》訛作《背第廿六》，排在廿五、廿六的踝腳、行步之間，以至於有兩個“廿六”，《心脅第廿一》與《玉大莖第廿三》則先後排在廿七之後、廿九之前。這樣的排列可能是為了適應卷中的相圖而造成的。此卷存有 8 幅相圖，分別為三幅面部圖、兩幅全身圖和三幅手相圖。

寫本相書正面所抄的第一部分是玄像詩，根據鄧文寬先生的研究，“本卷抄寫年代今不可考，估計可能在隋唐時代。”本卷玄像詩根據玄像詩改編而成，因此年代要晚于玄像詩的年代，玄像詩的年代根據 P2512 號與之連抄之《廿八宿次位經》之後有“自天皇已來至武德四年二百七十六萬一千八歲”的記載，“可證是唐初或唐以前的作品。至於其抄寫年代，則有待進一步考定。”因此 P.3589V 號的抄寫年代不會很晚，可能是唐代中前期的抄本。

(3) 同類相面書還有 S.5969 號。該卷相書上下部及其後部具殘，保存有三十一行的中部，從內容上看，是許負相書的序第一到耳頰第十；從殘存文字記載相書篇第順序看，與 CH87 號許負相書完全一致，可以肯定是同一相書的不同抄本。只是在抄寫中脫失文字所形成的差異。特別是本卷脫失文字比較多。

(4) P.2572 (A) 《相書一部》

P.2572 (A)《相書一部》，抄寫于法藏敦煌寫卷 P.2572 號的前半部，首殘尾全，存 184 行，末有尾題，稱《相書一部》。由於其卷後接抄有另一相書¹¹，為區別起見，我們稱此部相書為 P.2572 (A)，稱另一相書為 P.2572 (B)¹²。此部相書殘卷所存內容，從《相軀貌部第二》至《相人面氣色第卅五》，共 34 篇。

在敦煌許負系統相書中，P.2572 (A) 保存下來的篇目是最多的。敦煌許負系統相書的篇目共有三十六篇，CH87 存 28 篇，P.3589V 存 22 篇，P.2797 存 19 篇，S.5969 殘存 11 篇，而在 P.2572 (A) 中，雖然篇首的序已殘去，但它保存了從《相軀貌部第二》至《相人面氣色第卅五》的內容，保存下來的篇目足有 34 篇！經過與其他許負系統相書的拼合，使我們能夠看到的許負系統相書的篇目達到了 35 個。它的存在，為我們瞭解唐代所通行的許負系統相書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P.2572 (A) 的篇目名稱、排列次序在第二十八篇之前，大多與其他四種許負系統相書相同，但自第二十八篇開始，篇目名稱及內容都有了不同。從第二十八篇至第三十五篇，P.2572 (A) 依次作“相毫毛”、“相人面郭三亭”、“相男子”、“相女人九惡”、“相額文”、“相手掌文”、“相腳足下文”、“相人面色氣”，而 CH87、P.2797、P.3589V 則依次作“額文第廿八”、“手掌文第廿九”、“腳掌文第卅”，三十二至三十四的篇目，P.2797 與 P.2572 (A) 相同。

P.2572 (A) 前半部的文字內容與其他四種相比，基本相同，但也有著些微的差異。而後半部的內容則不同于其他許負相書。如“人面郭三亭”、“男子六惡”、“女人九惡”以及“面部氣色”等等，這些內容雖然我們在其他敦煌許負系統相書中找不到，但在傳世典籍的記載中卻可見到，並與之有著不少相似的地方。可見，P.2572 (A)《相書一部》屬於敦煌許負系統相書是沒有問題的，但它與 CH98、P.2797、P.3589V、S.5969 等其他四種許負系統相書所用的底本不同。

黃正建根據 P.2572 號兩部相書中間夾抄的曆日中出現的“景寅”、“景子”等，判定 P.2572 的底本當屬唐代；又據其中的“丙午”、“丙申”等字樣，認為是五代時所抄。這一看法是正確的。另從抄寫字體及其相關文書的關係上看，也應當是這一時期的抄本。

(5) P.2797 號單面抄寫，首殘尾全，存 120 行。首部殘損嚴重，斷裂處由下邊撕去 15 行左右的一段，僅餘上半部，中間又有一條橫向缺口。所存篇目，由殘文來看，可辨別的有齒（僅存三字）、舌、聲、頤頷、項枕、背、心脅、奶臍、玉莖大起、膝、踝腳、行部、臂手、額、手掌文、腳掌文、額文、手掌文、腳足下文，其次序從齒第十五到相腳足下文第卅四，計 19 篇。這些篇目及內容與 CH87、P.2572、P.3589 等許負相書基本相同。P.2797 在抄寫與內容方面有兩點應加以注意。其一，在《腳掌文第卅》之後，中間空一行，接抄相“額文”的內容，沒有注明篇次，筆跡與前面不同，抄寫格式亦與前面不同。前面的內容為一人所抄，每篇相連，不單另起行，有關紋理的記載也是如此，字跡稍顯潦草；《腳掌文第卅》之後接抄的部分，為另一人所抄，每個紋相單獨起行，後面的兩個篇題亦另起，字跡相對工整一些。其二，《腳掌文第卅》之前的文字，與其他許負相書比較，與 CH87、P.3589 更為接近，而稍異於 P.2572。黃正建估計此卷“可能為雜抄或後來雜貼成的一份卷子”¹³由於以上兩點，我們將之單列為一小類，以與 CH87、P.3589V、S.5969 及 P.2572 等相書區別。

此卷背面抄寫有《己酉年曆日》，鄧文寬先生研究認為，這個“己酉年”就是大和三年

¹⁴，即西元 829 年，正是吐蕃佔領敦煌時期。因此正面抄寫的相書當在此前，與之時間不會很遠，很可能也是吐蕃佔領敦煌時期抄寫的作品。其次從二者抄寫的字體特點上來看，也基本一致，表明也是同一個人所抄寫。

敦煌寫本相書的第一類雖然保存比較完整，但是裏面還是問題很多，首先是篇目到底有多少，儘管序文中明確記載有三十六篇，但是我們從相關敦煌寫本相書中只見到三十五篇，第卅六篇內容是什麼，學者根據敦煌文書 P.2829V 號相痣圖所題“婦人背卅六”，推測許負相書的第三十六篇可能是相婦人背¹⁵，這也是學術界的一般看法。在我們看來，這個看法還有進一步探討的餘地。其次敦煌寫本許負系統相書，抄寫相當簡略，是否這就是當時相書流傳本的原貌，有沒有經過當地文士的刪略修訂等，都值得進一步考察。第三敦煌寫本相書的抄寫水平都比較低，錯誤比較多，主要集中在遺漏、錯訛文字，脫落原文，倒錯段落等，有些內容字句難以識讀和理解，要做到完全正確的釋錄確實比較困難。

第二、S.3395 和 S.9987B1V 號拼合而成的相書殘卷。

S.3395 號相書寫卷，前後及上下均殘，104 行，其中完整的僅有 7 行；S.9987B1V 號僅存 12 斷行，全部不滿 70 字，可與斯 3395 號的最後 12 行拼合。拼合後的寫卷仍不完整，沒有書題、作者及卷數等內容，所存篇目從殘文來看，從〔總述第二〕（擬）到相人面及身上毫毛十六，共有 15 篇。

此件相書殘卷，所有的研究者都歸於許負相書系統。我們經過比較研究，認為這件相書在篇目名稱、排列次序、內容解說方面均與許負相書有著較大差距，不能歸入一類中。理由如下：（1）篇目名稱、排列次序不同。此卷相書的篇目依次為總述第二（擬）、占額第三、眉部第四、眼部第五、耳部第六、〔鼻部第七〕、〔人中第八〕、唇部第九、口部第十、齒部第十一、〔舌部第十二〕、項部第十三、胸臆部第十四、臂部第十五、相人面及身上毫毛十六。而以 CH87、P.2572 為代表的許負系統相書的篇目編排大致為：序、軀貌、五官、六府、面、發、額、眉、眼、鼻、耳頰、鼻人中、唇、口、齒、舌、聲、軀貌、五官、六府、面、發、項玉枕、背、心脅、奶臍、玉莖、膝、腳踝、行步、手臂、毫手、人面郭三亭、男子、女人、額文、手掌文、腳掌文、人面色氣。雖然 S.3395+9987B1V 保存下來的篇目沒有許負相書多，但就所存部分而言二者已有較大不同，沒有軀貌、五官六府等綜述內容，沒有為頰、發、頤頷等部位專設篇章。（3）內容不同。此卷相書中出現了許多許負相書中所未見過的內容，如五星六曜、五行形相、五嶽四瀆等內容，並吸收了佛教“相好”中所宣揚的大耳長臂之相。相近篇目的內容也都較許負相書解說更加詳細，有些說法有著較大差距。綜合 S.3395+9987B1V 與敦煌許負系統相書在篇目、內容以及語言形式等方面的差異，可以肯定，此卷相書與許負相書不屬於同一系統。鑒於書中還出現有“許負曰”、“經曰”、“袁應曰”的字樣，可以認為，此卷相書是在許負等傳統相書的基礎上，彙錄當時的各種相書及流行相法，重新編纂而成的一部新的相書。

第三、相痣類相書。這一系統的相書抄本共有 4 個卷號，包括 P.3492、P.2829、CH00209+S.5976 三種。

（1）P.3492V 存 93 行（另有 7 行抄寫曆日，與此卷內容無干，故未算在內），前後均殘，無書名、卷數、作者等。所存主要部分題作“身部圖三 正面圖、伏人圖、側人圖”，分正面、背面和側面敘述人身體各個部位之名稱，及其所在黑痣代表的命運。《身部圖》之

前有尚 5 行殘文，述頭面部黑子及其命相，可能是“頭面圖”的內容。鑒於此相書的主幹部分稱爲《身部圖》，遵從文獻整理的一般原則，所擬其書名亦當稱“圖”，可暫稱此相書殘卷爲《身面鬢子圖》。

此卷相書對頭面部黑痣的記載，包括了眉、眼、耳、頰、口等部位。對身體黑痣的記載，爲殘存相書的主幹部分，稱《身部圖》，分正面、背面和側面三個角度進行。首句即云：“人身前後兩畔總有七十四部”，謂人身體前面及側面劃分爲七十四個部位。記述由頸部開始，其次爲胸乳、腹臍、股、膝、足，逐漸由上往下，共提到 50 多個身體部位名稱，有些名稱在傳世相書中沒有記載。所述著重在身體部位名稱、位置及黑痣所代表的命運貴賤吉凶，同時也涉及某些部位的形態、顏色。從內容上看，此卷相書對身體部位及黑痣的記載，較傳世相書要豐富許多，真實反映了唐代相痣類圖書的繁盛面貌。

P. 3492 號正面是唐朝散大夫太常卿博士呂才推《諸雜推五姓陰陽等宅圖經》和《唐光啓四年戊申歲具注曆日》，後者倒抄；背面此卷相書中間亦夾抄有《唐光啓四年戊申歲具注曆補記》，這都表明這卷相書鈔寫于晚唐五代敦煌歸義軍時期。

(2) P. 2829 號。此卷號共存有兩幅人體背部圖，一幅繪在正面，一幅繪在背面。正、背面二圖繪製形象相似，占辭筆跡亦同，當爲一人所繪。

正面所繪人體背部圖爲腰以上部分，手臂存腕以上部分。沒有標題、作者及內容方面的說明。共標出黑痣所在位置 10 處，分佈在左右耳後、肩後及兩臂。黑痣皆有占辭解說。所繪人體從背部看不出性別，但根據圖中所注占辭皆屬女子命運，可知爲婦人。圖左抄《解夢書》16 行，後及下部殘。

背面繪人體背部圖亦爲腰以上部分，有標題，作《婦人背卅六》。共標出黑痣所在位置 10 處，分佈在肩後、兩臂及腰部，其中腰部四顆黑痣未加解說。根據圖中所注占辭看，“文筆”、“多藝”都是男子才有的命相，與標題所雲“婦人背”的說法不相符合，不當爲“婦人背”，而應當是男子背，正面所繪才是婦人背。

(3) CH00209 號+S.5976 號。此卷爲中國傳統相術中的相痣圖，爲兩個卷號的殘片拼合而成。此圖前段及上下均有殘損，無標題、作者，以及其他的文字說明。共存有男子面部圖、男子全身正面圖、女子面部圖、男子全身背面圖、女子全身正面圖、女子全身背面圖六幅。圖中用圓黑點標出黑痣所在位置，旁邊有簡略的文字注解（占辭），以說明此痣所代表的吉凶命運。

此件相圖中，男子面部圖大部已殘，僅餘右耳及面頰鼻准以下部分，標出黑痣 54 顆，所標位置，大體按照與面部十三部位平行橫列的位置排列，如年上、準頭、口正（或稱水星）、承漿、地閣一線橫列八位、十位不等。每顆黑痣，又都有各自的占辭解說。男子正面全身圖示出黑痣 60 顆，背面全身圖示出 21 顆（脛至足部殘），合起來共有 81 顆黑痣。這一數位，較傳世相書的記載要豐富許多。

經過拼全後的女子相痣圖要更完整一些，面部圖共注出天中、印堂、年上、人中、口正（水星）、承漿一線及左右耳部黑痣 57 顆，女子正面全身圖、背面全身圖分別標出黑痣 29 顆與 16 顆，合計 45 顆。這些記載是傳世相書無法相比的，因爲在傳世相書中根本就沒有女子身體圖，同樣也沒有占辭解說。這件相圖保存了唐代相術中有關男女頭面及身體黑痣的位置及解說，因而十分珍貴。

第四、部氣色圖。主要指 P.3390 號。

P.3390 為法國國立圖書館所藏敦煌相書寫本長卷，首殘尾全，共存有大小十一幅相圖和相關的文字占辭解說。無書名、作者等內容。《敦煌遺書總目索引》籠統地稱之為《相書》，注明有圖，並雲：“內有子目題為《九州色發麵圖看吉凶法》。背有張安信邈真贊，天福十年孔明亮撰。”¹⁶

此卷相書的內容以相面部氣色為主，圖文配合，分五個部分記載了唐代相術中有關氣色的內容。它們分別是：(1) 面部十二支圖。殘存的面部圖在右額角及眉側部位，標有“未”、“申”等字樣，由此可知是以十二支來劃分面部，大概是按每日各個時辰面部氣色的不同來判斷吉凶。(2) 面部十二月分佈圖。此圖從額上天中起，沿面部中線直下，分別標出一至十二月的名稱，其中額部至人中為正月至九月，口部未標，唇下至地閣，標十至十二月。圖前有五行殘文，可能是此圖之名稱及相關內容、作用的解說，但已殘損不全。此幅相圖是根據面部十二月的分佈，觀察每月面部所發氣色，對應其月在面部圖中所處位置，來判斷那个月的吉凶禍福。(3) 面部九州分佈圖。圖中將面部劃分為九部分，每一部分屬於一個州。九州的分佈如下：天中—陽（揚）州，鼻—中豫州，下頰—冀州，左額角—徐州，右額角—荊州，左顴頰—青州，右顴頰—涼（梁）州，左腮—兗州，右腮—雍州。圖前有五行說明文字，說明此圖是根據面部九州的分佈，看每一部分所發氣色如何，來判斷前往該地是吉是凶，宜與不宜。(4) 相色發麵圖看吉凶厄法。這一部分共有八幅較小的面部圖，分別用來標注各個部位所發氣色如何，旁有占辭解說，用細線與圖中所標部位及氣色連接起來。這一部分主要是根據面部十三部位的劃分，來判斷每一部分所發氣色兆示的吉凶命運。除過相圖及其解說外，還有二十八行文字占辭，沒有相圖以作參照，所記內容也與此相關，互有補充。松本榮一、侯錦郎對此均有研究。(5) 候病人法。這一部分抄在寫卷的最後，僅有六行。從五臟、五行、五色的相配，來判定病人所得何病，有何症狀，將死于何日。等等。

從整個殘存寫本看，此卷相書的內容皆以面部為主要對象，通過對面部的不同劃分，來觀察這些部位所發氣色，並判斷其所兆示的吉凶禍福。可以確定，第四部分的《相色發麵圖看吉凶厄法》是此卷相書的主幹部分，因此也有不少研究者直接稱此相書為《相色發麵圖看吉凶厄法》。我們認為，稱為《面部氣色圖》更能代表整卷相書的內容特點。

第五、相法類相書。主要指 P.2572 後半部，我們稱之為 P.2572 (B)，擬題作《相法》。

P.2572 (B) 接抄在 P.2572 (A)《相書一部》之後，與之相隔七八行的五行、曆日等雜寫等內容。以“何以知人……”為特徵，述形貌、氣色、舉止等所兆示的吉凶禍福，抄寫筆跡、行款均與前面的許負相書一致，當是同一人所抄。我們稱之為 P.2572 (B)，並擬題為《相法》。P.2572 (B) 相書寫本首全尾殘，無書名、作者等內容，共存 74 行。P.2572 (B) 接抄在許負《相書一部》之後，無書名、卷數、作者等。

關於此卷相書，大多研究者都沒有注意到它與 P.2572 (A)《相書一部》的不同，而理所當然地看作前者固有的內容而未加以申說。黃正建在《敦煌文書中相書殘卷與唐代相面》一文中注意到前後所抄內容的不同，並有所說明，但在他後來的分類中，還是將之附於前部的《相書一部》而歸在許負相書系統之中。

我們經過對比研究，認為，P.2572 (B) 所抄的內容、形式均與前面的許負相書不同，書內不分篇，各句多以“何以知人……”的問句形式開頭，記述如何根據人的形貌、氣色及

行為舉止判斷吉凶禍福，並分別總結歸納出女子、男子所具的好相，及相面時所應注意的事項。如：“何以知人為奴婢煞？正語，天中忽發赤色，直通下，度耳後，此人不出年中，為奴婢所煞。”下多類此。它的內容揉和其他相書的內容與方法，而特別突出了這些內容在實際中的運用。所記載的重點已不同于許負相書或 P.3390、P.3492 等直接記載某種形貌、氣色、黑痣等主何命祿，而在告訴讀者，如何運用這些知識，在實際中觀察物件，並加以判斷。尤其對行為、氣色等暫時存在的徵兆所代表的吉凶禍福比較重視。這些徵兆與形貌、聲音等特徵不同，它不能長期存在，而是處在不斷的變化中，準確把握這些特徵，並據以判斷吉凶，是相術中較難的部分，僅僅依賴普通相書的記載很難做到。這部相書所記載的，實際就是具體的相的方法與訣竅。根據這一特點，我們認為，將此卷列在許負系統相書中是不合適的，應當單獨列為一個相書系統。

三、敦煌寫本相書中的有關問題探討

敦煌寫本相書是敦煌雜占類文書中重要的一類，對於研究中古時期敦煌地區的民俗有重要的價值。許負系統相書是敦煌寫本相書中保存最多的一類，共有 5 個卷號，4 個小類。許負作為中國古代影響最大的相士之一，雖然歷代典籍中對他的相例記載不少，但對他本人的記載不多，以至連他的性別也沒弄清楚。《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漢書外戚傳》等都記載了許負為周亞夫、為文帝母薄太后看相的事，相傳為文帝寵臣鄧通看相的也是他。《史記索隱》引東漢應劭之語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楚漢春秋》記載漢高祖曾封許負為鳴雌亭侯。還有人從名字上考察，云“負者，婦也。”從這些記載來看，許負應當為女性。許負在後代有很大影響，人們常以其作為相士的代表人物，與先秦唐舉、唐代袁天綱等並稱，還有人直接稱相術為“袁許之術”。《懷慶府志》：載“負，河內溫人，善相人。負所著有《德器歌》、《五官雜論》、《聽聲相形》等篇。”後世的許多相書亦以許負相標榜，《宋史·藝文志》所錄的相書中，有許負《形神心鑒圖》、許負《相訣》等，皆佚。今存有明刻《許負相書十六篇》，《神相全編》亦收有許負聽聲，許負相德器，相耳、口、唇、舌、齒、手、足等多篇。我們現在看到的敦煌許負系統相書，其實也不是許負一人所撰，而是彙集了漢晉之際諸家相法的眾人之作，這其中肯定包含有傳自許負的相術相法心得，或許就是在許負所撰的基礎上發展而來。與傳世相書的記載相比，敦煌許負寫本相書為我們提供了唐前流傳的許負相書的原始材料，可以從此推知更早時期的相書面貌。由於許負為漢初許多著名人物看過相，影響非常大，可以推測他的相書中當有關帝王之相的內容，所以歷史時期這部相書一直被禁止，但是我們從敦煌寫本許負相書中根本看不到這方面的內容，最好的面相也只是三公和宰相的相貌。我們推測，敦煌寫本許負相書肯定經過重新編撰，是一部所謂新集本相面書，是經過加工的或者刪改的相面書，在新集的過程中只有將帝王之相部分刪除才能得以流傳，所以敦煌寫本相面書不是許負相書的原貌。就是敦煌寫本許負相書之間也由很大的差異，這些差異主要是內容多寡的問題，很可能就是經過不同人改編留下的不同版本。敦煌寫本許負相書每篇都很簡略，就是我們今天看來，它的原貌也不是這個樣子，靠這樣的相書根本無法進行操作，用這樣的相書去進行相面實踐肯定不行，肯定還有更為詳細的相面書存在，可惜我們直到目前還沒有看到這樣的相書。不過我們通過相氣色和相痣部分文書的內容，證實了這類相

面文書的存在。

敦煌寫本相面書是一種實用性很強的操作性占卜文書，有一定的方法，只要我們瞭解了古代敦煌人相面的方法，看似神秘的相面書就不再神秘了。根據我們的研究，研究敦煌寫本相面書首先要注意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探討敦煌寫本相書首先應當注意的問題是確定哪些部位是集中體現先天稟賦與命運信息的核心部位。許負相書的第二篇就提出來：“八尺之軀，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面，不如三寸之鼻；三寸之鼻，不如三寸之耳，三寸之耳，不如一寸之目。凡相人官、祿、田宅，視上部。謂額、眉、目、頰等是也。相壽命，看鼻、音、聲。相苦樂，看手足。此等皆須先全平博潤澤，大吉。相身及妻子兄弟字姊妹，視中部，謂陰中權勢是也。”相的核心部位從這段文字得知是在人的頭部，而關鍵部位是人的眼睛。從相書分篇數目看，許負相書一部共三十六篇，而頭部占 19 篇，因此敘述最為詳細的是頭部。人眼睛黑白分明有光澤大，龍睛鳳目，是富貴的相貌，眼睛像虎眼象眼，是做官的相貌。相反愛盜視和左顧右盼者是奸滑和下賤人。

第二、什麼樣的相貌是好的相貌。雖然相書中對人身體各個部位的相貌好的和差的都進行了詳細的描述，但以許負相書序的總結最為全面：“夫陽光潤澤，細以有殊，眉峻黑，眼目鮮明，陽中開闊，陰中太平，龍精鳳目，闕上毫生，面如滿月，方斷天亭，鼻筒懸膽，溝瀆深零，口上四字，斷（口𠵼）峰貞，齒白如玉，舌似花生，言語清朗，折挫龍鳴，耳博腦，輪廓環，奶闊尺二，宿幽清，手足紫色，甲像紅櫻，指尖無節，（口孫）血文成，五策入掌，龍虎鳳行。”總的來說，膚色有光澤，眉毛要黑，眼睛有光澤黑白分明，龍精鳳目，面如滿月一樣豐滿，口方正如四字，牙齒潔白，說話口齒清晰，指頭如玉無節，行走像龍虎鳳，耳輪成型，胸部寬闊。這裏所說的形體面貌主要是先天形成的長相，但是後天修養也對此有影響。所以序的形狀首句即云：“夫積善餘慶，則眾相自然，積惡顯揚，則表其深現。”人身體的相貌可以表露內心世界，人的行為會影響相貌，鼓勵人多做好事，待人要心地善良。

第三、強調相貌和行為之間的關係。如果嚴格按照相書的要求去苛求身體的部位相貌，確實有很多好的相貌也有很多不好的相貌，是不是好的相貌就一定得到好報應，不好的相貌就一定就會有有壞的徵兆。這樣相對每個行為物件的個人或者社會只能起到消極的作用，因為好的相貌很可能促發很多人的野心，不擇手段去實現這些相貌所揭示的徵兆，必然引起社會動盪；不好的相貌使人失去做好人的願望，安於命運安排，不求上進，容易引導他們走上邪路。這樣就與相面的宗旨相背離，所以相書的關鍵是如何處理行為與相貌的關係。我們知道，無論是好的相貌還是不好的相貌，並不是完全都能靈驗，都會實現。如何處理相貌與實際情況背離的問題，實際上就是我們經常說的變通。關於這個問題，相書提出行為準則，好的和壞的相貌是內心世界和行為的表現，好的相貌必須有好的行為作為依託。歷史典籍中記載到相師看到好的面相都要囑咐他們主要行為，使行為符合相貌的要求。從敦煌寫本相書內容看，每個人身上找到幾處好相並不很難，如果把這些好相實現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相書提出“凡相之法，看其所作。雖有好相，由（猶）須好行。若[行]不善，損相毀傷也。”作就是行為，光有好相沒有好的行為，只會損相。有了好相還實現不了原因何在，敦煌寫本相書又提出了數量實現法，如：“凡人面上一處有三公相者，止二千石；二處有三公相者，止刺史；三處有三公相，侍天子也；四處有三公相者，令侯相；五處有三公者，真三

公也。”這下就又將人限定死了，我們知道在身上找到一處三公相是比較容易的，如果要找到五處三公根本不可能，就是古代典籍中記載到官至三公者也沒有記載到身上有五處三公相。這樣就可以解釋既有好相又有好行但是沒有好的回報原因何在。同樣人如果有了不好的相貌，只要注重後天的修養，還是能夠改變不好面相對自己本身的影響，如走路姿態等都會改變的外相。

第四、敦煌寫本相書可以督促人加強自身的修養。我們只要仔細分析敦煌寫本相書，就會發現一個問題，相書三十六篇中提到的很多面相都是可以改變的，如眼神完全可以改變，盜視就是我們經常偷著看人，或者與人交談左顧右盼，都是不好做法；另外像口不合，餓死相；口未說舌先出，好說人；口似吹火老來孤獨等，我們能夠想像出來這樣的相貌是非常不好的相貌，這些相貌完全是能夠改變的相貌。人說話必須口齒清晰，如果聲音很大像打雷，就“男妨婦，女妨夫”，女性說話像男人，所謂“雄聲，女妨夫。”聲音散亂嘶鳴，少子短命；聲音像豺狼，賤和貪心。說話聲音很大不照顧別人，肯定不行，會引起別人的反感。行步，講究的是走路姿勢必須穩，所以將龍行、虎行、鵝行、小兒行作為高貴的行走姿勢，相應的雀行、鵠行都是下賤的行走姿勢，女性蛇行、蟹行妨夫的行走姿勢。這些不好的行走姿勢都是可以改變的，實際上相書起了督促人進行自身修養的作用。

第五、敦煌寫本相書是人們長期生活經驗的總結。敦煌寫本相書有其迷信的部分，也有來自生活經驗的總結。一是面相氣色是身體狀況的反映，P.3390 號在相氣色卷末稱“凡人面有本色忽變，本金色白忽赤色，則客色來。木色青忽白，客色來，水色黑忽黃客色也。火色赤，忽黑，客色也。土色黃忽青色客色至。此皆是五藏有疾，府有絕氣，不重病亡，即非意死。”“候病人法：病人腎病，成唇俱腫，脾白，戊己日死。肝病，皮肉白，脾白，庚辛日死。肺病，頰赤目腫，心赤，丙丁日死。脾病，唇青，肝色青，甲乙日死。心病，目黑、腎色黑，壬癸日死。凡人不病，面色蒼黑，遠視眉不分明，如鬼魂影及面帶幹脯色，及陷水花並死，馬肝色者，名為行屍，不出三年內必死。”面部出現客色實際上是人內臟疾病的反應，這與中醫學家診斷疾病的望診關係極密。二面部表情和外在行為是內心思想的體現。如眼神盜視及其眼神兇狠，為人奸滑兇狠，這是我們生活中經常固定的看待人的模式。“女子語音高大者，亦云早喪夫。”“何以知人方向貧？到坐漸漸退；……凡人坐不安席者，非唯損相，亦無年壽。”“何以知人始遭偷？共語，而舉眼視主人屋，不即答，必道遭偷。”女性語音高大，男性坐不安席，到人家看房門關好沒有，這都是人們所不欣賞的行為習慣，與人們的生活實際確實有一定關係，至於是否與早喪夫、損年壽等命運相關，則不得而知。

第六、敦煌寫本相面書是晚唐五代中國特別是中古時期敦煌地區居民審美觀的體現。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無論對男性或者對女性都有一定的審美要求，就是什麼樣的男性或者女性才符合美的標準。男性，從外表來說“男子好相者，手足厚軟，額面方正，好相也。手足多文理者，列富貴人也。舌方多文理者，封侯人也。額[方]長壽而貴也。眉去眼遠者，三高等貴也。發去眉遠，眼去口遠，口去頸[遠]者，此人公侯將相也。”女性外表要求“凡女人欲得細角（腳）步，肉身體欲得方直，面色欲得光白，眉目白黑分明，口小，舌方，耳色白於面，手足細長，頭髮細，此女宜夫利子，大富貴。”另外還有外在氣質的要求，以上 P.2572《相書一部》所列舉的各種相面方法，實際上就是根據人的氣質進行的將來吉凶福禍的判斷。外表是先天的，是無法改變的相貌，但是氣質是後天修養所致，是以人為主導通過修養可以達

到的美的標準，所以相面方法比較注重氣質的相法。敦煌寫本相面書對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的佛教藝術也有一定的影響。晚唐五代敦煌莫高窟供養人像我們看了以後有一個很深的影響，就是千人一面，雖然大家都指出了這種現象，但是沒有一個人找出其中的原因。晚唐五代敦煌地區是一個多民族居住區，有來自中亞南亞地區的粟特人、波斯人、印度人，也有來自于敦煌周邊地區的吐蕃、吐谷渾、南山、回鶻、于闐、龍家等居民，居民成分相當複雜，但是敦煌莫高窟中繪畫出來的供養人卻全是一模一樣，幾乎看不出什麼差別，這其中的原因就是當時人們審美觀的要求，將一個人按照相書的標準進行繪畫，突出他的優點，就像經過美容師的美容後拍出來的藝術照片一樣，人全是一個模樣。這實際上是相書對藝術所產生的影響。

敦煌寫本相書對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的審美觀產生了很深的影響。晚唐敦煌文士在描寫當時名人的時候都要描寫到外貌，這些人的外貌描寫中就使用了相書的觀點與術語。P4638《曹氏夫人宋氏邈真贊並序》：“夫人者，即前河西隴右一十一州節度使曹大王之夫人也。廣平鼎族，膺婺宿而誕質河湟；天假英姿，稟神沙而降臨蓮府。……冰清皎潔，桃李莫比其芳顏。玉貌爭鮮，松柏難奪其神志。眉偷初月，頰類紅蓮。秀麗越於西施，雅操過於南蜀。三從實備，能遵薑女之賢。四德皆通，豈亞秋胡之婦。” P3556《府君慶德邈真贊並序》記載“天資異貌，月角成姿。……間生異貌，月角成芳。” P3718《閻子悅生前寫真贊並序》、《梁幸德邈真贊並序》稱他們“異骨奇模”；《程政信和尚邈真贊並序》記載“瑞相天姿，儀貌如同盛月。”《張明德邈真贊並序》記載“星芒雄角，必膺物而生姿。” P2482《羅盈達邈真贊並序》記載：“日角仙姿，應世而與凡不同。”¹⁷從這些記載我們瞭解到相面理論在人物傳記文書中大量使用，人物外貌描寫非常注意與相學原則結合。同時我們還注意到敦煌人很注意骨相，但是關於骨相的文書我們一卷也沒有發現，就是說敦煌當時還流傳很多相書，我們看到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的相面風氣很濃，所以才會保存下來這樣多的相書。從嚴格的意義上說，相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東西，從淵源上看，與陰陽五行等方術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我們經過對這些敦煌寫本相書的分析，發現它們沒有粘貼在其他佛教文獻之上的情況，表明他們不是像社會經濟類文書是作為副產品進入敦煌藏經中的，是寺院專門保存的文獻。其次同類文獻抄本很多，特別是這些抄本寫作水平都不高，錯誤很多，反映了抄寫者的身份很可能就是一般寺學中的學士郎。我們知道官府學校教學中要專門教授陰陽易學等，晚唐五代敦煌的官府學校中專門設置有陰陽博士，負責教授學生的陰陽占卜之學，寺院學生必然要學這類東西，這些文書中的一些很可能就是為寺學學生學習用的或者寺學學生遺留的抄本。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高僧很多儒家、道家文化造詣很深，三教皆通，¹⁸所以擁有陰陽之書具備陰陽之術不是什麼稀奇之事。

正是晚唐五代歸義軍時期敦煌的這種社會風氣，致使有這樣多的人學習瞭解相術與相書，因而無意中為我們保留下來這些唐代相術的珍貴資料。

【注】

《左傳·文西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谷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見《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 1980 年影印本。

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中華書局，1957 年。

松本榮一《敦煌畫之研究》，同朋社，1937年，第797-798頁。圖版參《敦煌畫之研究附圖》第199幅觀相卷。

侯錦郎《敦煌寫本中的唐代相書》，耿昇《法國學者敦煌學論文選萃》，中華書局，1993年。第350-366頁。

黃正建《敦煌文書中的〈相書〉殘卷與唐代的相面》，《敦煌學輯刊》1988年第1、2期，第114-118頁。

高國藩《敦煌民俗學》，上海藝文出版社，1989年。《敦煌俗文化學》，上海三聯書店，1999年。《敦煌古俗與民俗流變》，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敦煌民俗資料導論》，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唐代敦煌的看相與算命》，《歷史月刊》1990年第4期，第10-28頁。

菅原信海《占筮書相書》，池田溫《敦煌漢文文獻》(《講座敦煌》)，大東出版社，1992年。第455-456頁。

陳興仁《神秘的相術》，廣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6頁。

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52頁。

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第17頁。

¹¹兩部相書中間夾抄有五行之名、曆日及習字雜寫等內容八行，這些內容均與上題《相書一部》的相書及後面無題相書的內容無關，故此不論。

¹²其內容見 P2572 (B)《相法》。

¹³黃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第三章《敦煌占卜文書的類型及其與傳世典籍的比較(中)》，P59。學苑出版社2001年版。

¹⁴鄧文寬《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37頁。

¹⁵ ¹⁵黃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第三章《敦煌占卜文書的類型及其與傳世典籍的比較(中)》，P60。

¹⁶《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中華書局，1983年)對卷中子目的識讀有誤，“九州”當為“相”，作“相色發麵圖看吉凶厄法”。商務印書館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

¹⁷參鄭炳林《敦煌碑銘贊輯釋》，甘肅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25-226、392-393、424-425、450-451、447-448、459-460、485-486頁。

¹⁸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團闡揚三教大法師與敦煌佛教的相容性形成》，《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甘肅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1-321頁。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1—3 卷) 介紹

誠遜 (首都师范大学)

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郝春文承擔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最終成果《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1—3 卷, 105.4 萬字) 已經出版, 其中第 1 卷由科學出版社於 2001 年出版, 第 2、3 卷由社科文獻出版社於 2003 年出版。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的主要內容按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流水號依次對每件敦煌漢文社會歷史文獻進行釋錄, 將數百年前的或一千多年的手寫文字釋錄成通行的繁體字, 並對原件的錯誤加以校理, 盡可能地解決所涉及文書的定性、定名、定年等問題, 每件文書釋文後附有校記和 90 年來學術界有關該文書的研究文獻索引。每件文書一般包括文書的標題, 文書的釋文, 說明, 校記和參考文獻等幾個部分。此書預計共 30 卷, 現在完成的 1 至 3 卷包括斯 1 號至斯 746 號間的 400 餘件社會歷史文獻 (105.4 萬字)。

以往出版的整理敦煌社會歷史文獻的書籍, 均為分類釋錄本。這些成果雖為學術界瞭解、利用敦煌文獻提供了方便, 但也存在著明顯的局限。其一, 由於敦煌文獻的內容複雜, 不少文書目前難以進行分類和歸類, 所以, 分類錄校本不能反映敦煌文獻的全貌。其二, 由於多數分類錄校本的作者是依據目錄調查某一類文獻, 而現在有關敦煌文獻的各種目錄又極不完備, 因而這些分類錄校本很難收集齊全其所要搜集的文書。其三, 分類錄校容易忽略各類文書之間、各個專題之間的聯繫。不利於開展對敦煌文獻進行綜合的、宏觀的研究。由於本書是按各收藏單位的館藏流水號依次整理、錄校, 所以, 最終能夠收錄全部敦煌社會歷史文獻, 這就有效地避免了分類錄校存在的種種不足。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不僅為敦煌學研究者提供了經過整理的研究資料, 也為社會科學的諸多學科和自然科學的一些學科的研究者利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掃除了文字上的障礙, 每件文書後所附的說明和研究信息還可直接將讀者領到該文書的學術前沿。這對於充分發揮其文獻作用, 提高其利用價值, 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另一方面,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還可為以後全面開展《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釋錄工作摸索經驗, 提供範例。在《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全部完成以後,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作為其中的一部分, 還將為人們對敦煌文獻進行綜合研究和宏觀研究提供必要的條件。所以,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1-3 卷是全面整理敦煌社會歷史文獻的開端, 我們希望作者在此基礎上繼續努力, 爭取早日完成《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全書乃至全部敦煌社會歷史文獻的整理和編纂工作。

《敦煌石窟全集》即將全部問世

張先堂 (敦煌研究院)

經過近五、六年來敦煌研究院 20 余位專家的辛勤研究、撰著與香港商務印書館的精心設計、印製，一部集敦煌石窟研究之大成的共計 25 卷的大型專題叢書《敦煌石窟全集》即將全部問世。該叢書的出版是敦煌研究院幾代學者數十年研究成果的全面總結和集中展示，也是迄今為止對於敦煌石窟最為全面系統的研究和介紹。

敦煌研究院是中國政府專設的從事敦煌石窟保護、管理和研究的學術機構，其前身為成立於 1944 年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中經 20 世紀 50 年代至 80 年代初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至今已走過 60 年的發展歷程。經過以常書鴻、段文傑、樊錦詩為代表的二、三代學者在大漠戈壁的艱苦環境中的長期奮鬥，在敦煌石窟考古、石窟藝術研究領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敦煌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使該院成為國際敦煌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基地。

為了總結敦煌石窟考古、石窟藝術研究的成果，早在 1993 年—1998 年，敦煌研究院與江蘇美術出版社合作出版了《敦煌石窟藝術》叢書。敦煌研究院組織 10 余位學者參與撰著，5 年間該叢書共出版了 22 卷。該叢書以洞窟為單位，精選敦煌石窟中從北朝到元代各個時代有代表性的 30 多個經典洞窟入書，每卷均前有 3~5 萬字的比較深入的研究論文，後有 120~150 幅精美的壁畫、彩塑圖版，改變了以往敦煌石窟藝術出版物多為圖錄展示、缺少研究論述的缺憾，成為第一部大型的圖文結合的敦煌石窟藝術研究叢書。

為了進一步推動敦煌石窟研究的深入發展，全面系統地揭示敦煌石窟的豐富內涵和珍貴價值，從 1997 年起，敦煌研究院又與香港商務印書館合作編著出版《敦煌石窟全集》。全集的編著出版工作得到了國家文物局的關注和重視，聘請全國著名的編輯出版家、考古學家、歷史學家、美術家擔任顧問，組成了出版委員會。香港商務印書館為了使全集的出版達到國際水平，不惜投入巨額資金和大量人力，精緻設計，精心製作。敦煌研究院為了保證全集的權威性和科學性，組成了以著名敦煌學專家段文傑、樊錦詩為首的編著委員會，組織了 20 余位專家參與撰著。該叢書經過敦煌研究院專家的認真研究，周到設計，全套叢書除總卷外，根據敦煌石窟的內容分為佛教、藝術、社會三大類，佛教類中有《塑像卷》、《尊像畫卷》、《本生因緣故事畫卷》、《佛傳故事畫卷》、《阿彌陀經畫卷》(附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彌勒經畫卷》(附藥師經)、《法華經畫卷》(附涅槃經、維摩詰經)、《報恩經畫卷》(附牢度叉鬥聖變、福田經變、父母恩重經變、目連變相、寶雨經變、戒律變、梵網經變)、《密教諸經畫卷》、《楞伽經畫卷》(附密嚴經、金剛經、天請問經、思益梵天所問經)、《佛教東傳故事畫卷》等 11 個專題，藝術類中有《圖案畫卷》(上、下)、《飛天畫卷》、《音樂畫卷》、《舞蹈畫卷》、《山水畫卷》、《動物畫卷》、《建築畫卷》、《石窟建築卷》等 9 個專題，社會類中有《科學技術畫卷》、《服飾畫卷》、《民俗畫卷》、《交通畫卷》等 4 個專題，相當全面地涵蓋了敦煌石窟的主要內容。該叢書每卷包含有 6~8 萬文字、180~250 幅圖片，而且改變了以往敦煌石窟出版物多文圖分離的狀況，精心組織文圖，使圖隨文行，文以圖顯，真正作到圖文並茂、渾然一體。

經過敦煌研究院和香港商務印書館五、六年來的精心合作，《敦煌石窟全集》目前已經出版 18 卷，預計 2004 年內將出齊全部 25 卷。全集全部問世後，將成為國內外第一部專題形式的全面系統介紹敦煌石窟的大型圖書，將為敦煌石窟考古全集的編著出版打下基礎，對於敦煌學的深入發展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敦煌文獻合集》經部介紹

張涌泉 (浙江大學)

《敦煌文獻合集》是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浙江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正在實施中的敦煌文獻整理出版工程。該工程擬分兩步進行：第一步將把除翻譯佛經以外的所有漢文敦煌文獻彙為一編；第二步再整理翻譯佛經部分。估計全書總字數將達八千萬左右。本項目為教育部高校古委會重大項目，並被列為國家“十五”出版規劃和國家“十五”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大專案。

《敦煌文獻合集》(漢文翻譯佛經以外部分)按傳統的四部分類法整理編排，全部完成後估計總字數將達二千萬左右。整理工作包括定名、解題、錄文、校勘等項。目的是為學術界提供一部校錄精確、查閱方便的敦煌文獻的排印本。《敦煌文獻合集·經部》由張涌泉主編，張涌泉、許建平、關長龍輯校。約 350 萬字。包括敦煌群經、字書音義書、韻書三大部分。敦煌群經寫卷包括《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九種，共計 347 號寫卷。字書包括《字寶》、《字樣》、《正名要錄》、《俗務要名林》、《千字文》、《開蒙要訓》等，音義書包括《毛詩音》、《禮記音》、《楚辭音》、《文選音》、《莊子集音》、《莊子音義》、玄應《音義》、可洪《藏經音義隨函錄》等，計 200 多號寫卷。敦煌韻書包括陸法言《切韻》的傳寫本、箋注本《切韻》、增訓加字本《切韻》、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唐韻》殘本、五代本韻書等 46 號寫卷。這些寫卷不少是世無傳本的古佚書，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有些雖然尚有刻本傳存於世，但均為五代以前寫本，其中絕大多數為唐寫本，具有很高的版本校勘價值。這些寫卷分散在中、英、法、俄等國家的幾十個圖書館、博物館中，讀者使用不便，而學術界迄今為止對它們的整理研究還很不充分。本書將全部敦煌經部文獻彙為一編，在分類整理的基礎上，充分吸收海內外學術界近一百年來的研究成果，對這些寫卷進行了詳盡的校錄、考訂，堪稱敦煌經部文獻整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將為學術界提供可以直接利用的敦煌群經寫卷的校勘定本，對經學研究和語言文字學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敦煌文獻合集·經部》將於 2004 年底由中華書局出版。

《俄藏敦煌藝術品》第 6 冊介紹 府憲展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以來，上海古籍出版社發願搜集、編纂、出版以俄羅斯 (蘇聯)、法國和國內中小特藏為主體的《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以及《俄藏黑水城文獻》、《俄藏敦煌藝術品》等相關項目，至今已經蔚為大觀。總共出版了將近 75 冊，發表了文獻、文物圖版約 26000 餘件，圖版 50000 餘幅。其中，屬於 1914-1915 年奧登堡中亞考察隊的有《俄藏敦煌文獻》1—17 冊 (全)，《俄藏敦煌藝術品》1-5 冊。《俄藏敦煌藝術品》1—2 冊為敦煌雕塑、壁畫、絹畫、麻布畫等圖錄，3—4 冊為洞窟內外景照片，第 5 冊為莫高窟測繪圖、壁畫臨摹圖、影描圖等。

目前仍在編輯的《俄藏敦煌藝術品》第 6 冊，是奧登堡考察隊在莫高窟的臨摹速寫、壁畫榜題、洞窟筆記，以及旅途照片、旅行日記等，將在 2004 年完成。

大英博物館和法國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先後和日本講談社合作，出版了斯坦因、伯希和在敦煌所獲的全部文物圖錄，這就是著名的《西域美術》。由於斯坦因和伯希和收藏品，從獲取不久以後就陸續以各種形式出版，所以，《西域美術》主要出版了藝術品的圖錄，在序言和所附文章中介紹了一些考古情況，但沒有同時出版相關的考古資料；而奧登堡材料的境遇完全不同，由於奧登堡回國是迫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此後又經歷了十月革命前後的長期動盪，直到 30 年代才有比較認真的整理研究。所以，奧登堡考古材料沒有機會整理和發表，甚至在漫長的時間段裏，連整個考察隊的活動都湮沒無聞，鮮為人知。所以，除了採用《西域美術》的模式發表美術品的圖錄以外，完整發佈奧登堡考察隊的所有資料，全面揭示這支考察隊的全部活動，對於國際學術界瞭解俄羅斯考察隊的情況、瞭解敦煌學的歷史，都是至關重要的。《俄藏敦煌藝術品》的編輯思想，也因此凸現了和《西域美術》不同的特點。

關於奧登堡考察隊的考古資料，在《俄藏敦煌藝術品》第一冊孟列夫、府憲展等的序言中，已經有關於全部資料的鳥瞰性的介紹；在第三冊，有樊錦詩院長、蔡偉堂先生關於 2000 幅洞窟照片的專題介紹；第五冊，有樊錦詩的序言的和蔡偉堂的校訂說明，對窟區測繪圖、臨摹圖、影描圖的專題介紹。這些介紹出於敦煌研究院的專業科研工作者，因而得以把奧登堡的考古資料和窟區現狀、文物現狀進行了詳細了對比性研究，充分揭示這些材料的科學價值。

即將繼續發表的主要材料可以分為兩個部分，按照中國的習慣說法可以是：

內編——在莫高窟的記錄：包括壁畫圖案速寫、壁畫榜題摘錄、杜金日記、奧登堡洞窟敘錄；

外編——旅途的記錄：包括旅途日程、杜金旅行日記和速寫、旅途照片等。

最後的附錄——應當說是具有獨立意義而不是附屬意義的——一項重大的工作，就是對比所有洞窟編號、包括奧登堡的編號和測繪圖記錄，以莫高窟實際存在為基礎的最新《莫高窟各家洞窟編號對照表》。僅此一項就是可以大書特書的重要學術成果。

奧登堡考察隊資料，由於奧登堡本人和考察隊的參加人員未能親自參加後期的案頭整理工作，規模龐大的資料卷宗仍然使後人感到情況複雜，撲朔迷離。其整體概貌和整理情況，如同奧登堡院士的遺孀葉列娜·格裏戈裏耶夫娜·奧登堡 1938 年 11 月在整理“千佛洞筆記”時寫到的：

“1914—1915 年俄國新疆考察隊的材料由以下部分組成：

奧登堡院士和其他考察隊成員的旅行日記---2 本筆記簿。

千佛洞洞窟的完整記錄，附有奧登堡關於某一時代特有風格的不長的概述（最終未完成）---7 本筆記簿。

千佛洞彩畫的寫生和略圖。

杜金對敦煌壁畫作的筆記。

考察隊的照片（底片和相片）。

考察隊所作的平面圖和略圖。

雕刻、繪畫和實用藝術品等文物，超過 250 件。

這些材料現存於列寧格勒：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蘇聯科學院檔案館、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和Е·Г·奧登堡處。

1938 年根據我的請求，科學院主席團撥款對 1914---1915 年考察中奧登堡院士的筆記進行判讀和重抄。

謝爾巴茨基Ф·И·Ще р б а т с к о й 院士對此工作擔負監督之責；

克勞斯О·А·К р а у ш 承擔這些材料的判讀和用打字機重抄的工作。

按照原尺寸複製原文中的草圖、平面圖、素描的工作由М·С·哈爾圖林完成。”

奧登堡對洞窟的記錄，於 1938 年在其遺孀И·Г·奧登堡的主持下，整理列印和複繪，總數達到 1240 多頁。

莫高窟測繪圖是最為重要的成果。考察隊逐窟進行了詳細的測繪，最後全部單個的洞窟圖被分別拼合成總平面圖和總立面圖，保存了 1914 年時莫高窟的自然地理的（包括沙丘和懸崖的紋理走勢）和人文的（如洞窟前的建築和匾額文字等）材料，是迄今為止關於莫高窟的最詳細精密的測繪成果。由於此後 80 多年中莫高窟繼續受到損毀的破壞性原因，以及加固、改造的建設性原因，整體外觀已經有了極大的變化；所以這項測繪成果本身、以及對古代莫高窟原貌的追溯價值都是空前絕後的。

考察隊拍攝了洞窟外景和內景的大量照片，一共有 2000 多幅（實際清點和出版 1000 餘幅）；內容包括許多洞窟的周邊環境、前室塌毀後裸露的壁畫、窟前建築、洞窟內景和壁畫雕塑的細部等。

對於洞窟內部的壁畫，則主要是由斯米爾諾夫繪製了 260 餘幅影描圖、120 餘幅彩色臨摹圖。還有杜金作了少量油畫速寫。抄寫了許多壁畫題記。考察隊還在沿途拍攝了大約總共 500 張照片。

所有圖版和記錄的全文，都將在《俄藏敦煌藝術品》第五冊、第六冊中發表。就象孟列夫教授在序言中說的：“所有這些資料正收入本出版物中（寫卷已單獨發表于《俄藏敦煌文獻》專集中），並且完整地加以公佈，不刪簡”。

2002 年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

1 陳麗萍 2 江海雲

(1 首都師範大學 歷史系, 北京 100089

2 蘭州大學 敦煌學研究所, 甘肅 蘭州 730020)

在 2001 年所做敦煌學研究論著索引的基礎上, 我們對 2002 年與敦煌學相關的論著也進行了搜集整理。據不完全統計, 2002 年中國大陸計出版的敦煌學相關專著 50 餘部, 發表論文 400 多篇¹, 研究成果在數量上略多於去年²。本目錄分為專著與論文兩個部分。其中論文部分又分為概說、歷史地理、古籍、社會、少數民族歷史與語言、考古與文物保護、藝術、語言文字、文學、宗教、科技、學術動態與紀念文、新書評介、其他等 14 個專題。

一、專著

劉進寶《敦煌學通論》, 甘肅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9 月。

李偉國《敦煌話語》,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5 月。

姜亮夫《姜亮夫全集》(1-24 集), 雲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9 月。

陸慶夫、王冀青、郭鋒《中外敦煌學家評傳》, 甘肅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

王素《敦煌吐魯番文獻》, 文物出版社, 2002 年 4 月。

蔣季成《莫高窟: 敦煌國寶劫難記》, 中國社會出版社, 2002 年 9 月。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14 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7 月。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15 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7 月。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16 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7 月。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17 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7 月。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18 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7 月。

榮新江《敦煌學新論》, 甘肅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9 月。

楊寶玉《敦煌滄桑》, 長江文藝出版社, 2002 年 3 月。

閻國權《敦煌二千一百年》, 新華出版社, 2002 年 1 月再版。

陳國燦《敦煌學史事新證》, 甘肅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9 月。

胡戟、張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編《二十世紀唐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2 年 1 月。

郭鋒《唐史與敦煌文獻論稿》,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

吳麗娛《唐禮摭遺——中古書儀研究》, 商務印書館, 2002 年 11 月。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 甘肅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

孫修身《敦煌與中西交通研究》, 甘肅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9 月。

贊丹卓尕主編《裕固族研究論文續集》(上、下), 蘭州大學出版社, 2002 年 7 月。

鄧浩、楊富學《西域敦煌回鶻文獻語言研究》, 甘肅文化出版社, 2002 年 6 月再版。

羅秉芬《敦煌本吐蕃醫學文獻精要: 譯注及研究文集》,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

尕藏才旦編著《吐蕃文明面面觀》, 甘肅民族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

夏鼐《敦煌考古漫記》, 百花文藝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

馮建華主編《河西簡牘》, 重慶出版社, 2002 年 9 月。

陳直《敦煌漢簡釋文評議》, 浙江文藝出版社, 2002 年 6 月。

刁兆彥主編《典藏中國——敦煌: 大漠間神奇的絲綢之路遺迹》, 中國旅遊出版社, 2002 年 10 月。

史葦湘《敦煌歷史與莫高窟藝術研究》, 甘肅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

- 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
- 金維諾《中國古代佛雕 佛教造像樣式與風格》，文物出版社，2002年5月。
- 盧秀文《中國石窟圖文志》，敦煌文藝出版社，2002年9月。
- 成文正主編《敦煌壁畫》，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
- 王惠民主編《敦煌石窟全集卷》《彌勒經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年9月。
- 《敦煌壁畫·觀世音菩薩：初唐莫高窟第57窟南壁》，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年6月。
- 鄭汝中、台建群主編《敦煌石窟全集》15《飛天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年9月。
- 《敦煌壁畫·水墨山水：榆林窟第3窟西壁》，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年3月。
- 鄭汝中《敦煌壁畫樂舞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
- 鄭汝中主編《敦煌石窟全集》16《音樂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年9月。
- 張東苗、金衛東《敦煌壁畫線描圖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 黃征主編《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年10月。
- 《俄藏敦煌藝術品（俄羅斯國立艾爾米塔什博物館）》（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 《敦煌古代體育畫冊》，香港商務印書館，2002年6月。
- 黃征、江吟主編《敦煌書法精品（一）》，西泠印社，2002年1月。
- 楊東苗、金衛東編著《再現敦煌：大型敦煌壁畫復原精品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1月。
- 張小琴、成文正編繪《張小琴、成文正敦煌壁畫臨本選集》，人民美術出版社，2002年4月。
- 高金榮《敦煌舞教程》，上海音樂出版社，2002年12月。
- 汪曉軍《敦煌童話》，甘肅少年兒童出版社，2002年5月。
- 黃征《敦煌語言文字學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
- 陳秀蘭《敦煌變文辭彙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9月。
- 張鴻勳《敦煌俗文學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
- 汪泛舟《敦煌石窟僧詩校釋》，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2002年6月。
- 李小榮《變文講唱與華梵宗教藝術》，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6月。
- 楊曾文校寫《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壇經》，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年6月。
- 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中華書局，2002年11月。
- 鄧文寬《敦煌吐魯番天文曆法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9月。
- 趙長安《敦煌菜典》，中國社會出版社，2002年8月。
- 趙長安《敦煌烹飪》，中國社會出版社，2002年8月。

二、論文

1、概說

- 李並成《新世紀敦煌學發展的若干斷想》，《敦煌研究》2002年1期。
- 楊富學《西域敦煌回鶻佛教文獻研究百年回顧》，《宗教》2002年2期。
- 楊富學《20世紀國內敦煌吐蕃歷史文化研究述要》，《中國藏學》2002年3期。
- 陳明娥《二十世紀的敦煌變文語言研究》，《敦煌學輯刊》2002年1期。
- 高千《隴上敦煌學的回顧和思考》，《敦煌研究》2002年1期。
- 陳友冰《臺灣五十年來敦煌學研究歷程及其特徵》，《中國文化研究》春之卷。
- 陳海濤《法國的敦煌學研究》，《法國研究》2002年1期。
- 耿升《法國漢學界對絲綢之路的研究》，《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2002年2期。
- [美]Aida-Yuen Wong《Dunhuangology and the Kyoto School Oriental Studies》，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與

- 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王冀青《高楠順次郎與敦煌佛典——牛津大學藏斯坦因與高楠順次郎往來通信研究》，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王冀青《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藏斯坦因與失吹慶輝往來通信調查報告》，《敦煌學輯刊》2002 年 2 期。榮新江《再論敦煌藏經洞的寶藏——三界寺與藏經洞》，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文正義《敦煌藏經洞封閉原因初探》，《戒幢佛學》第 2 卷，岳麓書社，2002 年 12 月。
- [日]上山大俊《敦煌遺書的吐蕃特色與藏經洞封閉之謎》，《戒幢佛學》第 2 卷，岳麓書社，2002 年 12 月。
- 鄭惠珍《敦煌古籍流失及其整理的研究》，《茂名學院學報》2002 年 2 期。
- 姜洪源《劫余敦煌文獻運京的前前後後》，《檔案》2002 年 6 期。
- 曾雪梅《甘肅省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的來源及特點》，《檔案》2002 年 6 期。
- 王鏢《隴右文獻的內容與研究狀況》，《西北師範大學學報》2002 年 3 期。
- 鄧明《關於〈甘藏敦煌文獻知多少?〉的一點補充》，《檔案》2002 年 2 期。
- 陳國燦《略論吐魯番出土的敦煌文書》，《西域研究》2002 年 3 期。
- 余欣《浙敦 065 文書偽卷考——兼論敦煌文獻的辨偽問題》，《敦煌研究》2002 年 3 期。
- 勝義《〈俄藏敦煌文獻〉第十二冊校讀記(上)》，《戒幢佛學》第 2 卷，岳麓書社，2002 年 12 月。
- 應武燕《〈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校錄匡補》，黃征主編《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 趙書城、蒙應傑、馬建國、陸為國《敦煌學 Web 資料庫的設計與實現》，《電腦應用研究》2002 年 1 期。
- [日]石井公成《敦煌發現之地論宗諸文獻與電腦自動異本處理》，《戒幢佛學》第 2 卷，岳麓書社，2002 年 12 月。

2、歷史地理

- 馮培紅《歲稔民安——歸義軍保唐西境》，《甘肅文史》2002 年 1 期。
- 鄧文寬《張懷深平定甘州回鶻史事鈎沈》，贊丹卓尕主編《裕固族研究論文續集》(上)，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李錦繡《俄藏 ИЛ.3555 號唐〈格式律令事類祠部〉殘卷釋考》，《文史》第 3 輯。
- 楚永橋《〈燕玉賦〉與唐代司法制度》，《文學遺產》2002 年 4 期；又載《敦煌研究》2002 年 6 期。
- 王斐弘《敦煌寫本〈文明判集殘卷〉研究》，《敦煌研究》2002 年 3 期。
- 李炳泉《西漢西域渠犁屯田考論》，《西域研究》2002 年 1 期。
- 李寶通《敦煌索勒樓蘭屯田時限探蹟》，《敦煌研究》2002 年 1 期。
- 張萍《敦煌西魏文書殘卷研究》，《西南民族學院學報》2002 年 5 期。
- 陳國燦《莫高窟北 47 窟新出〈唐開元廿四年(736)後丁租牒〉的復原與研究》，《敦煌研究》2002 年 2 期。
- 劉進寶《歸義軍土地制度初探》，《西北史研究》第 2 輯，甘肅文化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 劉進寶《歸義軍政權稅柴徵收試探》，《西北史研究》第 2 輯，甘肅文化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 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等價物》，《中國史研究》2002 年 3 期。
- 乜小紅《試論唐五代宋初敦煌畜牧區域的分佈》，《敦煌研究》2002 年 2 期。
- 李並成《明清時期河西地區“水案”史料的梳理研究》，《西北師範大學學報》2002 年 6 期。
- 顏延亮《有關張球生平及其著作的一件新見文獻——〈佛說摩利支天菩薩陀羅尼經〉序〉校錄及其他》，《敦煌研究》2002 年 5 期。
- 徐曉麗《回鶻天公主與佛教》，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徐曉麗《敦煌石窟所見天公主考辯》，《敦煌學輯刊》2002 年 2 期。
- 吳麗娛《試論晚唐五代的客將、客司與客省》，《中國史研究》2002 年 4 期。
- 吳麗娛《再析 P.2945 書儀的年代與曹氏歸義軍通使中原》，《敦煌研究》2002 年 3 期。
- 馮培紅、姚桂蘭《歸義軍時期敦煌與周邊地區之間的僧使交往》，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趙貞《大中二年（848）沙州譴使中原路線蠡測》，《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2 年 3 期。
- 李樹輝《Sar（R 倒写）U Uj（R 倒写）U ur 考源——兼論龜茲回鶻與沙州曹氏歸義軍政權的關係》，贊丹卓尕主編《裕固族研究論文續集》（上），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歸義軍行政區劃制度研究（之一）》，《敦煌研究》2002 年 2 期。
- 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歸義軍行政區劃制度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02 年 3 期。
- 李並成《漢唐冥水（籍端水）冥澤及其變遷考》，《西北史研究》第 2 輯，甘肅文化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 李並成《河西走廊漢唐古綠洲沙漠化的調查研究》，《西北史研究》第 2 輯，甘肅文化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 李並成《歷史上祁連山區森林的破壞與變遷考》，《西北史研究》第 2 輯，甘肅文化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 胡同慶《論古代敦煌環保意識基礎及其與現代大西北可持續發展之關係》，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3、古籍

- 許建平《北敦 14681 號〈尚書〉殘卷的抄寫時代及其版本來源——與王煦華先生商榷》，《敦煌學輯刊》2002 年 2 期。
- 啓功《試論〈鄭注論語〉一則的牽強附會》，《文藝研究》2002 年 6 期。
- 王鏊《鄭玄〈禮記注〉的學術特點及其版本》，《圖書與情報》2002 年 3 期。
- 張娜麗《敦煌研究院藏李翰〈蒙求〉試解——與日藏古抄本之比較》，《敦煌研究》2002 年 5 期。
- 張娜麗《〈敦煌本〈六字千文〉初探〉析疑（續）——兼述〈千字文〉注本問題》，《敦煌研究》2002 年 1 期。
- 張娜麗《敦煌本〈注千字文〉注釋》，《敦煌學輯刊》2002 年 1 期。
- 鄭炳林、徐曉麗《俄藏敦煌文獻〈新集文字九經抄〉寫本綴合與研究》，《蘭州大學學報》2002 年 1 期。

4、社會

- 宋曉梅《高昌張氏家族的敦煌源流》，《尋根》2002 年 4 期。
- 鄭顯文《唐代家庭財產繼承制度初探》，《中國文化研究》2002 年 3 期。
- 邢鐵《唐代家產繼承方式述略》，《河北師範大學學報》2002 年 3 期；又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2002 年 5 期。
- 楊慧玲《敦煌契約文書中的保人、口承人、同便人、同取人》，《敦煌研究》2002 年 6 期。
- 張豔雲《從敦煌的婚書程式看唐代許婚制度》，《敦煌研究》2002 年 6 期。
- 高啓安《唐五代敦煌的“飲食胡風”》，《民族研究》2002 年 3 期。
- 高啓安《敦煌文獻中的“草子”為“沙米”考》，《敦煌學輯刊》2002 年 2 期。
- 盛會蓮《唐五代百姓房舍的分配及相關問題之試析》，《敦煌研究》2002 年 6 期。
- 李金梅《對敦煌氣功養生文化的研究》，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侯全福《敦煌〈養生訣〉導讀》，《養生月刊》2002 年 2 期。

- 李金梅、李重申《敦煌文獻與體育史研究之關係》，《敦煌研究》2002 年 2 期。
- 李重申、李金梅、李小惠、李小唐《敦煌莫高石窟與角抵》，《體育文化導刊》2002 年 1 期。
- 王超《敦煌壁畫中的古代武術》，《中學歷史教學參考》2002 年 4 期。
- 段小強、陳康《從敦煌〈杖前飛〉談唐代馬球運動》，《敦煌研究》2002 年 6 期。
- 孟憲實《論唐宋時期敦煌民間結社的組織形態》，《敦煌研究》2002 年 1 期；又載《魏晉南北朝隋唐史》2002 年 4 期。
- 魏啓鵬《〈敦煌懸泉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校箋》，《簡帛研究》第 5 輯。
- 黃正建《關於〈俄藏敦煌文獻〉11 至 17 冊中占卜文書的綴合與定名等問題》，《敦煌研究》2002 年 2 期。
- 陳于柱、魏萬斗《唐宋陰陽宅宗初探——以敦煌寫本宅經為考察》，《敦煌學輯刊》2002 年 2 期。
- 王愛和《摩醯首羅荀性質初步分析》，鄭炳林主編《敦煌佛藝藝術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杜琪《書儀緣起蠡測及敦煌書儀概說》，《社科縱橫》2002 年 6 期。
- 宮雲維《司馬光〈書儀〉版本考略》，《浙江工業大學學報》2002 年 6 期。
- 吳麗娛《再論複書與別紙》，《燕京學報》第 13 期。
- 吳麗娛《關於〈朋友書儀〉的再考察》，《魏晉南北朝隋唐史》2002 年 1 期。

5、少數民族歷史與語言

- 楊富學《9—12 世紀的沙州回鶻文化》，贊丹卓尕主編《裕固族研究論文續集》(下)，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勞心《從敦煌文獻看 9 世紀後的西州——兼論吐魯番出土回鶻文木柁文書年代和沙州回鶻的興衰》，《敦煌研究》2002 年 1 期。
- 榮新江《甘州回鶻成立史論》，贊丹卓尕主編《裕固族研究論文續集》(上)，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楊富學《沙州回鶻及其政權組織》，贊丹卓尕主編《裕固族研究論文續集》(上)，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李正宇《悄然湮沒的王國——沙州回鶻國》，贊丹卓尕主編《裕固族研究論文續集》(上)，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楊富學《敦煌回鶻文佛教文獻及其價值》，《戒幢佛學》第 2 卷，岳麓書社，2002 年 12 月。
- 牛汝極《回鶻藏傳佛教文獻》，《中國藏學》2002 年 2 期。
- 牛汝極《敦煌吐魯番回鶻佛教文獻與回鶻語大藏經》，《西域研究》2002 年 2 期。
- 楊富學《西域敦煌回鶻文獻語言研究》，《甘肅文化》2002 年 6 期。
- 劉戈《回鶻文契約中“bil”與漢文契約中的“知”現象考》，《民族研究》2002 年 5 期。
- 劉戈《回鶻文契約文書中 bitidim 的寫法》，周偉洲主編《西北民族論叢（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 牛汝極《敦煌榆林千佛洞 12 窟回鶻文題記》，《新疆大學學報》2002 年 1 期。
- 牛汝極《莫高窟北區發現的敘利亞文景教——回鶻文佛教雙語寫本再研究》，《敦煌研究》2002 年 2 期。
- 張鐵山《北京大學圖書館館藏敦煌本回鶻文〈雜阿含經〉殘葉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2 年 4 期。
- 張鐵山《敦煌莫高窟北區 B52 窟出土回鶻文——〈阿毗達磨俱舍論實義疏〉殘葉研究》，《敦煌學輯刊》2002 年 1 期。
- [日]沖本克己《敦煌發現的藏文禪宗文獻及所遺課題》，《戒幢佛學》第 2 卷，岳麓書社，2002 年 12 月。
- 黃維中《敦煌市檔案局所藏藏文寫經定名》，《敦煌學輯刊》2002 年 2 期。

- 羅秉芬《敦煌本吐蕃醫學文獻〈長卷〉譯注》(上),《中國藏學》2002年2期。
- 羅秉芬《敦煌本吐蕃醫學文獻〈長卷〉譯注》(下),《中國藏學》2002年3期。
- 孫林《盟誓文誥:吐蕃時期一種特殊的歷史文書》,《中國藏學》2002年2期。
- 尕藏加《敦煌吐蕃藏文文獻在藏學研究中的史料價值初探》,《中國藏學》2002年4期。
- 尕藏加《敦煌吐蕃藏文文獻在藏學研究中的資料價值》,《戒幢佛學》第2卷,岳麓書社,2002年12月。
- 王堯《從敦煌文獻看吐蕃文化》,黃征主編《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年10月。
- 金澄坤《吐蕃瓜州節度使初探》,《敦煌研究》2002年2期。
- 孫林、張月芬《藏族史學的起源與早期特色》,《西藏大學學報(中文版)》2002年2期。
- 陳海濤《唐代入華粟特人的佛教信仰及其原因》,《華林》第2卷,中華書局,2002年1月。
- 陳海濤《唐代入華粟人商業活動的歷史意義》,《敦煌學輯刊》2002年1期。
- [日]荒川正晴著,陳海濤譯、楊富學校《唐帝國和粟特人的交易活動》,《敦煌研究》2002年3期。
- 胡小鵬《元明敦煌與裕固族的歷史關係》,贊丹卓尕主編《裕固族研究論文續集》(上),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又載《西北史研究》第2輯,甘肅文化出版社,2002年12月。
- 徐曉麗、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吐谷渾與吐蕃移民婦女研究》,《敦煌學輯刊》2002年2期。
- 錢伯泉《唐代瓜州的墨離軍與河西地區的吐谷渾》,《貴州民族研究》2002年4期。
- 王欣《敦煌懸泉遺址所出有關烏孫的幾枚漢簡考釋》,周偉洲主編《西北民族論叢(一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12月。
- 段晴《敦煌莫高窟北區出土的一件梵語殘卷》,《戒幢佛學》第2卷,岳麓書社,2002年12月。
- 《敦煌發現蒙古人賣身契》,《北京檔案》2002年9期。

6、考古與文物保護

- 甘肅省博物館《敦煌佛爺廟灣唐代模印磚墓》,《文物》2002年1期。
- 李岩雲、楊俊《敦煌唐代模印花磚》,《絲綢之路》2002年10期。
- 蔡偉堂、郭俊葉、張小剛《敦煌莫高窟上寺中寺發掘簡報》,《敦煌研究》2002年1期。
- 沙武田《敦煌莫高窟72—76窟窟前殿堂遺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02年4期。
- 沙武田《關於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資料》,《敦煌學輯刊》2002年1期。
- 馬德《莫高窟新發現的窟龕與墓塔遺迹》,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
- 陳明、沙武田《莫高窟98窟及其對曹氏歸義軍時期大窟營建之影響》,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
- 沙武田《莫高窟盛唐未完工中唐補繪洞窟之初探》,《敦煌研究》2002年3期。
- 樊錦詩《開拓進取 再創輝煌》,《人大研究》2002年Z1期。
- 徐翎《甘肅立法保護敦煌石窟工程啓動》,《美術學報》2002年2期。
- 樊錦詩《〈敦煌莫高窟保護與管理總體規劃〉的制定與收穫》,《敦煌研究》2002年4期。
- 汪萬福、馬贊峰、蘭創業、徐淑青、劉複玳《昆蟲對石窟壁畫的危害與防治研究》,《敦煌研究》2002年4期。
- 李最雄《絲綢之路石窟的岩石特徵及加固》,《敦煌研究》2002年4期。
- 盧燕玲、田小龍、韓鑿卿《甘肅河西地區墓葬壁畫與磚畫顏料分析比較》,《敦煌研究》2002年4期。
- 李最雄《敦煌莫高窟唐代繪畫顏料分析研究》,《敦煌研究》2002年4期。
- 王進玉、王進聰《敦煌石窟銅綠顏料的應用與來源》,《敦煌研究》2002年4期。

- 馬贊峰、李最雄、蘇伯民、Michael R Schilling、林博民《偏光顯微鏡在壁畫顏料分析中的應用》，《敦煌研究》2002 年 4 期。
- 范宇權、李最雄、于宗仁、趙林毅、樊再軒《修復加固材料對莫高窟壁畫顏料顏色的影響》，《敦煌研究》2002 年 4 期。
- 秦全勝、鄭彩霞、汪萬福、李紅壽《敦煌莫高窟窟區樹木蒸騰耗水量的估算》，《敦煌研究》2002 年 4 期。
- 林博明、羅微《敦煌莫高窟地區風沙移動與磨蝕的控制方法》，《絲綢之路》2002 年 12 期。
- 魯東明、潘雲鶴、陳任《敦煌石窟虛擬重現與壁畫修復類比》，《測繪學報》2002 年 1 期。
- 華忠、魯東明、潘雲鶴《敦煌壁畫虛擬復原及演變》，《中國圖像圖形學報》2002 年 2 期。
- 陳平、納鵬君、毛學峰、何天稀、馬騫、王柱命、劉惠琳、侯經國《反相高效液相色譜測定敦煌壁畫膠結材料中氨基酸》，《分析測試技術與儀器》2002 年 2 期。
- 郭青林、薛平、侯文芳、王旭東《安西榆林窟環境特徵》，《敦煌研究》2002 年 4 期。
- William G-Bown、樊錦詩《中美合作研製敦煌數位圖像檔案》，《敦煌研究》2002 年 4 期。石宜輝、魯東明、潘雲鶴《敦煌石窟彩塑漫遊技術》，《電腦應用研究》2002 年 6 期。
- 張俊、李鳳森、李華《低端環境下實現虛擬敦煌漫遊即時傳輸與繪製》，《電腦輔助設計與圖形學學報》2002 年 6 期。

7、藝術

- 張應生、吳少明《敦煌壁畫形式構成初探》，《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02 年 3 期。
- 冰河《敦煌壁畫藝術及其民族性透析》，《甘肅民族研究》2002 年 3 期。
- 陳方平《有序的形式與自由的時空——敦煌壁畫構圖的裝飾性分析》，《西北美術》2002 年 4 期。
- 公維章《莫高窟 220 窟南壁無量壽經變剖記》，《敦煌研究》2002 年 5 期。
- 殷光明《敦煌盧舍那佛法界圖像研究》，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殷光明《敦煌盧舍那佛法界圖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02 年 1 期。
- 賴文英《北傳早期的“法華三昧”禪法與造像》，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林瑩《談莫高窟壁畫中的佛教“本生故事”畫》，《蘭州教育學院學報》2002 年 3 期。
- 趙聲良《雙飛天源流初探》，黃征主編《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 謝生保《敦煌飛天形態姿態的來源》，黃征主編《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 沈璿《由飛天看中國佛教藝術的世俗化》，黃征主編《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 王惠民《婆藪仙與鹿頭梵志》，《敦煌研究》2002 年 2 期。
- 張元林《莫高窟北朝窟中的婆藪仙和鹿頭梵志形象再識》，《敦煌研究》2002 年 2 期。
- [日]田中公明著，劉永增譯《敦煌寂靜四十二尊茶羅》，《敦煌研究》2002 年 5 期。
- [美]Tianshu Zhu《中國佛教藝術裏的須彌山圖像》，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劉珂豔《淺析敦煌莫高窟背光圖案中火焰紋的演變》，《裝飾》2002 年 4 期。
- 孫曉麗《敦煌莫高窟隋代藻井圖案類型分析》，《裝飾》2002 年 4 期。
- 車佐賢《轆轤與敦煌壁畫中的四輪車》，《敦煌研究》2002 年 1 期。

- 楊雄、楊春暉《敦煌壁畫中的竹畫》，《敦煌研究》2002 年 5 期。
- 杜元《早期山水畫與敦煌壁畫中的樹木描寫》，《敦煌學輯刊》2002 年 2 期。
- 謝生保《敦煌故事畫中的刑罰》，《敦煌研究》2002 年 6 期。
- 劉玉睿《〈張議潮統軍出行圖〉與敦煌晚唐壁畫》，《美術之友》2002 年 1 期。高啓安《莫高窟 61 窟“五臺山靈口之店推磨圖”之我見》，《敦煌學輯刊》2002 年 1 期。
- 孫繼民《莫高窟 61 窟五臺山“永昌之縣”小議》，《敦煌研究》2002 年 5 期。
- 袁德領《試論莫高窟 272 窟的內容》，《敦煌研究》2002 年 5 期。
- 袁德領《莫高窟 196 窟前室北壁上部內容考辯》，《敦煌學輯刊》2002 年 2 期。
- 劉永增《阿彌陀經的光明信仰與藥師經的審判思想》，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李靜傑《五代前後降魔圖像的新發展——以巴黎集美美術館所藏敦煌出土絹畫為例》，《故宮博物院院刊》2002 年 6 期。
- 王惠民《敦煌遺書的觀無量壽經變榜題底稿校錄》，《敦煌研究》2002 年 5 期。
- 楊雄《敦煌變文與壁畫內容之比較》，《西北史研究》第 2 輯，甘肅文化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 魏小傑《探蹟敦煌雕塑藝術》，《西北美術》2002 年 2 期。
- 葉玉梅《敦煌文化對西藏佛教文化藝術之影響——敦煌壁畫與西藏壁畫比較》，《西藏藝術研究》2002 年 2 期。
- 竇曉光《徽州歷史檔案與敦煌佛窟藝術的幾點比較研究》，《檔案學通訊》2002 年 3 期。
- 霍旭初《敦煌佛教藝術的西傳——從新發現的新疆阿艾石窟談起》，《敦煌研究》2002 年 1 期。
- 謝成水《從棲霞山石窟看南方文化對敦煌藝術的影響》，黃征主編《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 10 月；又載《敦煌研究》2002 年 5 期。
- 黃征《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的考察（代前言）》，黃征主編《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 張先堂《南京棲霞山飛天與敦煌飛天圖像比較研究》，黃征主編《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 馬德《棲霞石窟與敦煌石窟的歷史淵源試探——兼論新發現的棲霞飛天的時代》，黃征主編《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 徐億農《論南京敦煌兩地佛教藝術之關係》，黃征主編《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 劉曼春《六朝佛教藝術與敦煌佛教藝術對比研究》，黃征主編《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 楊雄《南朝風範 南國風情——棲霞飛天初探》，黃征主編《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 張亞莎《印度·衛藏·敦煌的波羅——中亞藝術風格論》，《敦煌研究》2002 年 3 期。
- 振中《盧舍那，東方的蒙娜麗莎》，《絲綢之路》2002 年 5 期。
- 王君《希臘愛神與中國敦煌菩薩》，《雲夢學刊》2002 年 5 期。
- 陳雪靜《迦陵頻伽起源考》，《敦煌研究》2002 年 3 期。
- 謝生保《敦煌莫高窟發現的剪紙藝術品——兼論中國民間剪紙的淵源和發展》，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李曉玉《敦煌壁畫臨本的收藏》，《敦煌研究》2002 年 5 期。
- 王志銘《論敦煌書法的藝術價值》，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李春遠《關於敦煌遺書的書法化趨向》，《敦煌學輯刊》2002 年 1 期。
- 方孝坤《敦煌書法藝術述論》，《阜陽師範學院學報》2002 年 1 期。
- 方廣錫《〈魏晉隋唐殘墨〉綴目》，《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 湯君《敦煌燕樂歌舞考略》，《文藝研究》2002 年 3 期。
- 莊壯《敦煌壁畫上的打擊樂器》，《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2002 年 4 期。
- 鄭祖襄《也談唐代的急、慢曲子》，《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2002 年 3 期。
- 陳應時《中日琵琶古譜中的“、”號——琵琶古譜節奏解譯的分歧點》，《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2002 年 1 期。
- 應有勤《敦煌琵琶譜譯解——“擊拍說”與反撥研究的殊途同歸》，《音樂研究》2002 年 1 期。
- 應有勤《中日對古譜涵義和解譯的比較研究》，《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2002 年 1 期。
- 趙玉卿、鄭蓮《關於敦煌樂譜的定弦法研究》，《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2002 年 2 期。
- 黎蕾《五臺山佛教樂舞戲曲文化鈎沈》，《敦煌研究》2002 年 2 期。

8、語言文字

- 黃征《敦煌語言文字學研究要論》，《漢語史學報》第 2 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年 5 月。
- 陳明娥《從雙音新詞的存亡看敦煌變文在漢語史上的地位》，《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2 年 5 期。
- 張子開《敦煌寫本〈六祖壇經〉中的修辭》，《綏化師專學報》2002 年 2 期。
- 楊秀英《敦煌願文社會交際稱謂詞研究》，《廣西社會科學》2002 年 6 期。
- 黑維強《敦煌文獻詞語陝北方言證》，《敦煌研究》2002 年 1 期。
- 湯君《敦煌寫本 S.6537 詞卷考辯》，《文獻》2002 年 2 期。
- 竺家甯《敦煌卷子 P.4663 辭彙研究》，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鄧鷗英《說“中間”、“之間”、“間”》，《語言研究》2002 年 3 期。
- 栗學英《從“驚忙”一詞看“忙”的意義演變》，黃征主編《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 楊秀英《從願文複數表示法看複數詞尾“們”的產生》，《殷都學刊》2002 年 2 期。
- 葉貴良《“州”字考》，《淮南師範學院學報》2002 年 1 期。
- 陳秀蘭《“五輪投地”來源考》，《西南民族學院學報》2002 年 4 期。
- 鄧鷗英《敦煌變文俗語詞割記》，黃征主編《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 儲小岳《敦煌詞語考釋七則》，《甘肅教育學院學報》2002 年 1 期。
- 曾述忠《敦煌文獻詞語考釋一則》，《古漢語研究》2002 年 2 期。
- 蔣宗福《敦煌文獻詞語割記》，《古漢語研究》2002 年 1 期。
- 董志翹《敦煌社會經濟文獻詞語略考》，《語文研究》2002 年 3 期。
- 葉貴良《〈敦煌文獻字義通釋〉釋義商榷舉例》，《敦煌研究》2002 年 3 期。
- 葉愛國《〈敦煌俗別字補正〉商榷》，《敦煌研究》2002 年 5 期。
- 楊秀英《敦煌願文詞義試解》，《山東教育學院學報》2002 年 3 期。
- 陳秀蘭《敦煌變文詞語校釋》，《古漢語研究》2002 年 2 期。
- 陳秀蘭《敦煌變文詞語割記》，《綿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 年 3 期。
- 于淑健《〈浙藏敦煌文獻疑難雜字輯考〉》，黃征主編《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

社, 2002 年 10 月。

徐朝東《英藏敦煌韻書 S.11383A、B、C、試釋》,《古漢語研究》2002 年 3 期。

竇秀豔《從〈敦煌變文〉用韻看漢語聲調中的“濁上變去”》,《山東行經學院學報》2002 年 2 期。

徐真真《敦煌本〈文選音〉殘卷校證》,《敦煌研究》2002 年 3 期。

8、文學

白化文《對敦煌俗文學中講唱文學作品中的一些思考》,《國學研究》第 9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6 月。

邵文實《敦煌佛教文學與邊塞文學》,黃征主編《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徐俊《敦煌寫本詩歌續考》,《敦煌研究》2002 年 5 期。

王勳成《敦煌寫本〈高興歌〉作者考》,《敦煌學輯刊》2002 年 2 期。

徐俊《俄藏 П X.11414+ П X.02947 前秦擬古詩殘本研究——兼論背面文書的地域和時代》,《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張子開《初唐後 50 年間的禪宗白話詩》,《五臺山研究》2002 年 3 期。

鄧鷗英《敦煌詩歌〈釋氏歌偈銘叢鈔〉補校》,《敦煌研究》2002 年 2 期。

鄭阿財《敦煌寫本〈九想觀〉詩歌新探》,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王卡《唐代道教女冠詩歌的瑰寶——讀敦煌本〈瑤池新詠集〉校讀記》,《中國道教》2002 年 4 期。

湯君《敦煌曲子詞與中原文化》,《中州學刊》2002 年 6 期。

王毅《由隱到顯:從〈雲謠集〉到〈桂枝兒〉兩性關係的嬗變》,《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02 年 5 期。

王毅《怨怒總歸緣 啼笑任真情——〈雲謠集〉與〈桂枝兒〉中閨怨題材之異同》,黃征主編《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王繼如《敦煌變文研究尙有可爲》,《戒幢佛學》第 2 卷,岳麓書社,2002 年 12 月。

劉瑞明《〈漢將王陵變〉與〈捉季布傳文〉校注》,《敦煌學輯刊》2002 年 2 期。

李小榮《敦煌變文作品校錄二種》,《敦煌學輯刊》2002 年 2 期。

黃征《〈降魔變文〉研究》,《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2 年 4 期。

項楚《〈廬山遠公話〉與變文早期形態》,《紀念徐朔方先生從教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論集》,浙江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劉瑞明《〈廬山遠公話〉校注商補》,《敦煌學輯刊》2002 年 1 期。

[新加坡]郭淑雲《敦煌〈百鳥名〉〈全相鶯哥行孝義傳〉與〈鸚哥寶卷〉的互文本性初探》,《敦煌研究》2002 年 5 期。

袁書會《敦煌藏卷中白話小說與佛教的關係》,《西藏民族學院學報》2002 年 3 期。

李小榮《〈狸貓換太子〉的來歷》,《河北學刊》2002 年 2 期。

伏俊璉《敦煌俗賦的文學史意義》,《史學月刊》2002 年 1 期。

胡立華、楊國學《敦煌文獻中的俗賦研究》,《社會科學戰線》2002 年 5 期。

10、宗教

陳國燦《從敦煌吐魯番所出早期寫經看佛教的東傳西漸》,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方廣錫《敦煌寺院所藏大藏經概貌》,《戒幢佛學》第 2 卷,岳麓書社,2002 年 12 月。

- 李正宇《唐宋時期的敦煌佛教》，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李正宇《唐宋時期敦煌佛經性質功能的變化》，《戒幢佛學》第 2 卷，岳麓書社，2002 年 12 月。
- 馬茜《歸義軍時期敦煌地區庶民佛教的發展》，《甘肅民族研究論叢》，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 紀華傳《菩提達摩碑文考釋》，《世界宗教研究》2002 年 4 期。
- 張子開《敦煌寫本〈六祖壇經〉的題名》，《宗教學研究》2002 年 3 期。
- 方廣錫《敦煌本〈壇經〉首章校釋疏義》，《中國禪學》第 1 卷，中華書局，2002 年 6 月。
- 楊曾文《敦煌本〈壇經〉的佛經引述及其在慧能禪法中的意義》，《戒幢佛學》第 2 卷，岳麓書社，2002 年 12 月。
- 宗舜《敦煌寫卷所揭“彌勒禪”之初探——北京圖書館藏月 091 (7119) 號卷子解讀之一》，《戒幢佛學》第 2 卷，岳麓書社，2002 年 12 月。
- [日]田中良昭《敦煌的禪宗燈史——其出現之意義》，《戒幢佛學》第 2 卷，岳麓書社，2002 年 12 月。
- [日]石井修道《荷澤神會以降敦煌禪宗史文獻之性質》，《戒幢佛學》第 2 卷，岳麓書社，2002 年 12 月。
- [日]落合俊典《敦煌本〈禪數雜事〉下與日本金剛寺本〈大安般經〉》，《戒幢佛學》第 2 卷，岳麓書社，2002 年 12 月。
- 宗舜《〈浙藏敦煌文獻〉佛教資料考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 楊銘《重慶市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寫經題錄》，《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 李刈《石谷風藏敦煌寫經部分殘卷之定名》，《敦煌研究》2002 年 2 期。
- 李刈《莫高窟北區出土部分寫經殘片初探》，《敦煌研究》2002 年 5 期。
- 李際甯《敦煌莫高窟北區 53 窟出土漢文〈華嚴經〉版本考》，《戒幢佛學》第 2 卷，岳麓書社，2002 年 12 月。
- 榮新江《有關敦煌本〈歷代法寶記〉的新資料——積翠軒文庫舊藏“略出本”校錄》，《戒幢佛學》第 2 卷，岳麓書社，2002 年 12 月。
- 杜斗城《流傳於日本的〈十王生七經〉與〈地藏十王經〉》，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釋永有《敦煌遺書中的〈金剛經〉》，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林世田《武則天稱帝與圖讖祥瑞——以 S.6502〈大雲經疏〉為中心》，《敦煌學輯刊》2002 年 2 期。
- 陳國燦《姜亮夫〈莫高窟年表〉魏晉寫經系年訂補》，《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19 輯。
- [日]西本照真《敦煌抄本中的三階教文獻》，《戒幢佛學》第 2 卷，岳麓書社，2002 年 12 月。
- [日]荒見泰史《唐代講經的法會及押座文的位置》，《中國學研究》第 5 輯，濟南出版社，2002 年 6 月。
- 李小榮《水陸法會小考》，《戒幢佛學》第 2 卷，岳麓書社，2002 年 12 月。
- 樓宇烈《佛經通俗宣講稿本——讀敦煌遺書中“講經文”劄記》，《戒幢佛學》第 2 卷，岳麓書社，2002 年 12 月。
- 賈小英《俄藏本〈十二時普勸四眾依教修行〉校勘和研究》，《蘭州大學學報》2002 年 1 期。
- 王曉平《東亞願文考》，《敦煌研究》2002 年 5 期。
- 張生漢《敦煌願文校讀劄記》，《河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2 年 4 期。
- 湛如《敦煌佛教喪葬律儀研究——以晚唐五代的七七齋會為中心》，《戒幢佛學》第 2 卷，岳麓書社，2002 年 12 月。
- 高啓安《唐五代敦煌僧人飲食戒律初探——以“不食肉戒”為中心》，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陸離《唐五代敦煌寺戶制度源流辨析》，《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 郝春文《〈勘尋永安寺法律願慶與老宿紹建相諍根由狀〉及相關問題考》，《戒幢佛學》第 2 卷，岳麓書社，2002 年 12 月。
- 徐曉卉《敦煌歸義軍時期的道場司探析》，《敦煌研究》2002 年 2 期。
- 鄭炳林、徐曉麗《敦煌寫本 P.3973〈往五臺山行記〉殘卷研究》，《敦煌學輯刊》2002 年 1 期。
- 王蘭平《敦煌寫本 P.06062 歸義軍時期〈大般若經〉抄寫紙曆及其相關問題考釋》，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陳麗萍《敦煌女性寫經題記及反映的婦女問題》，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公維章《明清時期河西的民間觀音信仰》，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 楊福泉《論唐代吐蕃本教對東巴教的影響》，《思想戰線》2002 年 2 期。
- 蕭登福《敦煌寫卷所見受道教避穀食氣思想影響的佛經》，《宗教學研究》2002 年 2 期。
- 劉樂賢《敦煌寫本中媚道文獻及相關問題》，《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 王承文《古靈寶經的齋官制度與天師道及佛教的關係》，《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 王卡《敦煌殘抄本〈陶公傳授儀〉校讀記》，《敦煌學輯刊》2002 年 1 期。
- 王卡《敦煌本〈老子節解〉殘頁考釋》，《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 王卡《敦煌本〈洞玄靈寶九天生神章經書〉考釋》，《敦煌學輯刊》2002 年 2 期。
- 劉永明《試論曹延祿的醮祭活動——道教與民間宗教相結合的典型》，《敦煌學輯刊》2002 年 1 期。
- 葉貴良《〈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斯 63 號〈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校正》，《敦煌學輯刊》2002 年 2 期。
- 馮利華《兩件敦煌寫本道經補校——以〈洞淵神咒經斬鬼品七〉和〈太上靈寶洞玄滅度五練生屍經〉》，《西域研究》2002 年 4 期。
- 釋覺旻《從“三教大法師”看晚唐五代敦煌社會的三教結合》，鄭炳林主編《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論文集》，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11、科技

- 馬繼興《當前世界各地收藏的中國出土卷子本古醫藥文獻備考》，《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 趙平安《談談敦煌醫學寫本的釋字問題》，《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 陳明《〈醫心方〉中的耆婆醫藥方來源考——兼與敦煌〈耆婆書〉之比較》，《文史》總第 59 輯，2002 年 2 期。
- 張永文《以敦煌遺書〈法要〉探討張仲景經方之源》，《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2002 年 3 期。
- 王淑民《敦煌本〈湯液經法〉佚文研究——兼論經方對中醫方劑學發展的深遠影響》，《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 叢春雨《敦煌遺書〈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五臟病症治療方藥解析》，《敦煌研究》2002 年 3 期。
- 梁永林、李生財、賈育新《〈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五味的五行歸屬辨識》，《中醫藥學刊》2002 年 4 期。
- 張儂、劉強《敦煌本〈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古醫方的源流》，《敦煌研究》2002 年 6 期。
- 劉永明《敦煌曆日探源》，《甘肅社會科學》2002 年 3 期。
- 劉永明《散見敦煌曆朔閏輯考》，《敦煌研究》2002 年 6 期。

晏昌貴《敦煌具注曆日中的“往亡”》，《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 19 輯。

郭正忠《甲種敦煌算書的考校和釋補》，《自然科學史研究》2002 年 1 期。

12、學術動態與紀念文

楊寶玉《2001 年敦煌史學研究述要》，《中國史研究動態》2002 年 11 期。

陳麗萍、馮培紅《2001 年敦煌學研究論著索引》，《敦煌學輯刊》2002 年 2 期。

楊富學、贊丹卓尕《近年國內河西回鶻研究綜述》，贊丹卓尕主編《裕固族研究論文續集》(上)，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月。

榮新江《21 世紀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中國史研究動態》2002 年 3 期。

劉進寶《新時期敦煌學的一次盛會——21 世紀敦煌學學術研討會綜述》，《敦煌研究》2002 年 1 期。

徐曉麗《二十一世紀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敦煌學輯刊》2002 年 1 期。

郝春文《中日學者“草創期的敦煌學”學術研討會綜述》，《華林》第 2 卷，中華書局，2002 年 1 月。

郝春文《“草創期的敦煌學”學術研討會綜述》，《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方廣錫《“草創期的敦煌學”研討會散記》，《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柴劍虹《盛衰與共，切磋增誼》，《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趙和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綏圓《中日敦煌佛教學術會議召開》，《中國禪學》第 1 卷，中華書局，2002 年 6 月。

方廣錫《中日敦煌佛教學術會議召開》，《世界宗教研究》2002 年 2 期。

應重《中日敦煌佛教學術會議召開》，《佛學研究》2002 年 10 期。

楊秀清《飛天嫋嫋會棲霞——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研討會綜述》，黃征主編《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黎知謹《敦煌與絲路文化學術講座座談會紀要》，《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02 年 8 期。

張啓安《二屆敦煌歷史檔案與徽州歷史檔案開發利用研討會綜述》，《檔案》2002 年 6 期。

宛志亮《二屆敦煌歷史檔案與徽州歷史檔案開發利用研討會在蘭州召開》，《檔案》2002 年 6 期。

孫曉峰、項一峰《麥積山石窟與絲綢之路佛教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敦煌研究》2002 年 5 期。

閻廷亮、魏文斌《炳靈寺石窟學術研討會綜述》，《敦煌研究》2002 年 5 期。

榮新江《周一良先生與書》，《讀書》2002 年 6 期。

榮新江《才高四海，學貫八書——周一良先生與敦煌學》，《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季羨林《悼念周一良》，《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饒宗頤《木蘭花令》，《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白化文《從圓珍述及講俗的兩段文字談起——紀念周太初（一良）先生》，《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郭熹微《哭周師》，《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胡寶國《周一良先生與魏晉南北朝史學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閻步克《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鄧文寬《深切懷念周一良先生》，《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周啓博《父親周一良最後一個月工作與健康情況》，《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 趙和平《周一良先生學術簡歷及著述年表》，《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 王桂蘭《論王重民對敦煌文獻整理研究的貢獻》，《深圳大學學報》2002 年 3 期。
- 堯燕妮、李長迅《王重民先生對目錄學、敦煌學的貢獻》，《圖書與情報》2002 年 1 期。
- 馬德《敦煌學史上的豐碑——史葦湘〈敦煌歷史與莫高窟藝術〉編校手記》，《敦煌學輯刊》2002 年 2 期。
- 沈頌金《黃文弼與西北邊疆史地研究》，《史學史研究》2002 年 1 期。
- 顧炳樞《敦煌最早的“保護神”——長卷大師李丁隴與他的敦煌夢》，《文史春秋》2002 年 11 期。
- 方廣錫《季羨林與佛教研究》，《敦煌研究》2002 年 1 期。
- 陳晉肅《敦煌文化：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精彩華章——著名敦煌學家、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段文傑先生訪談錄》，《探索與爭鳴》2002 年 9 期。
- 李玉君《孟列夫與漢學研究》，《敦煌學輯刊》2002 年 2 期。
- 周紹良《得〈佛說大藏經目錄〉因緣記——為啓元白先生 90 華誕作》，《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2 年 3 期。
- 柴劍虹《求真求實會於心——學習啓功先生鑒賞與研究敦煌寫本體會》，《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2 年 3 期。
- 萬宇《棲霞飛天引起的文化話題——南京師範大學黃征教授訪談錄》，黃征主編《南京棲霞山石窟藝術與敦煌學》，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 李偉國、謝寶耿《鍾情敦煌學和宋史、學者型的出版人——李偉國編審訪談》，《學術月刊》2002 年 12 期。

13、新書評介

- 李更《學貴知津——〈敦煌學十八講〉讀後》，《中國典籍與文化》2002 年 3 期。
- 余欣《教科書的範式創新之作——讀榮新江教授新著〈敦煌學十八講〉》，《北京大學學報》2002 年 4 期。
- 張小貴《讀榮新江〈敦煌學十八講〉》，《敦煌學輯刊》2002 年 2 期。
- 王素《朱雷〈敦煌吐魯番文書論叢〉》，《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 孟憲實《孫繼民〈敦煌吐魯番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 柴劍虹《〈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一卷出版》，《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02 年 3 期。
- 趙和平《郝春文〈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一卷)》，《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 胡同慶《〈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一卷)評介》，《敦煌研究》2002 年 1 期。
- 孟彥弘《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一卷》(簡介)，《中國史研究動態》2002 年 5 期。
- 趙貞《黃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唐研究》第 8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 陳明《新材料·新問題·新史識——讀榮新江教授新作〈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西域研究》2002 年 2 期。
- 李鴻賓《中西學術之間：榮新江新著〈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2 年 4 期。
- 許全盛《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唐研究》第 8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 韓香《回鶻史研究的一部新作——〈回鶻文契約文書初探〉評介》，《西域研究》2002 年 2 期。
- 傲奇《研究回鶻文契約文書的創新之作——讀〈回鶻文契約文書初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2 年 2 期。
- 榮新江《M. Cohen, J.-P. Drège, J. Giès(eds.), La Sérinde, terre d' échanges》，《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 榮新江《P. Koskikallio and A. Lehmuskallio (eds.), C. G. Mannerheim in Central Aisa 1906-1908》，《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 余欣《éric Trombert, Le crédit à Dunhuang. vie matérielle et société en Chine médiévale》，《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 張總《殷光明〈北涼石塔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 柴劍虹《蔣禮鴻〈蔣禮鴻集〉》，《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 汪習波《佚名〈唐抄文選集注彙存〉》，《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 周廣榮《陸永峰〈敦煌變文研究〉》，《華林》第 2 卷，中華書局，2002 年 1 月。
- 劉屹《李德范〈敦煌道藏〉》，《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6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8 月。

14、其他

- 李淑萍《敦煌辭典》，《美術之友》2002 年 3 期。
- 黃家龍《敦煌行報告》，《美術學報》2002 年 1 期。
- 黃適遠《從敦煌走過》，《絲綢之路》2002 年 4 期。
- 朱幼棣《敦煌墨池》，《尋根》2002 年 1 期。
- 梅墨生《敦煌漫憶》，《陝西水利》2002 年 1 期。
- 胡楊《敦煌筆記》，《絲綢之路》2002 年 12 期。
- 周生霞《敦煌馬的傳說》，《絲綢之路》2002 年 9 期。
- 石灣《厄運襲擊敦煌月牙泉》，《生態經濟》2002 年 1 期。
- 吳尚平《千年不竭月牙城》，《絲綢之路》2002 年 3 期。
- 王牧《失落的河西走廊》，《旅遊》2002 年 4 期。
- 傅克元《長城·雄關》，《城鄉建設》2002 年 3 期。
- 張力《西去樓蘭》，《今日中國（中文版）》2002 年 6 期。
- 朱奕《從敦煌到拉蔔楞寺——領略甘肅》，《絲綢之路》2002 年 12 期。
- 《敦煌藝術展轟動日本》，《絲綢之路》2002 年 4 期。
- 陸麗《敦煌藏經洞發現一百周年 紀念幣發行的重大意義》，《廣西金融研究》2002 年 S1 期。
- 徐恩存《敦煌母題：現代繪畫的新向度——讀唐勇力的工筆畫》，《藝術探索》2002 年 2 期。
- 李正宇《敦煌飲食文化開發的若干思考》，《敦煌研究》2002 年 6 期。
- 高啓安《淺議敦煌飲食的開發》，《敦煌研究》2002 年 6 期。
- 孟亞《吃敦煌菜 品敦煌文化》，《質量指南》2002 年 3 期。
- 鄭屹、李勇鋒《絲路珍饈——敦煌菜系》，《絲綢之路》2002 年 5 期。

¹ 李君偉在搜集整理隋唐五代史研究資訊的之時，對這一時限內敦煌學方面的研究論著，也有所關注並加以介紹。參李君偉《2002 年隋唐五代史研究概況》，《中國史研究動態》2003 年 6 期，2-11 頁。

² 2001 年共出版敦煌學專著 44 部，發表論文 363 篇。參陳麗萍、馮培紅《2001 年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索引》，《敦煌學輯刊》2002 年 2 期，128-140 頁。

《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稿約

- 一、 本刊由“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主辦，策劃：高田時雄、柴劍虹；主編：郝春文。本刊的內容以國際敦煌學學術信息為主，刊發的文章的文種包括中文（規範繁體字）、日文和英文，每年出版兩期。每年第 1 期的截稿日期為 5 月底，第二期的截稿日期為 11 月底。
- 二、 本刊的主要欄目有：每年的各國敦煌學研究綜述（包括專案動態及熱點爭鳴與點評）、新書訊、各國召開敦煌學學術會議的有關資訊、簡要的新書評介、對國際敦煌學發展的建議、重要的學術論文提要等，歡迎就以上內容投稿。來稿請寄：北京西三環北路 105 號：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郝春文，郵遞區號：100037，電子信箱：haochunw@mail.cnu.edu.cn。
- 三、 來稿請附作者姓名、性別、工作單位和職稱、詳細位址和郵遞區號以及電子信箱，歡迎通過電子郵件用電子文本投稿。

